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



《书友文丛》内容简介

风雨故人情 夏衍著

风风雨雨一生，交往名人如云。夏公写故人最多的当然是文坛中人。据亲历而写，即使是写田汉、郭沫若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也都有鲜为人知的内容。至于写几乎被人遗忘的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这样的人物，更非夏公莫属。长期在白区工作，接触过很多隐蔽战线的人，他写杨度、潘汉年，石破天惊，真相大白。这简直是一部人物志！夏公写人的文字，这是第一次结集，由夏公女儿沈宁编。

瞎操心 陈四益文 丁聪画

画坛上有一位永远长不大、不会老的大师，他就是丁聪。“小丁”自称，人称“小丁”，或许正表明大师艺术青春永驻。四益文采风流，笔锋犀利，久有佳评。诗文绘画，两相辉映。是匕首，是投枪；有人叫好，有人神伤。他俩都是劳碌命，管不到的事也要去操心，所以自嘲为“瞎操心”，发而为文为图，世上就有了这部瞎操心的书。本书收文一百余篇，收图一百余幅。在你叫绝一百余次后，还有一篇后记令你思索。

边缘有光 刘心武著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小说家写读书随笔，自有他的不同凡响。古今中外，博览群书，对名著的赏析，发人所未发，甚至指出败笔所在，有胆有识。由读书而引发，评析某些文化现象，思想敏锐，议论纵横，耐人回味。难免不破门而出，涉及电影、电视剧、绘画、音乐及其他文艺作品，在细致的艺术品评中，常有会心的创作谈。至于他读《红楼梦》、《金瓶梅》的札记，读来饶有趣味，早已拥有广大的读者。

书生意气 陈平原著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学者，著述累累。辑入本书的是：对自己的青少年和老师们的（王瑶、唐弢等等）的“往事如烟”的札记：系统的本人著作的序跋，这些短小而隽永的文字，依稀可见作者学术跋涉的足迹；对于书界文化界的“道听途说”的随笔，却留下了并非“道听途说”的见解；身穿牛仔衣脚踏旅游鞋在南方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间里，给守家的夫人频频寄呈的书简。家信怎么也收了进来？这里虽也有卿卿我我，但书卷气扑鼻，实在是游记形式的读书小品，自有一番情趣。

梦书怀人录 姜德明著

作者长期在《人民日报》编文艺副刊，文界朋友济济。他又擅长散文。他写人的散文集曾得过大奖。作者也是著名藏书家。他从藏书中掌握了许多文艺史料和掌故。要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给人以知识，给人以艺术享受：这是正宗书话的必要条件。作者是写正宗书话的高手。本书各篇选自近年所写的怀人散文和书话随笔，都是首次编集。

朋友和朋友们书初集 于光远著

于老是著名理论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近年走笔文坛，属辞成章，是受读者欢迎的散文家，他却自称是“21世纪文坛的新秀”。他经历丰富，政界学界朋友众多。朋友们的人生历程，成功失败，幸与不幸，成了他笔底波澜；重温旧情，畅叙往事，既是人间乐事，也为世上提供了珍贵史料。本书各篇是第一次编集，不少篇还是为本书特地新写的。

暮年杂笔 贾植芳著

贾老以学问著称，也以坐牢闻名。解放前他三进监狱，解放后又因胡风案关入大牢。追求人生价值，给他带来坎坷人生；坎坷人生，更使他执著追求人生价值。他珍惜自己的笔墨。本书收入他近年所写怀念故人和自我画像的文字，以及随笔杂感和为徒子徒孙们写的序跋。他说：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一般史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不殇录 金性尧著

作者是三十年代就在文坛打杂的老作家，擅写文史随笔。本书是他近年第三本随笔集，各篇都系新写未编过集。钩沉史料，絮述掌故，知识广博，趣味盎然，使他拥有众多读者。翻开本书，许多题目即令人留连驻足。陈老莲诗曰：“十年有恨千秋业，一日无书百岁殇。”后一句是说：人若一日不读书，活到百岁也只能算是短命。作者取其意而为书名，自是一生读书的表白。

文坛艺林见知录 蒋星煜著

作者是戏曲专家，尤以攻《西厢记》著称。与莺莺为伴，日子本也太平；可蒋公不甘寂寞，广泛涉足文坛艺林。从此他也就多事：与胡适等人有过拉拉扯扯的关系，成了历次运动必须交代的问题；推崇过魏征、海瑞，“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参加过一些剧本的创作，在艺海波涛中也就冷暖自知。这些福兮祸兮、所见所知写了下来，倒很可供人们了解种种秘闻的真相和种种掌故的内幕。

深酌浅饮 李辉著

作者年龄不大，名气不小。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现代文坛的人与事中转悠，写出了一系列追寻往事又扫描现实的著述，为世人称道。本书仍是他转悠现代文坛的产物。这里有富于思辨色彩的短论和书评；有记述自己脚印的随笔和序跋，有与合作者探讨学术的通信，有书与人的实录和史料钩沉，文体似乎驳杂，思想敏锐和叙述流畅却是共同特色。对于读者，可说是深酌浅饮两相宜。

序

倪墨炎同志要我编一本书给他主编的《书友文丛》，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把自己写的有关朋友们的文章收集起来，看看能否拿得出手。

这套《书友文丛》已经出了五本。我收到两本。其中一本是沈宁编的她父亲夏衍的文集《风雨故人情》。夏公是我的长辈，他在革命队伍中奋斗了七十多年，担任过许许多多重要的职务，作出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贡献。他的故人大都是我国政治界、文化界的著名人物。读夏公的这本文集，既可以看到夏公本人的思想感情，看到他的人格、性格、风格，看到他和朋友间的情谊，也可以看到有关当代中国许许多多人物的事迹，因此这本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看了夏公的这本文集后，心想如果也编出类似的一本，根本无法同夏公的书相比，因此刚刚形成的念头，又动摇了，想打退堂鼓。不过转过来又想，我根本不应该和他比。现在又有多少人可以和夏公去相比呢？我的东西只要出版社还愿意出，有些人愿意看，不妨拿出去给人看看。这么一想，我又胆大了起来，把能否拿出去的问题交由倪墨炎去考虑吧！

沈宁在那本《风雨故人情》的后记里写道：“爸爸的朋友很多，他自己说过，和他来往过的、打过交道的人，可能超过一千。他说，他交友极广，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可以说是三教九流都有。他经历丰富，工作时间长，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多，完全是可能的……。”我认为一千这个数目不算太大，也许我也会有的，现在保存着的名片，有满满一个号码箱，外加六、七个大盒子。这些都是这几年人家给我的，数量估计会有好几千，其中有几分之几算得上朋友，难说，同时又有不少新交是没有名片的。我的旧交也不少，当然我都不会有他们的名片。沈宁说夏公写朋友的文章不多，我写的也不多。它们都是在某种情况下写的，几乎没有主动有意去写这类文章。不过这次我把这类文章集中起来看了一下，倒产生了一个念头，有不少朋友似乎应该写一写。韦君宜最近赠我一本《我对年轻人说》。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老了，虽然脑筋还不糊涂，但是，两次脑溢血、两次脑血栓，已经把我搞成了废人，以至于不再可能随心所欲地写下心之所思。躺在病榻上，我的同时代人的面影常在眼前晃动，使自己觉得实在应该把他们算不上伟大，但也非平庸的色彩斑驳的一生摆给年轻人看看。”现在我也有同样的思想。不过要去写一时抽不出时间，先编出一个集子也好。

当然我要写的朋友只能是真正的朋友，我对他不喜欢、不够做朋友的人我不写，我不够格做他的朋友的人也不写，也不编入这个文集，以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诮。其中有一些人是当代中国的大人物，有些还是我的直接领导，对我有许多教诲，也有一些可以写一写的事情。这样的文章多年来倒写过不少篇，这次决定不把它们收入这本集子。我想也许另外编一本更合适些。“大人物”中有的人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年龄同我也差不多，应该编入这本书。不过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不如同写其他领导人的文章编在一起更加合适。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的老师们的文章怎么办？考虑的结果，同朋友们的编在一起。因为第一，师友不容易区分。许许多多朋友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的老师。我写过一篇题为《当敬一事师》的文章，我的许多知识都从朋友中来。第二，有一些人是在学校里给我上过课，是很正规的我的老师，甚至像周培源那样还是我的论文导师，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和他之间年龄

差的绝对值虽然不会有丝毫改变，但相对值却缩小许多，加上又一起工作一起讨论问题，在建国后的许多年中朋友的成分就不断提高，我就用《恩师和朋友》为题写文章祝贺他的九十寿辰。第三，当然有一些老师一直没有成为朋友，严格说来，把关于他们的文章编在《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中不合适，但我不想太认真了，这样人很少，不可能单独编书，而我又不愿割爱，也就收入了。“良师益友”人们不是常常一起提吗？

这本书我命名为《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朋友们的书我得到的很多。我很少去书店买书，但我家的几间房子已经被现在拥有的书占得满满的，处在过饱和的状态，容纳不了新书。但是新书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我家，它们大都是朋友们送给我的。收到朋友们的书，我都是要看看的，至少也要浏览一下。但是给朋友们的反馈的却很少，写成文章的就更少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有一种对不起朋友的心情。现在先出这个《初集》，以后再补吧！

在决定交出这本书稿之前，书名问题似乎不难解决，文章次序倒考虑了很久。现在我想采取的办法是，按照我和他们最初相识的时间为序。没有更好的法子就这么办吧！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膀，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编

1996年夏于沪西

“七月派”诗人和电子技术专家

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我写的是两个人。把这两位写在一篇文章中是因他们和我都是总角之交，他们都小我两岁左右，又都是我的亲戚。七月派诗人孙铤是我的堂弟，他原先的名字是郁锺瑞，我叫郁锺正。孙铤和于光远都是参加革命后自己起的名字。他和我共一个祖父的祖父。周国铨是我的表弟，和我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要追溯到我的祖父的祖父这一代。孙铤和周国铨彼此血缘靠近，前者的父亲和后者的母亲是亲兄妹。

我本姓郁，是上海的望族。我家也就是在祖父的祖父这一代从南翔（现划为封浜）迁到上海县城的。同我年龄接近的“本家”很多，但是成为朋友的只有他们两人。在我的朋友中结识最早的也是他们两人。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中“朋友”这一词目的释文是“不是亲戚，相识而有好感的人”。朋友和亲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可以得兼。亲戚有时可以成为能够相识并且产生好感的一个条件。国铨比孙铤同我多一种关系，我们还是紧邻。他的住房就在我住房的隔壁——真正是隔壁，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

孙铤昨天寄来一封信，信中讲到这个月是他的生日。他是1917年出生。周国铨比他大几个月，到97年3月周国铨满八十岁。但很不幸，在四年前去世了。孙铤这月满七十九岁。想起当年一起玩耍的景象，到今年整整过了七十年了。孙铤每次写信几乎都提到童年的回忆。这封信上讲到每年中秋节在顾家弄（我住的地方）俞家弄（他住的地方。这两处是我们祖父的祖父的后代——又称“小郁家”住的地方）可以看到烧香斗。信上还说，在乔家浜（就是我祖父的祖父的哥哥那一支——即“大郁家”所住的地方）还烧大香斗。“香斗”这东西，孙铤不提，我已早就忘记了。提起还记得，它是由许多支线香编成斗状的东西。似乎四周是线香，中间还放有檀香。我从来反对迷信，反对烧香拜佛，可是烧起香来烧出来的香味我却很喜欢。

孙铤这次来信还寄来广州发行的《华夏诗报》和宁波发行的《明州快报》。两报都刊有他的事迹。我们虽是弟兄，但常有不能通音信的时候。看了沈栖所写介绍他的文章，对他的经历就了解得更系统具体了。孙铤走上革命的道路不像国铨那样，他没有受到我的什么影响。他在中学时期演革命戏剧，开始写革命文学作品。十七岁那一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对诗歌发生了浓厚兴趣，参加中国剧人协会、诗歌座谈会等左翼社团的活动。抗战后写了许多诗篇，在《七月》上发表。1938年见胡风，受到胡风的鼓励。1939年加入我们党，在香港做文化工作。在香港沦陷后他照顾帮助胡风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士从香港撤回内地。由于他和胡风的往来，在“反胡风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集团分子”在杭州监狱关押一年。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1969年他第三次入狱，直到1971年释放。三中全会后胡风案件平反，1983年才恢复党籍。

孙铤在参加革命活动时和我接触不多。1933年他考入大同大学时，我倒也在那个学校，但是他在学校中呆的时间太短了，第二年就去了日本上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到武汉时我也在武汉，但没有同我联系上。我一直在武汉，他却去了前方。这一年八月他从前方回武汉时我又去了广州。抗战后我没有去过香港，他也一直没有去延安。建国后他也很少来北京，他被打成胡风分子，我也只是从我上海家人那里听到一些，但是语焉不详，直到八十年代我

们才多次见面，在见面前我已从王元化同志处知道一些他的遭遇。在纪念胡风的一个活动中他来到北京，得以了解到比较详细一些的情况。1986年广州鲁迅纪念馆落成时又偶然相遇，1989年初我们又在宁波相会，……几十年的时间使我们——当时的儿童成了八十老翁。

我在周国铨面前一直以兄长自居。我对他有一种榜样作用，但是和他性格不同，他的性格没有我开朗，这同他的家庭环境有关。我的父亲长期失业，常常靠借贷典当过日子，但我家中和睦，家庭生活比较民主。他的父亲原是上海浦东杨思桥的大地主家中的少爷，本来是很富有的，但是鸦片烟抽得很厉害，因此家境逐渐衰败。周国铨的父母之间经常吵架，甚至动手打架。因为我们两家只有一块木板之隔，吵架时听得清清楚楚。国铨作为他们的孩子当然是很苦恼的，因此他一直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快活。家里吵架特别厉害的时候他就常常到我家来“避难”。我们一家都很同情他。他同我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比他自己家还亲。他要玩，也只有找我一起玩。对于我们两个一起玩的事情我可以很具体地记起许多事来，有一件还是挺惊险的。两人一起郊游，各骑一辆自行车，他摔到一条水沟里，我却连人带车摔进了龙华江。

我做什么事，他都跟着学。我喜欢自然科学，他也就向理科方面发展；我进清华物理系，他也投考清华物理系；我在清华参加“一二·九”运动，他受我影响对这个运动很同情；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他也参加了这个党领导下的青年团体。

在我与他之间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两个人在1937年7月28日那天，一起在北京郊区的田村遇到日本坦克车小队。我、清华同学赵德尊是共产党员，除我俩外，有周国铨，还有汤德明、向长青两个北京大学同学都被日军抓住，在战地被拘留了几个小时。这件事的经过在1995年我写的文章中作过详细的描写，就不再重复。那一天的经历讲起来也真有趣。

因此我和国铨在亲戚、朋友、同学等关系外，还有“难友”这样一重关系。

在日军把我抓起来的那段时间，我们亲眼看见日军对我二十九军战士的残暴行为——在田村街上，我看到一个二十九军战士的头颅被劈开，身体在台阶上，头垂下，脑髓流出。被拘捕后，我们估计是会被枪毙的。但当时，五个人中我和赵两个是共产党员不必说，其他人的表现也都很好。

那一天我和赵德尊是带着党交的任务离开北平的。包括周国铨在内的其他三个人没有那样的任务。因此火车经过保定时我和赵下了车。我希望周国铨也留下来，他没有接受，回了上海。后来1938年他经过武汉时我介绍他参加了党，我们又是党内同志。不过他逝世后发给大家看的生平中却写他于1951年5月入党。其中原因我不清楚，我想不外乎后来与党没有接上关系。我只知道他后来去了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毕业后当清华研究生，然后到英国学习电子管技术。建国后他在南京、北京、成都最大的电子管厂当过厂长、总工程师，并在电子工业部一个研究院当院长。他没有像我和孙钿那样有长期的坎坷历史，但文革期间像他那样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科技专家，也没有被饶过，他也受过冲击，被关押几十天。后来他从工厂调到电子工业部的一个研究院当院长。文革后我到他家去过多次，我在他面前从来都以兄长自居，他也是老样子，除叙旧外，谈谈彼此都有兴趣的科学技术问题。对政治和理论问题，他的兴趣不大，说得就很少。

他以一个为国家的电子工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的身份，给

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他的一生同孙钊的一生有明显的不同。我同两个人都没有说起对方的事情，这并不是有意回避，而是都没有人想起这个话题。

1996年10月3日

小学初中时期的三位老师

三位老师中，第一位的名字早就记不得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育却是一直不会忘怀的。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我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他的模样还依稀记得一些，他是个中等身材、二十多岁的男老师。虽然已经无法证实，可是我却认为他是共产党员。第二位是孙树本，建国后在北京工业学院做教授——现在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担任数学教授，不久前还见过面，他只比我大两岁。从第三中学初一起，足有两年多的时间我的确从他那里学数学。第三位也是北京三中的老师，教我语文。我一直记得他，而且我也判断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记得他的姓名。我现在担任三中校友会名誉会长的职务。一次去母校，谈起我这位老师，终于查明他竟是我知道的一个老同志：张苏。可是当我弄清楚这位老师姓名的时候，他已去世了。

一、感谢一位小学老师对我的帮助

小朋友们，这里我向你们讲一段自己10岁时的故事。今年我已经七十八岁了，也许比你们的爷爷的年岁还大一点。不过我也有十岁的时候，那是1925年。那一年，有好几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这里我只讲其中的一件。

1925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一所小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上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学校有一位教语文的老师给我们讲鸦片战争的历史。他除了讲课文上写的那些外，还利用上海是鸦片战争的一个战场这点，特别给我们这些上海孩子讲当初英国军舰攻进黄浦江口的故事。当时黄浦江口有两座炮台：一座在靠近后来上海市区这一边，守炮台的是陈化成，还有一座在对岸，守炮台的是牛健。当英国军舰想强行进江的时候，陈化成这边的炮火很厉害，打得很准，可是牛健这个胆小鬼临阵退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使得陈化成遭受失败，壮烈牺牲。这位老师给我们讲这段故事时讲得十分生动具体，而且充满着感情。通过他讲的这节课，我们知道了帝国主义的凶狠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这位老师不仅口讲，还带我们这班学生利用一个星期天坐火车去吴淞口的炮台湾，那儿还有陈化成用过的火炮。在炮台湾，他又补充给我们讲了当初陈化成在那儿如何牺牲的细节。不仅如此，他还带了我们这班学生去参观陈忠闵公祠堂。上海的老百姓为了追念陈化成，就在南市离我们那所小学不很远的地方盖了一所祠堂（用当代的语言讲，就是纪念馆），并且给陈化成起了尊称：“陈忠闵公”。在这个祠堂里，我们见到陈化成的塑像，更加深了对陈化成的印象，同时也加深了对鸦片战争中清朝朝廷（用当代的话说就是中央政府）腐败的印象。

我在小学里听了许多堂课，但没有一堂课比得上这堂关于鸦片战争的课对我的教育深刻。

在上过这节课后不久，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南京路惨案”。这个“五卅事件”，所有中小学课本里都有，你们当然也很熟悉。惨案发生后，上海的群众沸腾起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我们这个小学的高年级（包括我所在的四年级）也停课了。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小旗子，高喊

着“打倒列强”、“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英货”、“抵制日货”等口号，在街上游行，向行人和到商店里去作宣传。我们还背了一个竹筒，为声援罢工工人募捐。我们一连上街三天。带领着我们这一班上街的，就是上面讲的那位老师。参加这次革命活动，不但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觉悟，也提高了阶级觉悟。我们在街上募捐时，遇到一些人力车夫（上海叫作黄包车夫），当我们向他们募捐时，他们一般都表现得很热情，大把的钱拿出来给我们。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一些穷人；拉一天黄包车要向车主人付许多租金，剩下来的要用来养家。可是他们把钱拿出来时好像忘了还要交租和一家人还要吃饭的事情。有一个黄包车夫，把车上的座板掀开，把当天收到的所有钱一个铜板也不留下都给了我们，真使我们感动。我们还向阔老募捐。我们看到有小轿车来了，就当街站着，拦住车子前进的道路（有时用两根竹竿把车拦住），然后向坐在车里的人宣传，向他们募捐。开头我们以为有钱的人会拿出很多的钱给我们，可是我们发现坐在车里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却很不愿意拿钱出来。就是勉强拿出一点来，也出于无奈。在给我们那一点很少的钱的时候，还常常露出把我们当作“小叫化子”的神情。开头我们都想不通这是为什么，那位老师就给我们讲，社会上分作穷富不同的阶级，穷人心向穷人，富人心向富人。穷人要联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成功，过上好日子。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已经有了上面说的这种经历，老师这么一讲，道理就明白了。

这位老师是个男老师。到五年级以后，他不再教我们这个班，我们对他的印象也就淡薄了。一直到十多年之后，1942年在延安参加整风时，组织要每个人回忆和分析自己思想进步的过程，这时候我才把自己十岁时受到这位老师启蒙的事情记起来了。那时候我想那位老师是一个革命者，并且是一位很会教育后一代的教师。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甚至还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那时候我才感到自己应该很感谢他，是他带领我受到一次革命的洗礼。应该说这位老师是我的第一个革命带路人。可是在1925年时，我并没有这么去想，我不懂应该感谢他，我甚至把他的名字也早就忘了，而且一直到十多年后才想起他。对他的以后，我就一无所知了。十岁时的我毕竟太不懂事了。

我希望小朋友记住对自己的进步帮助特别大的老师。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像我十岁时那样地不懂事。

二、只比我年长两三岁的数学老师

1927—1930年，我在北京第三中学上初中。但我写的这位老师并不是这所中学的教员，而是距离三中校址只有五百米左右的“北京师范”的学生，而且他只比我高一个年级，年龄也只比我大两三岁。

我怎么会有一位老师呢？七岁那年，从看《三国演义》开始，我很快养成了自己读书的习惯。先是把我父亲藏书中的小说、弹词等看完，接着开始读家中仅有的几本社会政治书籍，然后在没有其他书可读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看我父亲学过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到小学五、六年级时，我总算学过了代数、几何、三角（那时叫八线），因此进初中时，我对学校里讲的那些数学课就没有什么兴趣。这时候，同班同学孙树滋告诉我，他的哥哥数学很好，许多学生找他补课。他说，他的哥哥名叫孙树本，外号就叫“算术本”。他说我可以找他哥哥。孙树本那时家住西四北护国寺旁边一条胡同里。那条胡同又窄又脏，却有一个很雅致的名称：“百花深处”。很快，孙树滋就带我去他家看他哥哥。

不但胡同狭窄，他们的家也很狭窄。不过孙树本似乎还独占了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内除床铺外只有一个书架和靠窗户放的一张方桌。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正有两个学生听他讲课。我就一边同他弟弟玩，一边等。不久那两个学生走了，他就跟我谈话，在问了我学校学习的经历和自己的打算之后，便要我学“大代数”。他当时就借给我一本《范氏大代数》。这本书是美国的教科书，是FINE写的。“范”就是FINE的译音。它有中译本。他要我回去看，例题自己做，每周来一次，有难处他帮助。回去后我就开始读。这本书不浅，不过我读起来不算困难。

遇到问题我就去问他。我每周都去他家。一去就讲数学。FINE大代数中有一元三次方程和一元四次方程的普遍解。解起来相当复杂，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找到这个普遍解的，而找到之后，讲起来并不难懂。当我学懂了一元三、四次方程的普遍解之后，我就问孙树本，五次、六次的普遍解怎么去找。他告诉我，一元四次方程式是最高的能够找到普遍解的，再高就找不到了。我有点不相信，问他是不是他不知道所以这么回答。他说不是的。我还是不那么相信，他就告诉我，解答一个问题受到数学工具限制的，用圆规和直尺就不可能三等分一个角，而二等分一个角是大家都学过的。他给我讲了一点高等代数、高等几何的知识，使我知道数学这门学问很深很大，不过他对我讲的，我还是听得不那么懂。问他，他回答了，但我还是不那么懂，也许那时他就没有法子给我讲懂。

过了半年多，大代数学完了，他就要我学解析几何，借给了我一本教科书。学了一阵子，觉得解析几何很死板，也比较容易，没有多大味道。我还是对平面几何有兴趣。几何证题千变万化，每道题都要用脑子。做每道题对自己的思维都是一个锻炼。有一本严济慈写的《几何证题法》，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每一道题我都做了。前几年一次遇见严济慈，我还提到这本书。孙树本看到我对解析几何不肯下功夫学，就告诉我，这门数学非常重要，并且说，还有一门数学叫微积分，就是以解析几何为基础的。后来，我读微积分的书之后，觉得他讲的很对。

这样又花了半年多，把这门数学也学过去了，我就开始自学立体几何、球面三角等等，这些课在学校里一般是不讲的，是我自己决定学的，花的时间也不多，他也给了我一些帮助。

他教我学数学，不单是学一门一门的教科书，还经常讲些书本外的东西。他讲，我们在学校学的是欧几里德几何，在欧氏几何中与一条直线平行的只有一条直线，可是还有非欧几何，在那里，与一条直线平行的或者有许多条直线，或者一条也没有。这些我当然不会真懂。他懂不懂我也不知道。他还告诉我，在几何学中还有一门形势几何，并且以四色问题、七桥问题为例来讲形势几何这门学问同我们学过的几何不一样。他告诉我，北大的江泽涵教授就讲这门课。这形势几何后来就被称为拓扑学。

一般的教师，大都比学生长一辈，即学问上要高一截。但是我的这位老师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他的特点，对我来说便是“带头羊”。他走前一步或者两步，并要我跟着他走。跟这样的教师学习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性”。

他的弟弟对数学没有兴趣，到他那里补课的那些学生也都满足于补学校里听不懂或者没有学扎实的那些东西。而我是个要求不断增进知识并且很性急的人，又喜欢提问题。这一点使他比较喜欢我，因此他同我的关系也就不同于别人。

他是一个学生，每天要去北京师范大学上课。课外，他非常勤勉地找许多数学书来看。他也不靠什么老师，因为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帮助不了他。在家里他是长子，除了那个与我同班的弟弟外，还有一个妹妹。我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在我印象中，似乎他是一家之主。他时间抓得很紧，不过他很爱帮助别人，显不出有舍不得花时间的想法。他总是很耐心，对我总是笑嘻嘻的。那时他的面容至今还给我留下印象。

初中毕业后，我考进师大附中，他考进北大预科，我们之间就不大来往了。后来我去了上海。以后，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党的青年工作，后来又在陕甘宁边区呆了六年。抗战胜利后，又在各地奔波，同他完全没有了联系。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遇见他，知道他一直在国内，没有出国留学，还在大学任教，还是教他的数学。后来听说他在北京工业学院当教授。

三、他就是张苏同志

1927年进初中时，我爱好文艺，那时我也同两个同学办了一个手抄本的文艺刊物。我写武侠小说。那时根本不懂得文学的革命意义的功用。这时学校的这位语文教师给我们讲鲁迅以及中国的和西洋的文学家和名著，大大提高了我的认识。他特别喜爱鲁迅。在语文课本之后另外选了不少，自己还刻了一些蜡版，油印出来发给同学。我不满足这些油印的“讲义”，就买了《呐喊》、《彷徨》和《野草》来看。别的同学也有这么做的。有了书我就把讲义还给了他，我对他说你辛辛苦苦为同学们准备的东西，将来可以给别的同学看。他上课不只是教我们语文知识，而是充满感情去讲作品的内容，对同学们感染力很强。鲁迅的作品中的《药》、《祝福》故事情节本身非常能感动人不必再说外，就是《阿Q正传》、《孔乙己》等文，听他上课也在我心灵中激起我的同情之心和对旧社会的不满。

我不想在这里说明何以在二十年代我就有判断某人是不是共产党员的观念和具有某种能力。要讲一点那就“说来话长”了。我只想听他在听他上课时，我越听，他越像是个共产党员。他教了我们一个学年就走了。没有想到1995年夏天我去母校时谈起这位老师，同现任的三中校长一起从各方面考证一番之后，我确认这位老师就是张苏。建国前后我和他都没什么往来，但彼此闻名。我知道他做过我们的察哈尔省省长，他最后的职务是我国高等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我也见过他，说过话。但做梦也想不到他就是使我受到很深教育的那位老师。不过在我弄清楚这一点后，他已经去世了。在三中了解到他的姓名之后，我听说张苏原住红霞公寓，我就到那里去找他家，我想对他的子女谈谈他和我的师生关系也好，可是到红霞一问，不太久以前他家又搬走了，并且那儿的人不知道他家的新住址。我想，张苏如果还在，他不会想到我会因为当初他在三中教书时给我的帮助向他表示感谢而去的。

我和他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写和我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程力济（程淡志、卢明德、李光）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六十多年前我不和他一起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最后放弃原先的理想，而一直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我所能取得的成就是否会比现在大一些。我说“忽然想起”，那就是说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今年是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了六十年的年份，级友们发起编辑印刷一本纪念册，每个人提供一张或几张照片，并且自己写一些话，印出后

人手一册。我为这个纪念册提供了五张照片，每张照片旁边各写一句话，其中第一张照片就是 1936 年我大学毕业时拍摄的，旁边写的话是“我从自己大学毕业时拍摄的照片中选了这一张，照片中的我‘少年英俊’，用北京土话来说是够帅的。这一年我大学物理系毕业，也就在这一年我放弃了做物理学家的梦”。我放弃做物理学家的梦，出于自己觉悟的提高，是义无反顾的。我从来没有思量过有可能走别的路，至于自己如果继续研究物理学，会获得怎样的成就，更从来没有想过。可是写这篇文章时我却想，如果程力济一直搞自然科学，他的成就一定会大得多。不过我了解他，他也会同我一样，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认程是在 1932 年从上海大同附中升入本科的第一个学期。也就在那个时候，程在育才中学初中毕业，跳了三年，弄了一张假文凭改名考入大同大学，成为本科生。我们于是成了同年级同学。这时候我住在大南门内的顾家弄，他住在小南门内的药局弄，凑巧都是五十五号。上下学同路，就这样边走边谈，越谈越投机，越谈友谊越深。

开头我们谈的话题是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什么都谈，当然不是谈教科书上的东西，而是书本上没有的、课堂里不讲的东西和一些自然哲学方面的问题。比如在数学方面，我记得谈过的就有罗素的关于“什么是数”的理论。我在高中时就注意读自然科学方面的课外书。他本来是初中学生，我想不到他的知识也不少。他比我小半岁。我不清楚为什么他初中毕业时年龄会这么大。我们各自看了一些杂书，在谈话时就讨论，从学校到家，半个多小时总谈不够，因此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还接着谈下去。

我们谈的题目很多，大都忘记了，但也记得一些。比如我们从读到的初等数学中，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去“研究”。比方说排列组合在初中代数里就学过，后来学了有机化学，知道了由同样数目的碳原子和氢原子结合而成的碳氢化合物可以因为原子组合的方式不同，而有数目不相等的化合物。比方说 CH_4 只有一种化合物， C_2H_6 、 C_3H_8 也都只有一种。可是 C_4H_{10} 就有两种化合物， C_5H_{12} 就有三种。我们就讨论 H_{2n+2} 的化合物数目的普遍公式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先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但是要把其中的函数关系求出来写成公式就不容易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讨论了不止一个。有的得出了解答，有的得不出解答。还有像五次和五次以上方程式的普遍解问题，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用初等数学方法求出的，但是不服气，就拼命去解，不知道这个问题是高等代数之所以发展起来的一个课题。物理学、化学中也有一些类似的问题。

我记得我们谈了 J. J. Thomson 的《科学大纲》这本书当时商务印书馆已经出了中译本。我喜欢这本书，它通俗地系统地简洁地介绍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等许多基本知识，可是读到最后一章“灵学”时，我真既惊讶又气愤。一个大科学家怎么会信江湖骗子搞的扶乩神媒这样的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介绍程也去看看这本书，然后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反对灵学（今天有人把它叫做“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说来也相当久了。

这时候已经在“九·一八”之后。“九·一八”使得我们感到有亡国的危险。学生中的抗日运动开展起来。虽然那时我们并没有一下子改变我们对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可是对政治、对社会的关心就越来越强。那时我们觉悟到民族受欺凌的原因是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上，因此就把很多注意力移向社会问题。很可能是程从什么书上学会了一些社会调查的方法。其中有一种是

家庭调查。我们就先从自己身边调查起。程的家在上海有五口人，父母和两个独身的兄弟。住的地方是独门独户，两上两下的小院。需要调查的工作不多。我的家庭也很简单，父母加上我和弟妹。家的状况我也完全清楚。可是我家住在一个杂院里，在这个院子里住有一、二十家，一百多人。在这个大院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上海乌七八糟的东西在这个院子里可以看到不少。我们开始科学地研究这个大杂院。程对这个大杂院非常有兴趣，对这个大院里的人事，许多是他原先闻所未闻的。这种“研究”对我也有好处，我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这个大院的许多事情我当然知道，但在我俩作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我对各户情况的了解深入系统了，虽然没有再去作更进一步的调查。在作了一些家庭调查之后，程还提出要做更大范围的调查。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先去调查公共场所。第一个想到的是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的城隍庙这地方我们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但是没有科学地观察过。这次去我们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是看到那儿去买东西、吃、玩的都是些怎样的人，看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二是去看在那里的迷信活动。办法一是注意看，一是去同人们搭讪。当然这种调查没有多大收获，但也还留下了比较清晰的印象。去了城隍庙后又去八仙桥“大世界”。有一天我们带了吃的东西，带上笔记本，在大世界呆了一整天，一边看，一边议论，也在笔记本上记了一些东西。那天我们在“大世界”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留下了印象。如看到野鸡拉秃顶并烫有香洞的小和尚，拉的结果小和尚笑嘻嘻地跟着走了等等。总之我们的社会调查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也没有投入多少时间，更说不上有什么大的成就，值得说一点的是，我们总算有了社会调查这个概念，它对于我们的进步还是起了作用的。

1934年我转学清华后，我和留在上海的他，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交流各自在当时了解的东西。我们间的信写得很详细，有时一封信分装在两个信封里面寄出。信中当时也继续讨论一些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问题，但是越来越少。那时已经是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了。在这一年中我们对大同大学女同学忻爱华自杀问题讨论得特别详细和深入。忻爱华是比我高大概四个年级的同学。她的专业是外语。本来我是不可能对她熟悉的，但因为她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打工”，而我是个经常跑图书馆的人，彼此就很熟。我借书的方式也特别。大同大学图书馆的书库是不开放的，可是我常想对许多书进行浏览，常常一次借许多种书，开了书单交给她，让她把书抱出来我翻了一下之后还给她，又借第二批书，去一次图书馆常要她把书抱出抱进好多次。然后才坐下来读一两种书。可是忻爱华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忻爱华的个子不高，白净的脸，嘴唇上长有比较浓的绒毛，说话带有一些浙江口音。她有病，咳得很厉害，后来知道她患有肺结核。在没有人借书时，她总是很认真地在读书。后来程进了大同，他也常去图书馆，我们俩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

忻在我去清华之后，大概在1935年初自杀了。程告诉我有关她自杀很详细的情况。看来他是做了调查的。他具体分析了忻爱华自杀的原因，有各方面直接的原因：经济困难，父母的封建思想很严重，要她嫁给她不喜欢的男人，不能同她心爱的人结合。她患有重病，但学校只知利用她的廉价劳动力，不关心她的健康等等。于是忻走上绝路。我们分析的结果，她不幸的自杀，归根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罪恶制度。忻爱华的命运，在许多小说上也可以看到，但我们不是在看小说，而是对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真实的人的直接了

解和调查，因此特别亲切，也特别动感情。这对坚定我们走向革命起了作用。1935年暑假回到上海后，我和程到了上海郊区去寻找恻爱华的墓地，凭吊了一番。

到1935年放暑假前，程已经同他育才中学的几个老同学一起酝酿如何去做唤起民众的工作。暑假我一回到上海，我和程及他的几个朋友就先是在上海静安区附近办了一个工人识字学校，利用这种形式向工人讲革命的道理。在这个工人学校上了轨道之后，我又和程去杭州郊区，到农民中去活动。1935年暑期我和程在上海的活动同党组织或任何政治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自发的行为。而且那时我刚二十岁，他还不到二十岁，当然非常幼稚。而且这些活动也谈不上收到什么效果，但是我们认为自己不但有了革命认识，而且有了“革命的行动”。

从1932年我们相识，到1935年那次我们一起在上海和杭州郊区的活动，我们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1935年暑假到1936年，这一年中，我在北京、他在上海投入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1936年暑假我们在上海还参加党的文委（虽然此时文委还没有同党取得正式的联系）领导下的一些活动。经过他介绍，我参加了党的第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外围团体——自然科学研究会。我们还同共同的母校大同大学和它的附中的同学，邹强、侯德齐、吴学毅、周家鹏等参加校内和校外的活动。而到了1937年初，我在北平入党。有一次因我寄给他一篇少奇同志的文章，被上海特务查到，注意到他，去找他的麻烦，他就在黄浦江畔制造了一个假自杀的现场，自己则去了太原。抗战爆发后我在太原找到他。见到他后，我在太原介绍他参加了党。在这以后又有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做党的工作。现在他已经离休了。离休前他的工作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这个所的所长是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年级同学、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程离休之后，仍努力工作。这时候除了一般的社会活动外，他又对某些数学问题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很感兴趣。这样的难题他当然没有可能解决，但我对他的这种精神发生了兴趣。

现在我回到这篇文章开头我提出的问题。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程在六十多年忠心耿耿、切切实实的奋斗中，对革命对党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是如果他不是在以后放弃了自然科学，我想他的成就或许会比现在更大一些。他在这方面更有长处。当然我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过，他自己一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即使是我替他设想，这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他的经历都是历史决定的，在太原入党后，他同我一起到武汉，他做了武昌区委书记，后来到郭老的三厅带了一个抗日宣传队，到各地演出等等，从事他不熟悉的工作。我之所以想到如果他一直搞自然科学成就会更大些这个问题，只是感到他的性格与才能比我更适合于搞自然科学罢了。

金岳霖 我最“老”的“老”朋友

1996年7月间，在北京举行的“金岳霖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我得到了一本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一看书名就可以知道书分做两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别人写的回忆文章、传略和大事记，第一部分九十页是金岳霖自己写的。金岳霖1895年诞生，1984年去世时九十岁。他的这些回忆文章是1981年到1983年，即86岁到88岁在病中

断断续续写的。共写 49 篇，可是只用了九十页篇幅，平均每篇不到两页，但很具体生动，把他的主要经历、他的社会交往、他的学问、他的思想演变、他的性格、他的特殊爱好都描绘出来了，读起来很有味道。前些年我动过写一篇回忆金岳霖的文章的念头，但一直没有动笔。得到那本书后，读了他写的这些，促使我提起笔来。因为我读了他写的回忆文章有些感想想发表，同时我同金岳霖相识到他逝世有五十多年之久，也有一些回忆想写。

一、最“老”的“老”朋友

前一个“老”说的是相识的时间之早，后一个“老”说的是在我的朋友中他和我的年龄差距最大，如果他还活着，现在有一百多岁了。

我和金岳霖相识的时间是 1933 年，离现在有六十三年了。我认识他时，我是十八岁，他是三十九岁，他的年龄是我的年龄的二倍还多三岁。

我们怎么会相识？说起来真有点特别。

那时我在唐在章家做家庭教师，教这家的三个孩子。大的刚上高中，小的才进初中。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是我给他们上课的时间。我到他家后，孩子们的妈妈对我说，今天你能不能给孩子放假？有一个我们家的朋友来，小孩子要和他一起玩。你也别走，你和他也可交一交朋友。

是个怎样的朋友呢？

他来了。高高的个子，穿了一套颇为讲究的西装，戴了一付墨镜，头上还戴着一顶遮太阳的鸭舌帽。见面时，女主人介绍他和我相互认识。她对我说“这是清华大学的金岳霖教授，大哲学家，才从北京来”，又对他说“这是郁家哥哥，小孩子们的老师，别看他年青，可有学问呢，他也喜欢哲学，将来也许会到你那里当教授”。两个人一握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这天我们一起玩。先是去打网球。我不会打，坐在一旁喝咖啡，跟最小的孩子东讲西讲。打完球在那个挺高级的俱乐部吃了西餐饭后，又一起去了他的寓所。他有一个哥哥在上海，他住在一间客房里，房间里有一个藤制的书架。我望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全是关于打桥牌的。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关于打桥牌有这么多的学问。

他是到上海来过暑假的。我们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向他请教什么。我看出他和唐在章家的人很熟。不久前，他刚去美国休假了一年，讲了不少见闻。小孩子们，还有我，听了津津有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那个星期天就这么愉快地过去了。开头女主人向他介绍我之后，我真有些怕他考我这个“未来的清华哲学教授”。还好，他只去同小孩子们讲这个讲那个，不想考察我的“学问”，审查我的教授资格。

这回我在《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中看到一篇他写的回忆。文章的题目很怪：《在北京，车是极端重要的》。文中提到唐在章在北京的家里很可能有一辆汽车。里面写他和唐在章“这一家的朋友关系长了”。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不但写到唐在章（当时是外交部的一个小官），写到唐在章夫人（就是介绍我和金岳霖认识的那个女主人），也特别写到他家的三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三个学生）。他写道“唐家有三个小孩，大姐、二哥、小‘老薛’。为什么叫‘老薛’？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现在我和‘老薛’仍然是隔些时总要见几次面的老朋友。她曾说我是她最老的小男朋友，我听了高兴极了”。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讲他同唐家是怎么熟起来的，只是讲他和小孩子们的友谊，说“友谊的开始也很特别。小孩总是要听故事的。我那时能讲的故事最方便的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这可合他们的口味。我没有记住讲的次

数，总是不少的”。

唐家的三个孩子我都挺喜欢，尤其是那个小“老薛”。我教她“四则”和“小代数”时，她只有十二岁，是个十分可爱的小姑娘。金岳霖也一定很喜欢她。我在纪念金岳霖百岁诞辰的会议上得到他写的这篇文章后，打电话给“老薛”（她的名字是唐笙，现在也七十多岁了）。她告我还没有这本书，我向哲学所要了一本，请她到我家来把这本书拿走了。

现在我说金岳霖是我最老的老朋友，除了第一次我同他见面时“老薛”的妈妈当时所作的介绍外，还有两个根据：一个是1934年我转学清华物理系三年级后，常去论文导师周培源处。一般每月一次。每去，周师母总留我在他家吃饭。有一次吃饭时金先生去了。周先生正想告诉他关于我的姓名时，金说不用了，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老朋友”三个字是他自己说的。还有一个论据是，他同“老薛”是朋友，而“老薛”又同我是朋友，我也就是他的朋友。金是逻辑大师，对我这么推理，一定认为不合逻辑，但我认为这个推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二、古典式的家庭和爱情故事

1934年我到了金岳霖教书的清华读书，两人在同一个校园里却没有往来。我没有选哲学系的金先生的课。那时清华物理系的课程很紧，我又对抗日工作很积极，还要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赚钱，我实在太忙了。

在清华我听到了他和林徽因、梁思成之间的故事。我听到的故事非常简单，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金岳霖的情操品德“真高尚”。这回得到那本书，看了金岳霖自己写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也看到林洙写的《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始终是好朋友》，对他们三人间的关系就觉得很清楚了。

金岳霖的文章把三人间的亲密关系作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他用“打发日子”来形容他长期不成家的寂寞生活。讲他和林徽因梁思成抗战前在北京、抗战中在大西南、抗战后又在北京一直住得很近或者就住林梁家里的情景，又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和感觉的分析。而金与林徽因梁思成之间的关系，其实许多人都知道，金因和林徽因的相爱，又不能结成夫妻，终生不娶。林洙在其文章中写道：

“我曾经问起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他们三人间的关系真有点像西洋古典小说里的故事。梁思成、林徽因去世之后，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就一直同金岳霖住在一起。金最后就住在离我家非常近的干面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住的时间很长。

三、建国后金岳霖哲学思想的转变

同在清华两年，我没有去打搅过他。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四年，更没有同他有任何接触。建国初期，有好几年很少去清华北大，又一直没有见到他。由于我一直在党中央宣传部负责联系理论和科学方面的工作，需要了解了解学者——不论是自然科学家或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的状况。特别在 1954 年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期间，我需要对我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进行多一些了解。我也问起金先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多数人讲他思想能跟上形势，但还有一个人说了一些不那么好的话，说他在建国后，经常作“深刻”的检讨，有些过分，对别人的批评也偏左，有言不由衷地应付局面、但求过关的表现。说他的这种作法使别的学者被动，别的学者心里不满意又不好说，等等。我相信这位同志讲得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对金岳霖从来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不信他会有任何在认识以外其他不纯的思想。

于是我就找了几篇他新写的文章来看。看了之后我完全肯定他是一个只服从真理、勇于自我批评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能在这一点上想通了，接受了，就承认自己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他自己的《回忆》中，他写道，自己“在政治上追随毛主席，接受革命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指 1981 年到 1983 年写《回忆录》时）仍是如此。”建国初期，我在中宣部管政治课学习。那时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非常想了解是什么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大哲学家金岳霖我想也是其中一员。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从前接触到的各种哲学体系“都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他的这个看法也曾经对我表示过。不过也许有人会说，“他有可能想到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而且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中管理论工作和社会科学的干部，他给你说的话未必是他真实的思想”。可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冯契在自己的回忆中，也写道：“金岳霖即便在私下里也表示自己从前的哲学体系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明。”冯契的话作为证据，力量更强。还有一件事，是倪鼎夫文章中写的，1958 年金去英国访问时瞻仰了马克思墓地，同时也看了斯宾塞墓。斯在十九世纪在英国影响很大，著有三个大部头著作和十卷本《综合哲学》，在当时英国的思想界俨然一个巨人。金岳霖在访问时对一起去的人说，马克思生前名声并不大，留下了《资本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学说越来越焕发出夺目的光辉。而思想巨人斯宾塞就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从他的这一番感慨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深处。

可是我在 1954、1955 年看了他新写的文章后，给我一个印象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毕竟不够长，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加上他经常接触到的是在高等学校中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据我所知，那些人中的左倾思想对金也产生了影响，还没有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因而他有一些不恰当的看法，但这完全

是他出自真心，决没有见风驶舵，人云亦云的因素。同时我也看到，他写的东西是用自己的真实思想用心写的。他做的那些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的自我批评和对那种哲学思想所作的批评中有不少经过他思考得出的很有价值的论点和证据。

他的哲学思想又有他不愿放弃的东西。他在《回忆》中写那篇讲自己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还特别表明在宇宙观方面“我仍然是新实在主义者”。

四、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

这也许是牛顿的真实故事。他家养着大猫小猫各一，房间里应该有洞让猫出入。据说大科学家牛顿（也可能是有人编造出来的）竟提出挖一大一小两个洞的方案，忘了小猫也可以从大洞里出入。这说明大科学家也会犯常识性的错误，传为笑话。金岳霖在他的晚年也有类似的笑话，从这些笑话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有一件事是我在《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中黄集伟写的一篇短文中看到的，文章中写道：

“某日，梁先生见其厨师外出采购，手捏一张数码为五千余元的人民币活期存折，惊疑不已。找到金先生问其缘由，金先生答曰：‘这样方便。’梁先生曰：‘若不慎遗失，岂不枉哉？’金先生依旧说：‘这样方便。’梁先生说：‘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谁知金先生连连摆手：‘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先生无奈，只得为其细述储蓄规则多项。述毕，金先生满脸欣然，停有片刻，说：‘你真聪明。’当然，最终此事亦非就此了结。‘改存’之日金先生几欲打退堂鼓，理由是他预备在自己死后留一千元钱酬谢厨师——‘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了？’这回梁先生不能不笑。笑罢，梁先生又将如何将那一千元酬金抽出为厨师另立户头之类细细讲演一番……未了，金先生重又孩童般喜作一团——‘你真聪明！’据悉，梁先生自金先生口中很赚过不少如是之褒奖呢。”

金岳霖一生未娶，雇一厨师，他不把自己与厨师的关系视作简单的雇佣关系，厨师也帮助金做其他家务。金竟想到从自己死后留的五千元的储蓄中取出百分之二十给厨师表示感谢也表现出金的为人之道。

还有一件事也是黄集伟文章里写的。

“另有某日，伏天，数位友人同往金先生舍下闲坐。一进门，便见金先生愁容满面，拱手称难：‘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友人既不知何事，又不便细问，但念及‘金老头儿’独身一人，不便诸多，便作英雄状慷慨允诺。俄顷，厨师为来宾每人盛上一碗滚沸的牛奶……英雄言辞尚余音缭绕，无奈，只得冒溽暑之苦，置大汗淋漓于不顾将碗碗热奶一饮而尽。谁知几位不几日再次光顾，重又承蒙此等礼遇，且金先生口气坚定，有如军令。事隔有旬，好事者向金先生问及此事，方知原来金先生冬日喜饮奶，故定量可观；时至盛夏，饮量大减，却又弃之可惜，故有‘暑日令友人饮奶’一举。也许金先生以为订奶有如‘订亲’，要‘从一而终’，不得变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增减尽由主人之便的通例。当友人指点迷津甫毕，金先生照例回赠那四个字的赞许：‘你真聪明！’”

金先生晚年还有趣事，这件事虽然同大洞小洞的故事的性质不一样，我也想附带写一下，那就是金岳霖坐板车到王府井一带转悠的事。这件事当时

我听人向我详细地描绘过的。对这件事在黄集伟文章中有一段叙述：

“……金先生患有青光眼疾后，常就医于‘协和’。‘文革’伊始，‘革命派’不许金先生用车。金先生闻讯问曰：‘停用专车可以，可我怎么去‘协和’看大夫？’‘革命派’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吧！’在‘革命派’来说，此为戏言？揶揄？抑或是推托之辞？不得而知。反正金先生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每于就诊之日，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汪曾祺在回忆金先生时，也写了金先生深居简出，当他想看看外面的风光时，就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人约好，常常坐这平板车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有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五、后悔没有向金岳霖好好学习

建国后金岳霖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之后，我在中宣部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文革前我还是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并且在所内还兼任自然辩证法组组长、哲学刊物的编委。我和他是哲学界的同行。在某些哲学组织中常常都有我和他的名字。文革后，他和我都在社会科学院，我们又认识得那么早，许多年来，我和他寓所很近，他住的那栋宿舍楼，从我的南窗都可以望得到。我也有时到他住处去闲聊，既讲过去也讲现在。在他写的《回忆》中，有些故事曾同我讲过。他还讲过在清华他与侯德榜一起参加的一次考试。考点名叫到某人考中允许出国留学时，这个人就要大声说“有”，像个军人那样。他讲这个故事就大声用湖南话喊了一声“有”，那时他的神情声音似乎就在眼前和身边。可是我一直没有认真向他请教问题。

我也是个爱好哲学的人，我也知道金岳霖有许多独创的见解。我回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会不向他请教哲学。想清楚了，根本原因是，没有好好读他写的书。他的红封面的那一本《逻辑》，我曾经读过一部分，可是没有读下去，隔了一段时间就忘了。他的《知识论》，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曾经作为批判资料（用了一个客气一点的名词“参考资料”）印出来之后给了我一本（不是正式出版物，没有封面，厚厚的一本）。我翻了一下，觉得这本书的分量不轻，我一直想好好地看一遍，却没有下决心拿出这个时间来。事先没有看，我就不敢向金先生请教。没有看他的书，问题提不到点子上，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又一次拖下去，因而始终没有好好谈过一次。

放着一个大哲学家在自己近处不请教，在他去世后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今年春天开纪念他的百岁诞辰的会时，会议的组织者要我讲几句，我认为自己也应该讲几句，应该对我后悔没有向他学习这一点进行反思。我认为写关于金岳霖的纪念文章就应该对他的哲学观点进行评论。我知道金岳霖的脾气，最好能和他讨论，甚至争吵一通他就高兴了。学者最怕的就是文章发表了没有人看。可是我不但在他生前没有那么做，就是到了他百岁纪念时我还未能做到。在这个会上发给我的书只有一本《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许多他的学生和写的文章不少，介绍了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相比之下就很惭愧。大会上要我讲话，使我后悔自己这几年把当面请教的这么好的条件丧失了，而且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去年他的弟子，也是我的好朋友哲学家冯契逝世。我也没有来得及向他请教哲学问题。我在《文汇报》上写的那篇《怀念冯契》也未能评论他的哲学思想。我在金岳霖百岁诞辰纪念会上请哲学所的负责同志帮忙找了四大卷《金岳霖论文集》，还是想找时间

好好读一遍。

恩师和战友

——祝培源师九十寿辰

不论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读书时，都有几位老师对我知识的长进、思想的提高起了使我终身难忘的作用。最近我在《我的教育思想》中写到这一点。在所有的这些老师中，同我关系最深的，莫过于培源师。他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导师。在建国前，我从解放区来到北平时也多次见到他。在建国后的四十多年中，我们都积极参加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工作。我和他还多次一起出席国际会议，从事坚持世界和平的斗争。他不仅是我的恩师，还是我的战友。因此在1992年他九十寿辰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很想写这样一篇向他祝贺的文章。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座标系在引力场中的运动》是培源师经过很郑重的考虑选定的。我很愿意在他的指导下写这篇论文，因为我在清华大学学物理时的兴趣是研究万有引力理论。那时我在哲学书上学得了从现象到本质、从第一本质到第二本质……的思想，正在思考万有引力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我很愿意做广义相对论方面的题目。培源师提出这个题目的契机是，他从国外文献上得知Willis在前不久重复Michelson和Morley在二十年代证实狭义相对论的那个实验时得出，在顺“地球在太阳系中前进的方向”与顺“与之相垂直的方向”光速存在差异这样的结果。Willis认为他观察到的一种差异超出误差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外。如果确实是那样，培源师就认为很值得注意，可以怀疑这是引力起作用的结果。在题目选定之前，培源师要我再研究一下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和研究一下Willis的实验报告。在题目选定之后他要我自学Riemann几何，掌握研究这个问题的数学工具。我还查到在荷兰刊物上有两篇有关论文，于是就学了点荷兰文初步知识，了解了它们的内容，向培源师作了介绍。写论文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写论文的工作开始得比较早。在最后一个学年开始不久就动手了。工作了不那么长一段时间，我就遇到四个未知数只有三个方程式这样的问题。因此需要提出一项物理学上的假设，这当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困难工作，因此也就需要经常到新南园培源师家研究。这当然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结果。好几次说话未了，我都记得他总是说一句“rathertroubtesome”作为结束。

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形势日趋严峻，我也越来越不能安心学习。在“一二·九”游行后，我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更下决心放弃自己多年想在理论物理学方面有所成就的理想，以全部精神投身革命事业。因此，也就没有在写论文上继续下大功夫。那篇论文虽然在培源师的指导下最后完成了，但我一直有一种对不起他精心指导的思想。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差不多一个月去新南园一次。每次去谈话的时间都很长。周师母每次都下厨房留我这个学生用餐。在那段时间里，我同老师、师母谈话的话题很广泛，除关于论文的事情之外，什么都谈。而当时时事和清华校内同学从事的抗日活动更是少不了的话题。他很关心同学们的斗争，

特别关心物理系的同学，包括我、杨学诚等等。他是特别同情和关心我们的。

1936年，我大学毕业了。暑假后去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按照当时清华教授工作四年可去国外访问一次的规定，他去了 Princeton 找爱因斯坦进修。在1937年他回到北平时，我则由于自己在广州组织的那个救亡团体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也回到了北平。那时我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工作。培源师知道我在北平，就把我找到清华园，告诉我他指导我写的那篇论文，在 Princeton 给爱因斯坦看了，爱因斯坦看了还提了一些意见，要我根据所提的意见进行修改，改定后用他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发表。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准备去他那里详细了解爱因斯坦的意见和研究修改方案。可是没有过几天，芦沟桥炮声一响，我没有能再去找培源师。这又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

培源师给我出的那个题目是他自己想研究的。直到八十年代，他告诉我，国际物理学界在与这有关的问题上有些进展，他也正带了一名研究生在研究。不过我早已荒疏，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做什么工作了。

1949年初，我从河北平山来到北京，同培源师又见了面。那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开始在中宣部的政治教育处和理论宣传处，后来到科学处，分工抓科学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这样我与培源师见面的机会就多了。1956年初我参加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工作，会后被周总理任命兼任国务院专家局的副局长，接着参加1956—1967年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在这段时间内，我常有机会听到培源师同志关于发展我国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宝贵意见。他的意见很能代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并且发言的精神都是很积极的，对于党和政府很有帮助。因此在参加起草有关这方面工作的文件时，我常常引用他的发言。他的发言使我感到他同党完全没有距离，完全符合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我关心他的入党问题，询问了一些同志，知道他已经参加了党。他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在党特别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教育事业那个时期最早参加党的人之一。我为党能够有培源师这样学术造诣很高的人加入到自己的队伍来、改进党的成分而高兴，也为培源师因此可以得到党组织更多的帮助从而能更快的进步而高兴。从此之后，培源师和我在师生关系之外又多了一层党内同志的关系。我经常向他请教许多有关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事情。由于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物理系调整到北大，培源师也就转到北大任教，并长期担任校长职务。以后他又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

由于培源师在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地位，由于培源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积极性，他自然而然地受到国内外科学界、教育界的尊重，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的著名代表人物。1964年在我国科协发起下，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科学讨论会——“北京科学讨论会”。培源师是这个讨论会的我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世界许多国家派了有较高水平的科学家到会。尤其是日本，派了以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为团长的代表团到北京。在开会第一天，毛泽东接见各国与会代表时，见到坂田时就说：“你的那篇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指的是坂田昌一写的，翻译成汉文后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的那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在接见北京科学讨论会代表的第二天——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就把培源师和我找到他在中南海的卧室，就坂田昌一的文章交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谈话时毛泽东靠在床上，一见面就向我们表示歉意，说自己习惯于靠在床上工作。我们也见到床的内侧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谈话时只有毛泽

东和我们两个人。毛泽东的秘书在把我们引进卧室时给三个人各泡了一杯茶，然后就出去了，因此谈话时安静极了。那次谈话讲了许多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这次谈话培源师作了笔记。我在整理这次记录时拿到了培源师的笔记。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不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培源师的笔记是否还能保存着。这是培源师和我的一个共同值得回忆的事。我整理的谈话记录，由于我给一位负责同志那份被抄家时抄走了，所以就传出去了。但这份谈话记录一直未选进毛泽东的著作出版。今年我应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要求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文中对这次谈话有所追述。

我在培源师指导下写毕业论文时已经对“自然辩证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在抗战前的上海、抗战后的延安、全国解放后的北京，我一直没有中断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后我发起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培源师也支持这项工作。他积极参加这个研究会的工作，在第一届理事会上当选为副理事长，后来成为这个研究会的荣誉理事。培源师对这项工作的支持，使得我和许多热心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同志得到很大的鼓舞。

在文革后，培源师在任北大校长时期，在工作中也有一些苦恼。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常去北大燕南园。这使我想到了当年我写大学毕业论文时去清华园的情景。我在燕南园培源师家，一坐就很久。在培源师、师母和我之间谈话的话题也很宽泛。除工作之外，也谈国家大事和教育界、科技界的事情。不过这时我的年龄已经大大超过他当年在清华新南园当教授的年龄。当初年青学生的我，已年近花甲，冉冉老矣。但培源师的精力不但仍非常充沛，而且思想比以前更加开阔，看问题更为深邃，人也更加健谈了。

我同培源师有一段时间能够朝夕相处，那是两次一起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而且都是他担任团长，我担任代表团支部书记。这样的会一次是1960年12月27日到1961年1月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届“普格华许”会议，一次是1961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联会议。

参加这样的会真是苦差事。那时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但还要维持一个盟国的外表。我们要和他们一起同西方国家斗争，可是这时苏联又常常想同西方妥协，而我们又反对他们那么做。这样的会议又常常要通过一个什么声明之类的东西，我们要对这样的文件负责，又不能在文件上出现违反我们立场的语言，必须据理力争。而且由于“外事工作授权有限”，许多事情都必须向国内请示。会议期间常常每天都要向国内发报。所以，这样的会议时间虽然不长，却搞得精神很疲劳。

第六届普格华许会议更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会议。

“普格华许”是加拿大一个渔村的名字。在罗素的支持和美国一个资本家伊顿的资助下，组织起一个由若干“有核的国家”的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裁减军备、争取和平的会议。因为这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伊顿的家乡“普格华许”的别墅举行，会议就取了这个名字。第一届会议，培源师就代表中国科学家参加了。第六届会议比起以前的会议来说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会议恰好是在肯尼迪刚当选为美国总统而尚未就任，而会议的东道国苏联是赫鲁晓夫当政，特别想跟美国拉关系时举行的。这两大国都想利用这个高级科学家们集会的机会互相摸底，进行政治交易。因此苏美双方代表团的阵

容都非常强大。苏方派出苏联科学院当家人、院士秘书托普契夫任团长，许多著名的院士为团员，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后长期居留英国，不久以前才返回苏联的低温物理学家贾比才。美方代表团学术水平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派了肯尼迪的重要智囊人物、以后担任总统安全顾问的罗斯托做“秘密团长”。这个代表团的份量自然很高。我国也特别重视这届会议，组成了培源师为团长、于光远为团员兼支部书记，还有张维、冯宾符为团员的代表团。工作人员有外交部联合国处处长张宗安、外交学院的束思明、驻莫斯科使馆的刘君礼等，阵容也比较强。

这个会议的核心是美苏之间关于核裁军问题上的争论。苏方主张裁减核武器，强调裁减后各国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更好地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美国则强调各国要公开自己的核储备，并且允许他国对之进行监测，否则裁减军备是句空话。苏联对美方的反驳是，在裁减没有作出保证的情况下，互相增进核储备等监测，反而会刺激核军备扩张。总之双方都没有裁减核军备的诚意，都在用裁减核军备的“讨论”来为核军备竞赛打掩护。对于美苏间的这个争论，我们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同时核大国又反对在已有核国家之外有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认为这会增加核战争的危险。对此我们的态度是，核战争的危险来自核大国，不应转移世界舆论的视线。我们的态度鲜明，立场严正，是真诚地为坚持世界和平在进行斗争。我国代表们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会议所争论的问题当然不会取得结果。当时还属于冷战时期和核竞赛时期，想对裁军能够有所推动，事实上本来就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那就是在会议开幕、各国代表步入会场时，一个美国代表见到培源师的胸前佩有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标志，就伸手给培源师，说：“我是美国代表团的 Weizner，是肯尼迪的密友，我到莫斯科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探讨中美接近的可能性，请约一个时间！”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后，立即到列宁山我国使馆，向廖承志请示（这时少奇同志正在莫斯科出席为准备发表《莫斯科宣言》而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会议。廖是少奇同志的随员）。廖指示可以同美国人谈，但要在我们代表团住所。我们心中也就有了底。可是当天晚上，我国代表团成员审阅会议发给会议参加者的论文时，发现正是这个 Weizner 写的长达 24 页的论文中，有主张“美苏合作遏止好战的美国”的句子。美国其他代表的论文中有的也有类似的意思。于是就决定我代表团团长在第二天发言时予以驳斥。培源师当晚即直接以英文起草讲稿，第二天就在会上用英语发言。他的稿子写得很有份量，也很得体，第二天发言时也很有力量，语言流畅。会上，美方代表不断打断他的演讲，大叫 No! No! 可是他沉着地把话讲完。这一仗培源师获得全胜。我们庆贺他的成功。我也因为这次会议有培源师为团长、对代表团将不辱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使命这一条，有了充分的信心。

大概是因为这个 Weizner 受到培源师的斥责，不再提出要同我代表团接触的事，我们也未去找他们，美方想探讨中美接触可能性这件事就没有进行。抽象地讲，那次如果我们与美方代表团进行了这种探讨，也许在中美关系上在乒乓外交前就会出现科学家的外交。上面说的这件事在乒乓外交前许多年。但是，从当时的整个国际和我国国内形势来看，还没有到中美关系可以发生大的转折的时候。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也没有这种精神准备。

那次会议的紧张程度，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就可以看出。由于不分昼夜地连续作战，大家看到培源师实在太疲劳了，在一个星期日我们就提出让

他在房间里睡两个钟头再开代表团的会，研究下一步的工作。结果到要开会的时候，不论敲他的房间的门、打电话进去，或敲他的卫生间的墙，都得不到他的反应。我们害怕他累倒。而那天是星期天，这个会议代表集中居住的莫斯科“大都会饭店”的工作人员恰好把开门的钥匙带回家了，所以最后只好用凿子把门锁凿开。当房门被凿开时，他才仿佛听到了敲门的声音而醒来。这是一场虚惊。

对这次会议，我还记得许多有趣的细节，如果培源师和几个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可以写出很长的一篇生动的“纪实文学”。现在我不打算多写了。

这次会议以及世界科联的大会，使我深感培源师对出席这类国际会议已经积累有很丰富的经验。他能够坚持我国党和政府的立场，同时又能够灵活地运用策略。他在准备演讲和发言时很有效率，讲稿的内容清楚明了，坚强有力，而且能做到很有分寸。培源师的英语不论写和讲都很纯熟，在我接触的科学家中间，还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他为国际和平事业的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同他合作，感到十分愉快，长期留下美好的回忆。我还有这样一种感想，出席这样的国际会议对于自己的确是一个锻炼。我感到他参加这么多的会议是使他政治上迅速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他为坚持和平事业而出席的会议很多，我只是同他合作了两次，远远不能对他作出全面的和深刻的评价。但仅就我接触到的情况而言，我是感触很深的。我认为培源师在国际和平事业方面的操劳，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了解培源师这方面活动情况的同志最好能够把他们了解的情况详细地写出来，必要时一起进行回忆，最后编写成一本内容翔实丰富的书籍。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希望中国科协考虑我的这个建议。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祝愿培源师长寿！更长寿！

1991年11月22日

关于淡化家庭观念

——记有训师生前的一次谈话

在有训老师逝世后不久，我写了一篇有关淡化家庭观念的文章，用以讨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并且主要地是为了怀念他。因为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把我找到他家里去，专门就他关于应该淡化家庭观念的思想征求我的意见。现在要出版怀念他的专集，我就想把这篇短文作为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并且另外写一篇关于我在1934年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前后，同有训师有关的回忆。这第二部分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写下来只是为了回忆我对有训老师最初的印象和表示对他把我招收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去的感谢。他把我招收到清华大学去这件事，对于我的一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能不饮水思源。

（一）有关家庭问题的两件事

9月28日《文汇报》上发表的邓伟志同志《家庭的淡化问题》一文，转述了去年我在上海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的一个故事。所转述的精神是完全对的，但事实有一点出入：对我谈家庭观念淡化问题的是吴老（吴有训），而不是竺老（竺可桢）。

那是 1977 年 11 月 30 日吴老逝世前不久的事，吴老托人问我何时有空，他想来看我。1936 年前，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念书时，他是系主任。1931 年在上海大夏大学的考场对我进行口试并决定录取我的就是他。我想，吴老已年过八十，我怎么能让他来看我呢？于是有一天，我到地安门东大街他家去拜望他。那天他身体很好，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隔了不到两个星期，中国科学院突然通知我……。

我去看他时以为是他要和我讨论建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事，没料到他是为了对我讲他的一段心事。

他告诉我说，前些年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了照顾他年老多病，把他的孙子从外地调到北京，在科学院内工作。但是后来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同意这件事，为此一直不安。从这件事他说起现在革命队伍中有些同志家庭观念太强了。他想向党中央写一封信，建议中央对党员和非党革命者在家庭观念淡化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教育。他找我为的是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我很赞同他的主张。我就像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在当初投身革命的时候，都下了把自己家庭搁在一边的决心。以后向来都是无事不能向党组织讲，而有些话却不能对家庭里的亲人讲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反了过来，家庭观念不是逐渐削弱而是越来越强了。这当然有客观原因，但这种社会风气的确是应该改掉的。因此我赞同他的观点，赞同他给中央写信。我估计他这一封信没有来得及写，就去世了。

我又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那是 1946 年，艾思奇同志就根据地农民家庭生活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稿子，他原先用的题目是：《把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稿子送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毛泽东同志把题目改为《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并动手作了很大的修改，最后写了一封信给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秦邦宪同志，说考虑到修改的文字与原稿不协调，此文决定不发了。毛泽东同志认为，艾思奇同志写的原稿虽然着重讲改造家庭的问题，但没有能很好地处理“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他认为，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农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或找其他职业，农民原来那样的家庭必然要被破坏，因此对革命根据地中的家庭，我们应该采取“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1946 年我重新回到延安，也在《解放日报》社工作，这一件事我是直接知道的。

家庭观念淡化问题，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理论意义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不但在实践上，而且在思想上都不应该简单化。要研究各种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对家庭关系、家庭观念的影响。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我赞成邓伟志同志用这个题目来写文章，引起人们来研究这个问题，也高兴他用吴老与我谈话的故事做他那篇文章的引子，让去世的吴老的一些思想为文章的读者所知。

（二）我怎样转学到清华物理系

我到了清华大学之后，才知道这个大学的物理系学生的人数很少。我们这一个年级（第八级，1936 年大学毕业的一级），物理系的同学只有十个人。但是每年考进物理系新生的人数，比这个数目要大很多，只是在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的过程中，会有相当的一个比例转到其他院系去。这是事实。究竟为什么，我不很清楚。大概不外乎（1）物理系一年级学的那些课程大都属于

基础的自然科学课程，在中学毕业时，学生只知道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课程，报名投考大学时，不知道大学中还有许多课程可学，因而在一年之后，就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学科。（2）物理系受教学力量、实验室设备等限制，有意减少学生人数。我们这个年级有十个人，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比我们高一年的第七级我记得就只有彭恒武、钱伟长等六个人。

因为物理系的人数有较大的限制，所以这个系很少招收从其他大学转来的插班生。插入二年级的就很少，插入三年级的，据说在我之前没有，在我之后也没有。但是报名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却是一直允许的。我认为开放这样一个可以发现人才的路子是很好的。大学一、二年级我是在上海大同大学学习的。大同大学是办得不错的一所私立大学，但是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比不上清华。可是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是半工半读，我在上海有一些临时性的职业，因此在1932年高中毕业时就没有报考清华大学。到了1934年，我考虑到清华有研究生制度，出国进修条件也比较好，加上我有可能取得浙江兴业银行的奖学金（当然比起我的职业收入来说要少得多），这才下决心转学到清华。而清华的招生章程允许这样做。当时我没有想到在清华大学还有参加“一二·九”运动这个有利条件。

物理系三年级收了我这样一名转学生，在校内一部分人当中引起注意，以为我真的是一个物理水平特别高的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对学校的功课素不重视。那么我何以能够被招收进物理系三年级呢？关键就在于有训老师对我进行的一场口试。他对我在口试中的回答非常满意。我是1934年暑假在上海（考场设在梵王渡大夏大学内）接受入学考试的。有训师这时候正好在美国进修一年后从美国返回、路经上海，承担了对我进行口试的任务。清华大学教授有一个权利，那就是在国内教四年课之后，就有一年可以不给学生上课，由学校资助到外国进修。有训师1933年暑假到1934年暑假这一学年该他享受这每四年可以到国外进修一年的权利。他是清华物理系老师中我最早见到的一个。那次口试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发现他嗓门很大，带有一种当时我不熟悉的口音（后来我知道是江西口音）。第一个向我提出的问题比较浅。我发现他对究竟打算提出什么问题在考我，似乎事先没作好准备，于是我就想出一个办法，设法使他按照我的希望和要求继续提问题。即在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有意诱导他提出我准备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他果真提出我想要他提的问题。于是我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中，又有意诱导我准备回答的第三个问题。他又果真提出我想要他提出的问题……如此，整个口试几乎完全是按照我的意图进行的。这样，我的回答当然比较完满，他也满意，或者说很满意。这次口试，我的确是使用了一些小诡计，应该说不能算是不好的小诡计。这件事我一直未向他坦白过。有一次话已说到嘴边，我忽然想到他恐怕对那次口试早就忘了，同时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我玩的小诡计，就没有说出来。

在1934年——1936年我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两年中，有训老师是物理系的系主任，他教过我光学等课程。他对我传授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学习方法，在我以后的治学道路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强与我几个时期的交往

6月25日何祚麻在电话里告诉我，三强又犯了心脏病，进了医院，正进

行抢救，不准探视。接电话后，接连三天打了无数次电话到泽慧处探问病情，家中一直没有人。我心里明白：泽慧和其他亲人都一定守在医院，28日上午拨通了，泽慧接了，我问三强病情，她告诉我当天早上零点28分他已经离开我们而去了。没能在他生前再见一面，只有写这样一篇文章向他告别了。

三强长期患心脏病，多次心肌梗塞，住院就不准探视。我从来没有能去医院探过他。去年11月我动手术住院，听说他要来病房看我，他心脏不好，来一趟医院很劳累，老同学、老战友生病对他不免会受些刺激，劝他别来，他还是来了。幸而没有出事。这可能因为同他见到我手术后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没有引起他情绪波动。这次患病是参加聂总逝世后的一个座谈会触发的。三强的心情我能够理解，没有想到那次他来探望我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和三强彼此都保有当初在清华一起过学生生活的美好回忆。1986年7月首都学术界为我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年开了一次会议。三强在会上讲了1934年我转学清华物理系三年级后他对我的印象，讲得很具体、很有感情，给到会者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关于1936年毕业分手前的他，我也记得不少事情。

1937年他去法国深造前，我和他之间还有一段故事。1937年初，我在广州由于自己组织的一个革命团体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不得不离开岭南大学的教师职位。李昌要我到北平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我找不到丢掉职业北上的理由，就称是去应约里奥·居里的招生考试。到北平后知道三强已报名应试，我又有了借口：“我不愿意和三强争。”约里奥只收一名研究生。三强考取了，出国前，我在他的一本纪念册里写了一段这样意思的话：“你出国深造钻研科学，我在国内干革命工作，等你学成回国，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你用你学得的知识为革命服务。”1961年坂田昌一到中国，在一次我和三强都在的场合，三强对坂田讲了这段故事，并说那本纪念册他还保存着。1948年他回国，1949年北平就解放了，三强果真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用他的学识，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为原子能科学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坂田回日本后在他写的《中国科学界的新风貌》中介绍了这个故事，说是中国科学界的“佳话”。1991年我想起看一看三强保存的纪念册，复印一份也留个纪念，三强告诉我这个本子“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真可惜。

1949年春我到北平，久别重逢才知道在法西斯统治下他在欧洲日子也很不好过。我又知道约里奥是法共党员。在国外这几年，他不但在科学上有重要发现，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磨炼。泽慧在德国也有一段艰难的经历。

我的物理学是荒废了，而三强和泽慧成了真正的物理学家，我们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到一起来了。建国后的43年我和三强一直保持联系。对他从事的原子能研究领域，我没有多少接触，可是中国科学院正是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联系对象。1954年以三强为团长同张稼夫、武衡等访问苏联，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那时候许许多多问题，稼夫、三强等我们都是在一起研究解决的。也是在这一年，稼夫和我看到三强已经完全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而中国科学院党的领导极须得到加强，稼夫和我作为三强的入党介绍人完成了三强入党必备的手续。不久三强就担任中科院的党组成员。

1956年是对中国科学工作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年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以党中央的名义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党的八大把科学工作提到

很高很高的地位。在这一年我国编制了1956——1967年12年科学规划工作。这个规划分科学技术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两个部分，而着重点在科学技术规划。制定科学技术规划，集中了全国学识渊博的第一流专家，钱三强是其中起特别重要作用的专家之一。这个规划用了七年时间提前完成。在1962年又编制了1962——1971年10年规划，后来这个规划未完成，那场“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1954到1966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和三强经常接触，“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受到迫害，彼此也就断了联系。

“文化大革命”后，我和三强又发展了新的工作关系。1977年培源师、三强和我一起发起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筹备组就是由我们三个人带头组成的。三年后这个研究会开成立大会时，培源师和三强接着担任副理事长。第二届理事会培源师和三强才不再担任这个职务。由于三强的提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设名誉理事的称号，培源师和三强被代表大会推选为名誉理事。三强对于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都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要创办人之一。

在中国科协三大之后，成立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三强担任主任。李昌、钱伟长和我三个担任这个联盟委员会的顾问。在这个委员会中，李昌、我与三强又一起奋斗做了一些工作，如对我国农业工作向中央提出建议。三强是这个建议书六个签名者之一。这个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的重视。现在人们常讲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就是这个建议书中提出的。

近年来，三强一直多病，但是他仍坚持工作。三强去世，的确是我国科技界的巨大损失。对我来说，则还失去一个老友、好友。对他的去世我是很悲痛的。

1992年7月2日

这件事得感谢申府先生

有一件事在我的人生道路上产生了相当重要影响的。为这件事，我得感谢申府先生。

这件事的经过是：1935年夏天我“参加革命”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点零零碎碎的非常肤浅的认识。对这有比较系统的深刻一点的认识，是在1936年上半年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之后。我怎么会读到这两本书呢？这件事，就得感谢张申府先生。

张申府先生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一二·九”运动时，清华的革命同学，都知道申府教授是支持我们的。听说“一二·九”那天，他虽然没有同学生一起游行，却在前一天进了城，找了一家临街的饭店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一边喝酒，一面观看学生们的游行示威。1936年上半年，是我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由于对申府先生思想和人格的敬仰，我选了一门他讲授的“形而上学”。这门课每周只有两小时。在课堂上，他常常离开课程本身去讲时事。讲抗日和民主的关系，也讲政治和哲学观点。他把启发

学生抗日救国的觉悟看得比传授形而上学的知识、讲自己的哲学观点更为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课堂上听他讲了物质、意识、时间、空间这些范畴，讲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等等。坦白地说，对这些讲授我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我这里要讲的，并不是从讲课中学到什么特别有用的知识，而是申府先生为学习这门哲学课的同学开了一张十几本参考书的单子。在这张参考书单子里就列有上面说的恩格斯和列宁写的那两本书。那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列为禁书的年代，只需沾上“马”字就会触动反动派的神经，听说有一个学生因为手抄一本《马氏文通》而被拘捕。就在这个时候申府先生把这两本书列为参考书，是要有一些勇气的。清华大学的规矩，教授们开的参考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就把它们从书库里取出来，同学们看这些书非常方便。我就在图书馆把这两部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论辩尖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都是英译本）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使我一下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它的信奉者。

不错，当时如果没有申府先生指定这两本书作为参考书，这两本书以后也是一定会读的，但是一定会晚两三年。早读早觉悟。因此在得知将要纪念张申府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时，我想写这样一篇短文，作为纪念。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写一下。

1938年初申府先生从北平到汉口，同时沈钧儒先生也从上海到这个城市。南北救国会的领袖们在汉口谈判决定团结起来成立一个“抗战建国协进会”。这个会的成立大会在汉口一品香西餐馆举行。我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的负责人被吸收参加这个会，出席了这个成立会。会上南北救国领袖发表演说，在申府先生的演说中指出“抗战建国协进会”不是政党也不是群众团体，它的性质是“政团”。我不懂他说的“政团”是什么东西。“抗战建国协进会”后来在重庆改为“抗战建国同志会”，后又改为“民主政团同盟”。最后改为“民主同盟”，即现在的民盟。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同盟的负责人中不记得是谁对“政团”一词作了一个解释，它是由政党和团体联合组成的，因此从政党和团体两个词上各取一字组成“政团”一词。这个解释同申府先生在汉口讲的不会是一个意思。我一直想问一下申府先生的本意何在，有一次见到他时，没有来得及问他，现在恐怕是无法明了了。

申府先生一生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建国后，他的遭遇我是同情的。有一年五四纪念，五四运动参加者几个老人出席了一个会议，发表了谈话。那次申府先生没有出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了解到那时他并没有生病，而是没有被邀请，对这我很不以为然。我最后一次见到申府先生，还是在一个图书馆工作的会议上，他在北京图书馆当研究员，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内。现在白石桥造了新馆，那个地方应该说是“北图”旧址了。

一个条幅—— 老朋友李昌和我

昨天李昌打电话给我，问我今天上午在不在家，说有一件礼品送给我。老朋友会送给我怎样的礼物呢？

上午他和冯兰瑞来了。李昌手里拿着一个画轴。进门时他们满脸笑容，然后打开李昌写的这裱好了的单条，上面是十四个字：“为国为民心坦荡，办法总比困难多”。原来是不久前我八十一岁生日那天，他在家里写的。裱

好后今天带着它到我家了。

看后我连声说好。冯兰瑞说我们现在做什么事，困难总不少，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你不就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吗？这次他们来，使我感到友情的温暖。去年李昌八十一岁生日，我怎么没有想出这个主意呢？

我和李昌已经是相识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世界那么大，人与人能够相识总带有某种偶然性。我和李昌相识是在1936年1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期间。这个团的第三团有一个先遣小队，我和李昌是这个小队的队员。真巧，相识的第一天还一起拍了照片，那是《北平时事日报》的记者给我们拍的，登在1936年1月6日的那张英文报纸上。照片中穿着长袍、戴着鸭舌帽、挎着布包的是我，李昌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弯着腰在用石灰粉作指引大部队前进的箭头。这个先遣队事实上的工作非常简单，为大部队打前站。可是我同李昌在这个小队中的相识，却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这样，我以后的经历不会是这个样子。

扩大宣传团回来，我有一个迫切问题需要决定，那就是要不要把论文写出来，争取在这个学期大学毕业。由于前一个学期参加救亡运动，写论文的事情耽误了许多时间，如果要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内把论文写出来要紧张地赶，就抽不出时间从事抗日救亡的工作。我听说同年级的蒋南翔打算不毕业留在清华做革命工作。我也想这么做。我知道李昌在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同济大学附中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搞革命工作比我经验多，我就去找他帮助拿个主意。李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明确，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来日方长，你不必把当前工作做得多一点少一点看得这么重，而且大家都留在学校中工作也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更广阔的社会中去。毕业了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正是我们革命利益之所在。他这话解决了我的问题，在1936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了。

临近学校结束，广州岭南大学的教务长冯秉铨向清华物理系来要一个毕业生去他那里。当时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很受欢迎，在北平找个职业是不成问题的。多数同学愿意留在本校，至少留在北平。我同李昌商量。他主张我去广州，他说，我们民先队也不能只在北平、天津或者只在华北地区活动，广州还没有民先队，你有机会去广州，把它组织起来，岂不正好。我佩服他意见明快坚定。

1936年下半年，我在广州收到李昌给我寄来的材料和信件，知道召开了民先队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民先”名称定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全国性的团体。这一发展使我很兴奋。那时我在广州的工作是按照民先的章程，明确地去组织在总队部领导下的广州民先地方队部。这次代表大会把李昌选举成为全国民先队的总队长。此后我就经常给总队部去信报告我在广州的工作情况，总队部也经常寄材料和写信给我。

1937年初，李昌让黄秋耘带了信到广州，要我去广西找李宗仁、白崇禧，代表民先总队部向他们做统战工作。我就同力一一起去广西。先到梧州，梧州的同志认为那时候去找李、白不合适，劝我们不要去桂林，因此未能完成总队部交给我的任务。

1937年1月下旬，从广西回广州不久，我在广州建立的那个组织——它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打出民先广州地方队部的旗号——因受上海一个革命团体被破坏的牵连，被广州国民党当局破坏了。我在广州呆不下去了。于是去香港找到了一个教书的职业，准备留在南方，一方面在香港建立民先的组织，

同时继续与在广州的革命青年建立关系，把广州民先地方队部的工作建立起来。我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时李昌来信，希望我回北平。李昌要我回北平后来明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民先总队部需要人手，第二是要我在北平解决党籍问题。一到北平，黄秋耘就来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要吸收你入党，你有什么意见。”这里说的“组织”看来就是李昌。这时在民先全国总队部做负责工作的党员组成一个党团，受北方局直接领导。李昌一定是那个党团的负责人。

这之后我就正式在党内和在民先队工作中受李昌领导。在抗战爆发后，要我离开北平到保定建立民先临时总队部的建议，我想也是李昌提出的。后来要我从太原去武汉，说是北方局的决定，我相信也是李昌的主意。后来李昌来到武汉。到1938年我从武汉第二次去广州是长江局派的，但广州成立民先华南工作部也还是李昌的主意。

从1935年到1941年我做了六年青年工作。李昌也是。我和他都是在青年工作岗位上度过自己的青年时期。青年工作本来就是青年人做的工作，进入四十年代我们都有二十五岁以上了。在当时，已经不算青年了，理应转到其他工作岗位上了。于是我就从中央青委调去中央西北局做调查研究工作，此后转来转去做的都是科学、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李昌则去做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和部队政治工作。不过在建国前夕，党中央决定重建共产主义青年团时，他又回到青年工作岗位上干了几年，我则再没有做青年工作。

李昌在团中央干了几年之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校长。那是我们党办的一所新型大学。李昌在办大学上投入了很多的心血。他对自然辩证法这个学术领域有很大的兴趣。于是我和他在这方面有了一个新的合作。在哈尔滨我们一起召开了自然辩证法的学术会议，在李昌的积极倡导下，六十年代成立的哈尔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国后最早成立的地方性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之一。

1940年秋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时，与冯兰瑞同事。见过，但不熟。1949年夏天我回上海老家探望分别很久的老母和弟妹时，李昌安排我住在当时古拨路（现改名为富民路）上海团委机关里。冯兰瑞把她自己的宿舍让给我，她自己搬去华东团委宿舍。李昌那时是华东团委书记兼上海团委书记（同时他又是团中央书记），工作很忙。冯兰瑞在上海团委宣传部负责、主持《上海青年报》，工作也很忙，但没有李昌那么紧张，每天都要到古拨路来上班，因此我同冯兰瑞见面闲谈的时间更多一些。我们就熟悉起来。后来她同李昌到哈尔滨，先是编报，后来开始研究起经济学，在一个经济研究所当所长。我同她成了经济学界的同行。1957年她借调到中宣部科学处，参加我主持的编写经济学教科书工作，反右后回哈尔滨。1959年孙冶方和我一起在上海召开了一个规模比较大、对我国经济学界留有印象颇深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和计件工资问题的理论讨论会。冯兰瑞从哈尔滨到上海出席那个会议。1964年冯兰瑞、李昌全家到北京后，年底，许立群、杨述曾提出要冯兰瑞去当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这时对孙冶方的批判已经开始，冯兰瑞不愿意去做批孙冶方的事情，没有答应。

“文化大革命”后期，李昌、冯兰瑞也各自从干校回到北京。我和李昌、冯兰瑞又联系上了。特别在他们搬到东总布胡同后，两家住得很近，经常往来。那时在我家里搞起了一个经济学工作的小作坊。冯兰瑞几乎天天到我家

“上班”。中国的问题不便研究，我们就研究世界经济危机问题。先编统计表、画示意图，用事实资料来“检查”当时某某资本主义国家几年来发生多少多少次危机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后来干脆制作大量关于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卡片，最后编成了一本八十来万字的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出书已经是比较晚的事情了。

接着政治形势起了变化，邓小平出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李昌到了胡耀邦主持的中国科学院，我被分配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冯兰瑞也调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两个机构都是邓小平领导的，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各方面工作进行调整。胡耀邦主持写《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李昌作为胡耀邦的第一助手积极参加了。我作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参与了起草这个文件的事情。这时候我和李昌并肩作战，反对四人帮。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都挨斗受批。

唐山地震发生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期间，像我这样的人本来没有什么行动自由，但我关心这场惨重的自然灾害，同司机商量，借到一辆吉普车，独自去唐山看地震后的景象。就是我去唐山的前一天的晚上，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第二天一早，老伴从一个朋友处得到这个信息时，我已经出发去唐山了。当天晚上我回到北京，同老伴一起找了黎澍、李新两人，分析研究，认为这个消息可信。为了使李昌、冯兰瑞分享早些得到这个好消息的喜悦，凌晨十二点多我走到东总布胡同去敲他们家的大门。当时没有敲开，怕惊动邻居，就回到家里打电话，他们来到我家。

这一夜的情景已经过去二十年，可我记得非常清楚。

四人帮粉碎到现在整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我和李昌、冯兰瑞之间的交往值得写的事情很多很多，即便对比较重要的事简单地各写几句，就要用很大的篇幅，今天我本来只想写一、二千字的短文，讲讲我和李昌怎样成为好朋友；讲讲我们之间在人格上有什么接近的地方。我们的共同点也许就是李昌这个条幅中写的“为国为民心坦荡”的品德和对事业执著追求、不怕困难的积极精神。前不久我听石山同志讲，大概在1981年或1982年，我们的共同朋友钱三强在一天评论李昌和我的特点时说：“李昌是一部‘推土机’，一股劲地把事业推向前进，于光远是一部‘搅拌机’，把人们的思想搅活，把工作搅活。”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本来我没打算写长文章，写着写着就觉得应该对不同时期我们之间的交往认真地仔细地回想一下，好好地写一篇长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今天不可能做这件事，看来只好以后找时间去写了。

秋耘和我

秋耘到北京，常来我的住处。我一直想去广州时看看他每天生活和写作的那个“小环境”。可是他住在东山，而我这几年去广州时都在越秀的几个宾馆落脚。这个城市的交通真让我害怕，加上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因此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去年12月14日，我从海口到广州，决定住在珠岛，目的之一就是想去看看秋耘。于是15日那天约上冬垠，请他陪我，找到了秋耘的住处。

这几年，秋耘的身体不那么好我是知道的。在他给我的信里，每封都提

到自己的病。不过最近的一封信说他的病情略有好转。没有想到，这次见面时，他却在卧床治疗，有一个医生每天给他输液。我去看他，他当然很高兴，但没有精神讲很多的话，因此未能畅谈。

秋耘比我小三岁还多一点，不过也有七十五岁了。上了岁数的人，要像中青年那样地生活和工作，是没有可能的了。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自己的身体好一些，力争还能做点工作，生活多些乐趣，我认为还是能做到的。每次去夏公家里，他都思想敏捷，精神饱满地同我谈话。他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真使人羡慕。这次我去秋耘家，冬至这个季节已经临近了，在北方住惯了生暖气房屋的我，在他的房间里还感到有些寒意。我希望在立春过后天气暖和的时候，秋耘能够下床走走，身体一点一点地好起来。

秋耘出书似乎都没有忘记送给我。他很早以前翻译的罗曼·罗兰的《搏斗》我一直保存着。《风雨年华》写的是“我们”——他与我——同属的那一代人的事情。书中许多人名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其中也有几处提到了我。读他这本回忆作品感到分外亲切。最新的一本，他寄给我的，是去年花城出的《黄秋耘作品选萃》。得到这本书后，对其中每一篇我都看了。秋耘的散文的确写得很好，很有特色。他的那几篇“代表作”《雾失楼台》、《丁香花下》、《危驿孤灯照别愁》、《中秋节的晚餐》、《难忘的眼神和泪光》，的确如他在这本书的《写在前面》里自己讲的那样，“是用血和泪写出来的”。他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要撒播阳光到别人心中，必须自己的心里先有”。秋耘自己写道：“要激发别人的血泪，应该不吝惜用自己的血泪写文章。”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秋耘就是这样的人。

在秋耘的文章中表现出他的人格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真诚，对革命事业、社会进步事业的真诚，对一切善良的人的真诚。他的忧愤、他的悲苦的根源都在这里。五十年代，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听到部内管文艺工作的同事讲，黄秋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罗曼·罗兰式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不知道我和秋耘间的友情，我也不想跟这样的人去争辩。我只是心里不以为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不是不相容的。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的不幸和痛苦没有同情心，我很难承认他是一个以谋求社会进步、人类幸福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

也许是不久前才读过秋耘的这些散文，我在秋耘家里忽然联想到，他现在的住所是否就是那篇《雾失楼台》中与江韵、江薇父女为邻的那个院子。再一想，那时秋耘还在北京，没有到广州，而且现在的住房并不是散文里写的四合院。

1992年我出了一本《碎思录》：一百篇二、三百字的“超短文”，每篇请戈革教授为它配上自己的篆刻。在这一百篇中我只引用过三个朋友的话：一个是孙冶方的“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一个是胡耀邦的“高举骨头前进”；还有一个便是秋耘在《风雨年华》前记中引用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欲语唯真，非真不语，非全真不语”。秋耘所引的，就是他自己的人生准则。在引了这三句话后，我接着写：“要做到这三句话，就要有极大的勇气。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具备这种勇气的人来推动的。”“唯真”常常意味着不合时宜。坚持把“唯真”作为生活准则的秋耘，在历次运动中就没有好日子过。而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愁苦。但秋耘不能改变他的这个准则，否则秋耘也就不成其为秋耘了。

诗人邵燕祥在《论黄秋耘》中说：“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不知悔改的

理想主义者。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这就是黄秋耘。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黄秋耘。”我也有同感。

也许有人想了解，于光远和黄秋耘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在这篇文章末了，我就简单地写几句吧。我和他是清华同学，他学语文，我学物理。他进清华一个学年后，我就毕业离校了。如果不是两人都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彼此恐怕不会相识。在清华时两人交往不多。交往得多的，反而是在我去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当助教之后的1937年1月。那时他利用学校放寒假回香港活动，正好遇到我在广州组织的一个救亡团体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好几位同志被捕。为了揭露这种反动行为，我来往于省港之间。在香港，我就住在坚道六十号秋耘家里。我和他一起研究对付国民党的对策，一起和香港的救亡界人士接触。秋耘对我在广州的这段情况非常清楚。不久后，当我从广州回到北平，在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时，他就介绍我入党。秋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94年2月6日

见《按牌理出牌》致黄秋耘

秋耘：

93年12月在梅花新村别后，又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我一直关怀着你的健康。

今年三月我收到你的一封信和大作《按牌理出牌》，知道你身体已经好到可以工作的程度，我非常高兴。我研究了你那本书，看出还没有收入别后你新写的文章。书中收入的文章大多是八十年代写的。九十年代写的就不多。最迟的一篇似乎是1992年10月14日写的悼念秦牧的文章。但是看到这本书，我就想，你要编出这本《按牌理出牌》的书来，工作量还是不小的，你能胜任这个工作，说明你的身体比我看到你时要好多了。

不久，我又在《同舟共进》上看到你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判断它是新写的）。文中揭露了1938年党组织派你在香港的一个情报机关中做革命工作时，了解到的广东省国民党当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在日军登陆后我军不战而退、致使广州迅速沦陷这样快一段鲜为人知的事实。我相信你身体向好的方面更前进了一步。

方才我又在《羊城晚报》8月24日第二版看到你的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你，很有精神。摄影记者在那张照片旁边还写了一段话：“哪怕你不认识这位老人，也会惊讶这透心的目光。他（指的是你）说：‘荒原的狼群不会同类残杀，可在过去的年代，人类曾对同类举拳高喊决不心慈手软。’/目睹这位患病的老人，坚持尝试从沙发上独立站起来，一次、二次、第三次成功了。我急忙拉近镜头，一个大写的人出现在镜头。”望着这张照片时，仿佛就跟你跟前，见到了你更为健康的身体和神情。于是我就把桌上的资料和稿纸往前一推，立即写这封信表示祝贺，祝愿你身体越来越好。

对于你的那本书，现在我只想谈一点。那就是在135页，你仿效马克思的《自白》也写了一篇《自白》。我想告诉你——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恩格斯也写过这样一个《自白》。那是在恩格斯去世后，马恩著作的编辑者从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纪念册中找到的。《马恩全集》的编者把这收入马克

思恩格斯通信的附集中。你这个自白是我所知道的第三个了。三个《自白》我觉得你这一个最严肃。他们的那两篇，也是严肃的，但都是写给小孩子们的，所以多少带有一点玩笑性质。比如恩格斯对“你对幸福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饮1948年的沙托-马尔高酒”。你的《自白》每一个题目都表现自己人格。连你说的你最喜欢的花是丁香时，也使我想起你的《丁香树下》。

你写的那篇回忆文章中所揭露的1938年那个史实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那时候我正在广东省委工作，负责帮助青抗先中的党和非党队员撤离广州。由于我们想在撤退前取得第四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队的合法名义和得到一些生活费，一直留在广州与国民党办交涉，直到广州沦陷当天还没有办好，不得已已在凌晨迅速撤退。那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日寇军队会来得这么快。

好吧，我也告诉你一些关于我身体的情况吧。关于手术后癌细胞在体内活动的情况，还在严密监视着；因为输血而传染上的丙型肝炎的病毒正在活动，肝功能不正常；我虽不像你那样得了帕金森症，但是X光照相的结果查出膝关节中有了碎片，膝关节活动因此也受影响。现在时行很低的沙发，坐在这样的沙发上，要独自站起来我也有困难。当人们看到我站起来有困难正在进行努力时，就来搀扶我。我也只得接受这种搀扶。因为这时别人正等着我一起行动，不好耽误大家的事。现在走路不成样子，也成了我的身体上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有一个年轻医生建议我换个人工关节。我没接受，坚持用“受之父母”的关节来行走。其他情况都已告诉过你。

我知道你会关心我们共同的朋友的近况。李昌长我半岁多，身体比我好。我现在不敢去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怕蹲下去站不起来。他还能到处跑。赵德尊与他的夫人度过金婚纪念后三、四年夫人去世了。那时他本人还很好，自己写了悼亡诗。黄汉炎寄了一本自己的诗给我，油印的。力一肾脏本来不好，不久前在胸中发现小量积水，医生让他服用先锋霉素，引起了尿中毒，一度病情很危险，经过抢救现在好多了，据说现在仍有危险，还让人耽心。杨明的父亲杨匏安，今年一百岁诞辰。对这位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与李大钊几乎同时的杨匏安，今年中央文献出版社要出他的文集，几个报刊要发表纪念文章。除杨明自己著文外，我也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在《上海滩》今年9月号上发表，一篇将在《炎黄春秋》上发表。《广州文艺》前几个月发表了 my 《1936年在广州》的四个片断，其中有一篇是我写的《杨匏安夫人》，不知你是否看到了。我还找人研究编杨的电视剧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小魏。关于她，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多么坚强的人！》。我记不清是否寄给过你。手边正好有那篇文章的底稿，我就寄给你看看吧！春节期间我看过她一次。从那次到现在又有七个月了。昨天我给她的亲家牧惠通了个电话，他告我小魏身体还是我见到过的老样子。她实在太痛苦了，头脑还是那么清楚，躺在病床上受折磨。我打算过些时候再约牧惠去看望她一次。看望后我再把她病情告诉你。

拉拉杂杂，这封信写得短了，别的暂时不写了。我“换不了笔”，写得太乱，请打字员打一下，减少你看信时的困难。

再见！望保重！

于光远
1996年9月11日

两个《自白》

黄秋耘的《按牌理出牌》收入一篇《自白》。在我给他的信里提到了它。现在我想在这个集子里也收入这篇给读者看看。这是他的自我写照。他就是这样的人。我看了之后也写了一个《自白》，不过不像他那么严肃，而是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带有半开玩笑性质又反映本人真情的《自白》。东施效颦，在所难免。

一、黄秋耘的《自白》

我最喜欢的格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最反感的格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最珍视的品德：急人之急，损己利人。

我最讨厌的现象：吹牛拍马。

我想推荐的一本书：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友谊地久天长》。

我最喜欢的花卉：丁香花。

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游泳。

我最喜欢的颜色：紫色。

二、于光远的《自白》

您喜爱的优点：正直。

您的特点：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喜欢发起这事那事。

您喜爱做的事：给年轻人讲故事，逗小非非。

您不能原谅的缺点：趋炎附势，拍马屁，抬轿子。

您能原谅的缺点：傻乎乎地迂阔。

您对幸福的理解：从奋斗中取得胜利。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厌恶的人：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候机整人。

您厌恶的东西：所谓“人体特异功能”。

您喜爱的英雄：马克思和恩格斯、爱因斯坦。

您喜爱的女英雄：居里夫人。

您喜爱的诗人：（没有答案）。

您喜爱的散文家：鲁迅。

您喜爱的花：石榴花。

您喜爱的颜色：红色。

您喜爱的菜：凉菜：千岛汁拌生菜、豆腐乳。

热菜：红烧肉、烧茄子。

甜菜：三不沾、花生粥。

您的格言：信奉“喜‘喜’哲学”。

您的箴言：悠着点儿（老做不到）。

读罢韦君宜的《露莎之路》

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入了民先队或者还成为党员的清华同学之间，不论交往密切与否，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样的同学本来有好几十个，也许上百，可是现在屈指数出的只有三十左右了。

我和韦君宜当时并不亲近，专业不同，一文一理；级别不同，我八她十，不过都在民先队里，也就熟悉了。我对她有很深的印象：话说得很快，戴着一付高度近视镜，大家都说她文笔好，是个“才女”。大家，包括我在内都管她叫小魏。她在学校的名字是魏藜一。

不过我倒去过她的家。她是什么地方人，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从来没有问过。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抗战前她家住在天津，然而她说话一点儿不带天津口音，没有从她的发音中听到过天津话的标志之一“mà”。我去过的她家，不在天津而在汉口。1938年初，她全家来到汉口，那时我是民先总队部办事处主任，党内职务是长江局青委，我去找她不只是拜望朋友，也还是本职工作的要求。我记得很清楚，比起我这样的流亡学生许多人挤在一张大床上，她有一个家，生活条件要好多了。我记得她接待我的那间房很宽敞，桌椅等家具相当高级。那次我还见到了她的妹妹莲一。

隔了一年多，1939年冬我们在延安又都在中央青委工作，而且都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那时我同她就不再是偶然见面，而是天天照面，各人在做什么彼此都清楚。闲时少不了在窑洞里一起聊天。那时候她已经开始用韦君宜这个笔名写文章，不过我还是叫她小魏，从来不叫她韦君宜。

后来，青委向外输送干部，她跟杨述一起去了米脂，我则去了西北局，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在整风运动后，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单位被抢救，遭遇大同小异。她记得的许多事，在我脑子中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在《露莎之路》中提到的那张《实话报》，我看过好几期，真使人恶心，说不出的难受。一个个熟悉的人在那里“坦白”自己，把自己描写得那么下流。

我同她真有缘份，1946年在北平办解放报，进了新闻界。这张报纸只办了四个月，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延安，上了清凉山。这时候我在《解放日报》的言论部，她在新华社。

几年后进到了北京，同在一个城市，又都做宣传文化工作，少不了有时见面。后来，她的丈夫杨述从北京市委调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机构正是我所在的中宣部科学处联系的对象，间接同她又多了一层关系。这时候看到她的文章越写越好，成名成家，成了一个党的女文学家，同时她又一直做党的工作。由于那时我对文艺工作不关心，对她的工作就知道得少。前些天我读黄秋耘写她的文章，知道了不少她那个时期工作中的苦恼。

杨述已经“走了”很久，她自己得了脑血栓，一直顽强地生活和工作。我对她这种精神非常钦佩。这些年来她每出一本书就送我一本，最近我收到的就是《露莎之路》。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她说：这个早就想写的题材，在病倒之后才动笔，“半身不遂，手脚都不方便，只有脑子还一直管用……一天写一点点，今天记住明天要写的内容，用了过去写两个长篇的劲，写了这十来万字。”她的思想是，“人活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谁病到这样还写小说呢？但是我得写。”我多次去过她的家，了解了她与疾病斗争的惊人毅力，她的生活十分规律，每天不得不用很多时间锻炼自己的身体，同时持之以恒地每天写一点。就这样，她的书一本一本的送到我的手上。

《露莎之路》是一本用第三人称写的“小说”。我相信这是她的自述，

虽然其中故意用了一些小说的手法。比如最后的那场梦。我很注意研究梦，现实生活中的梦不可能记得下这么多，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情节。我以为用这种办法来把自述装扮成小说，是最容易做到的。我还是把她当作小说体的自述来读。由于我们在同一时代、同一个国度、同一个政治组织里生活，有许多类似的经历，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和熟人，我可以不必经过考证就能断定书中那些用了假名字的人是谁。有的人的假名字与真名字的音相同，一看就明白。有的虽然改名换姓，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有的人我吃不准是谁，或者有些我本来不认识。读老朋友自述性的小说或者小说体的自述，就有一般读者所没有的角度和便利。有时她用的是真名字——不是一般读者而是像我这样的读者所知道的真名字——看了之后，我甚至想用我所知道的情况对小说中的描写提一些修正意见。比如书中讲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老魏，就是我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那个老魏。民先总队部的党团（现在叫党组）就是老魏以北方局领导人的名义领导的。书中把北方局写成北平市委是不准确的。可是，如果我仅仅把它看成小说，提这样的意见就太滑稽了。

我相信，这本书是露莎的自述。由于写得非常真实，更可以看出露莎走过的路和露莎的人格。君宜在后记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我写的是我曾涉足过的生活，我绝不愿把虚夸的东西交给读者。”我深深被这本小说感动，我想会有不少读者也被它所感动。

1994年8月19日

多么坚强的人！

——与病床上的韦君宜的一次晤面

当牧惠陪我走进韦君宜的病房的时候，她刚刚用过鼻饲，正好醒着。她患了多年脑血栓之后，近几个月病情加重，不再能起床，饮食也障碍，说话能力也大不如前，忍受着肉体上更大的痛苦。这些日子我一直惦记着她。不过这次见面，使我得到一些安慰的是，她的听觉视觉还很灵敏，脑子也很清楚。这时她看到自己六十年前的大学同学、同自己一起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我、和自己的儿女亲家牧惠站在跟前，从她那已经不能完全自由表情的脸上，我看出她高兴的心情。

知道她说话不方便，见面后就不问她什么。牧惠去时带了一张十一月十二日的《南方周末》，上面载有一篇评论《露莎之路》的文章，交给了她。这是韦君宜在病中以惊人的毅力写成的，实质上是自传性的一部小说，不到十万字，自己说用了她过去写两部长篇小说的时间。内容是真实的深刻的。文字是朴实的，给人美的享受。它使我很感动，写过一篇《读罢〈露莎之路〉》。在发表前曾给她看过，她很高兴。这篇《南方周末》上邢小群的文章的写法和我那篇不一样。我主要是叙述我和她之间的友情，邢文主要讲她写自己在陕甘宁边区被抢救这段经历的意义。没有一个作者不关心自己作品的评论，何况是对这样写成的作品。因此在交给她之前，我们估计她会特别有兴趣。果然，她马上伸出那还能活动的瘦骨嶙嶙的手抓起报纸来就看。只是手抖得很厉害。我们把她的手抓住不让她抖动，她就很快地把这篇文章读完了。

我没有想到她看文章这么快。在一旁的护士说，她不看电视，只喜欢看

报。对一张到手的报，她会翻来覆去地看许多天。还说她不戴眼镜，能看《新民晚报》上那样小的字。这次拜望她时，我也带了我写的那本《文革中的我》。在递给她之后，她也急忙地翻阅。看书自然比看报更吃力。我看她太吃力，就取了过来，在扉页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给小魏在病中消遣。于光远（小于）。1995年11月14日。”她本名魏蓁一，我一直叫她小魏。在长时期内她也叫我小于。我从“小于”熬到今天的“于老”也真不容易。可是那天我特别想用青年时代彼此间的称呼。今年是“一二·九”运动六十周年，我已过了自己八十岁的生日，她低我两个年级，恐怕也快满八十了。

接着话题转到她的一部回忆录的出版问题上。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这部书。可是书稿不在北京。牧惠告诉我正在设法找回这本书稿时，她忽然出了声音。原来她说稿子就在自己家里。我真没有想到她会作出这样的反应。牧惠告诉她，家里的稿子不完全，少若干部分，她听懂了不再出声。

我手边正好有刚写好的两篇怀念胡耀邦的文稿。一篇是《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词》，还有一篇《如果他在，该是祝贺他八十寿辰的时候了》。我刚取出这两篇文稿，她马上伸手要去看。四页打字稿，她很快地看完了。

看到她耳朵、眼睛和脑子还那么灵，我就想多讲点给她听。我讲我正在写一篇纪念艾思奇逝世三十周年和《大众哲学》出版六十周年的文章。并且讲一直挨整的艾思奇却被多次整过他的人描绘为整人的人。我说直到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还不明真相。说到这里，她又出声了，原来她讲自己也是这个看法。

我原先以为我只能在病房里耽一小会儿，不知不觉快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怕她太疲劳，便起身告辞。这时她的女儿杨团在下班后来到了病房，就对她的妈妈说：“于伯伯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她发出一些声音。杨团告诉我，她讲自己“不行了，身体不能动，成了一个废物”。牧惠和我对她说：“我们不喜欢听这个话，你的脑子和耳目还挺灵，还能工作。”她又出了些声音。杨团告诉我，她讲的是她同我这次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就对她说：“明天我去南京上海出差，回来后会再来看你，你看东西这么快，下次我多带点东西给你看看。你的脑子很好，杨团又能听懂你讲的话，你还可以口授一些很短的文章，哪怕三言两语也好。只要是你的文章，大家都很想看。”她表示接受我的建议。于是我就握住她的手，说：“那我们就达成了协议，我等着看你写出的文章。”

在我和牧惠走出病房后，我不禁说了一句：“多么坚强的一个人呀！”

1995年11月18日
从南京到苏州的火车上

韦君宜最近给我的两本书

去年11月14日我去首都医院，看望韦君宜，向她说再见时，她对我说这次见面是最后一次了。这是很伤感的语言。我接着说：“明天我去南京、上海出差，回来时会再来看你。”我记住这个诺言，在春节期间和牧惠约好，又去了她的病房。这次是熟门熟路，一直进到病房。她正熟睡。我们就在病房里向护士询问了一下韦君宜的病情。了解到三个月中她曾经有过感冒，现在好了，病情没有显著的变化。等了不少时间，她醒了，也许是心理作用，

也许是她没有睡醒，我觉得精神不如前一次。总的说来还是老样子。那一次我并没有把我在上次见面后写的那篇《多么坚强的人！》带给她。我想她读这篇文章未必很高兴。于是讲了些别的话。可是那时她女儿杨团不在，通话也就很困难，基本上是我们对她说，从她的目光中去探视她的反应。

她示意护士从柜中取出两本书送给我。一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韦君宜卷》，一本是《我对年轻人说》。第一本书是1995年12月出版的，三十四万字。自序写于1994年春，很短，基本内容是说“自己实在没有打算以‘作家’作为结束一生的句号”。她说自己的职业是编辑。并且说明“这本集子基本上选自己晚年的作品，散文篇幅多，因当时需要而写，真实的成分较多于小说”。第二本书，出版时间稍早，是1995年8月。没有写序，而是在1994年3月19日写了篇后记。后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老了，虽然脑筋还不算糊涂，但是，两次脑溢血，两次脑血管已经把我搞成了废人，以致不再可能随心所欲地写心之有所思。躺在病榻上，我同时代人的面影常在眼前晃动，使自己觉得实在应该把他们算不上伟大、但也非平庸的色彩斑驳的一生摆给年轻人看看。”在这本书里收入了1994年4月才写的《杂家于光远》。文中写到的、使我博得“共产主义化身”称号的那次报告，我还记得。那是党中央在河北平山时，我在南庄村给中央团校的学生演讲。我在大操场上站在一块架起来的黑板前的一张照片，现在我还保存着。不过王惠德听了哈哈大笑说“那就不用听光远讲了，只要看看他这个人就行了”这件事，我看了韦君宜这篇文章后才第一次知道。

韦君宜以前送书给我时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可是这两本她已不再能签上自己的名字了。

在那次见面后，又有七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前几天问了一下牧惠，知道她还是上次见到时的样子。

听说她写的回忆录，出版社早已愿意出版，只是稿件一直在她的亲戚们手里，还没有取到。我想如果这本书能够早日出版，她是会非常高兴的。

附韦君宜：《杂家于光远》

老熟人于光远最近好像挺出风头，一会儿给这个报题字，一会儿给那个刊物取名。有人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人说他是经济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科学家。他到底是什么家啊？

—

我认识他的那会儿，他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比我高两班，是民先队员。我只知道他是物理系的。他比我早毕业，抗战开始时他已经在广州中山大学当助教了。在名牌大学执教，按说这很令人羡慕，可是抗战的炮声一响，他就离开学校，直奔武汉——我们民先队员集中的中心，重新自称学生，跟着流亡的学生们一起活动开了。

在武汉，他当上了党的长江局青委，跟鲁明健一起办了个青年刊物叫《呼声》。后来湖北省青委搞了个“青年救国团”，刊物叫《战时青年》。《战时青年》集中了北平时代办刊物的能手，很得好评，上级决定《呼声》不再办了。老于依然以流亡学生的身分到处活动。

我是在延安中央青委又看见他的。他在这里不是中央青委委员，而被委派当了中山图书馆馆长，大约相当于一个科长吧。他干得很带劲，从来没见过

他流露过任何不满。好些书是他介绍我看的。他自己在这一时期大概也读了不少的书。

二

延安失守以后，我一度跟着青委的队伍到了晋察冀。他这时成了中宣部的干部，我们又在晋察冀边区的西柏坡会面。这一阵从北平、天津跑到晋察冀来的学生很不少，他们是为追求真理来的。为着他们，边区就办了些训练班，开了些报告会。老于多次担任做报告的角色，常常讲得眉飞色舞的。有一次，有个学生在大操场上听完他的报告，说听他讲简直神了，他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化身。中宣部的王惠德听见了大笑：“那就不用听光远讲了，看看他这人就行了，是共产主义化身了嘛！”

三

进了北京以后，于光远在中宣部当了科学处处长，又当理论宣传处处长，似乎什么都管。建国初期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做主编，请他写文章。他那时大概还没有结婚，天天忙得很，对我们的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他写的大都是关于青年思想修养的文章。记得他经常应邀到我们杂志社办公室，熬夜赶写文章。我请编辑丁盘石和一个小文书给他当助手。没什么东西招待他，只是一筒饼干、一包花生、一瓶开水。他就这么喝着开水，就着饼干、花生写起来。小文书给他抄稿子，丁盘石在一旁照应着，天亮交卷，他也其乐陶陶。就这样，一篇篇关于青年思想修养的文章从他笔下流出。他写得可真不少啊，简直成了我们现在所称谓的“专栏作家”。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社的有些同志提倡走群众路线，请工农兵来写文章，我则老是请他写，一时间在杂志社传开了一句笑谈：“办《中国青年》没有‘群众’可以，没有光远兄可不行。”

四

于光远写文章有个特点，就是热情磅礴地讴歌己所是、无所畏惧地抨击己所非。人所共知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他不顾个人毁誉，坚持己见，坚决反对所谓耳朵识字、隔墙传物之说。尽管有人说是亲眼所见，说是超过一般科学知识之上的高层科学，于光远仍坚持这不是什么高层低层科学之类，而是人们是否承认科学根本公理，推翻了公理即无科学。多少拥护他的人在这些问题上为他惋惜，他也毫不为之所动，坚持撰文宣讲他的关于科学思想和见解，这是说作为科学家的于光远。

有一次，我从上海出差回北京，碰巧他也在我乘坐的同一趟班机上。只见他居然在短短两三个小时的空中旅途中，还摆开摊子，在那块才半尺多宽的机座小桌面上写将起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一边写着，一边还在不停地指挥他的秘书为他查这查那，使同机的人看了实在惊诧。我上前招呼他，他一抬头见是我，马上递过一叠刚写好的稿子。我笑着说：“对不起，我可没有你那本事，在飞机上我干不了活儿。”原来他刚在上海参加完一次关于经济学的大讨论，这是在改他的经济学论文呢。这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于光远。

五

于光远越到晚年，似乎越开朗、越乐观。每次他来都是大笑而至，大笑而归，使你不由得和他一起开心。只记得唯一不同的一次是从干校刚回北京不久，我和杨述见到他。杨述议论被开除党籍的干部即将失去革命前途时，他脸色骤变，我们就没有再谈下去。

文革后，他离开中宣部到了社会科学院，领导马列所，总有一套与人不同的见解。此时他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名衔已到处可见。有一段时间，他的

思想、文章不被接受，经常受到批评——有时甚至很严厉，但他仍谈笑风生，坦然自若。人家议论，他毫不在乎，还告诉大家：“我年轻时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现在和年轻时一样。”八六年以后我因患脑溢血已不能走动，只是头脑还算清楚。他有时会打个电话向我问候，有时上门来看我，每次都会兴致勃勃地谈到他的新作。这已经成为他的生活趣味。

去年，他得了不治之症——癌症，仍然到处走，光是到我家就来了两三次。我问他：癌症是真是假？他说是真。我问为什么不住院治疗？他解释：“刀已经开过，但是这个病与别的病矛盾，不能做化疗，我早已经活够本了，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何必住在医院等死？”他回了家，仍到处做讲演，出差开会，写文章。最近又对散文感起兴趣，写开了头便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在《环球企业家》、《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好几篇长篇散文，一改经济学论文和随笔、杂文的文风。打电话给我时，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哈哈，看我算不算个文坛新秀？”

他是个什么家啊？

我说，是杂家。

1994年4月

【附记】这篇短文写作的时间韦君宜记作1994年4月，而那本《我对年轻人说》后记是写于1994年3月，看来这是后记写成发表后收到这本书中去的，杨团说有可能这是迄今她最后写的一篇。

怀念冯契

我和冯契是在“一二·九”后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抗日扩大宣传团期间相识的。那是1936年1月间的事，距今已有六十年了。

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被录取者按照考分排列，同学们把第一、二、三名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冯契（他在学校的名字是冯宝麟）是1935届被录取者中间的榜眼。那时我有一个偏见：考分高的学生一定是特别重视课堂里的那些东西、独立思考较差的人。在南下扩大宣传途中，我与冯契相识并交谈后，纠正了我的这个看法。我发现他对政治、对哲学有他独立的见解，是个喜欢动脑筋也很会动脑筋的人。我觉得同他很谈得来，真可以用“相见恨晚”几个字来形容。

在南下扩大宣传期间，我发现他的一些特点：他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评论家。我记得走在路上，谈起我俩都看过的几部中国哲学史，他都一一指出这些书的不足之处。我们也谈到彼此都有些了解的中外哲学家，他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不愿意随随便便给以较高的评价。同时他讲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却有颇高的自信。我觉得他讲得也颇有些道理。同时我有些奇怪，他小小的年纪，怎么会有这样的谈吐。那时我二十岁半，他比我低三个年级，我以为他只有十七、八岁，后来我才知道，他上学比较晚，所以年龄与我差不多。其实我那时也是“小小年纪自视甚高”，我们都是风华正茂、少年气盛。

南下扩大宣传时，我们每天都要徒步走几十里路，我喜欢和他走在一起，边走边谈。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在高碑店被宋哲元、泰德纯、萧振瀛派人押送回北平后，我和他都成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我们还是经常来往，谈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事情。他是哲学系的学生，我是物理系的，但对哲学很

有兴趣。哲学是我们之间谈话的主要内容。1936年，我还选了一门张申府教授开的“形而上学”，张先生的教学也是我们常常议论的题目。那个学期，我在清华图书馆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那时他还没有读过这两本书，有时我就向他介绍这两本书中的某些内容。

我和冯契一起在清华的时间很短，只有四、五个月。1936年我大学毕业后就离开北平去了广州。抗战前，我从广州回北平停留了一个短时间之后，就去太原、武汉、广州等地工作，以后又去了延安……，同冯契一分手就是十几年没有联系。不过在清华那四、五个月的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虽然久未相见，却时时想起他。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当我们重逢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了。许多年来他在哲学研究的领域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不用问，我就相信，他一定取得了高水平的成就。我一直希望能再像1936年那样好好地听听他的新见解，可一直没有如愿。他住在上海，很少来北京，我虽然去上海的次数不少，但每每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又来去匆匆，找不出安安静静谈学术的时间。我去过他家一次，也没有久坐。他来过宾馆看我，但总是遇到来访客人很多，没有能谈我们两个人特别有兴趣的问题。一直到他去世，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长谈的机会。

有一次我在上海同他谈起自己的一个想法：在“真”、“善”、“美”之后，与之并列，再加上“贵”和“智”两个字。即在“真否”、“善否”、“美否”之外，再加上“值得否”、“聪明否”两条作为评价行为和思想的标准。我对“价值观”一词常作比较狭义的理解——即上面说的“值得否”。他听了我的这个看法，和我谈了一大篇话。讲了真、善、美三位一体，讲了真善美与自由、真善美与价值观（比较广义的价值观）的关系等等。今天看了童世骏教授寄来的关于在纪念华师大哲学系建系十周年时准备把讨论冯契的生平和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的函件之后，使我明白了，那次他同我谈的那一篇话一定是他那本《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不过他那天并没有告诉我他写过这样一本书，以后也没有寄赠给我。他作过专门的研究，写过这样的书，因而他对我讲得就特别透彻。

前年当我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我是很悲痛的。我想，自己应该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认为，作为他的好友和同行，对他那样一个在哲学上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写出的不应该是随笔而应是有有一定份量的哲学文章。这时候我就反思，我对他的哲学著作学习得太少了。听说不久前他出了一本《智慧的探索》，我手边没有，就向他的家人去函要了一本。我打算在认真研读了之后动笔去写。可是实在没有能抽出这个时间，至今未能动笔。原先我想，这件事并没有时间性，可是现在童世骏教授来了信，要求在五月中旬以前交稿。我算了一下，今年三、四、五月我都有活动，那篇文章是肯定写不出来的。因此只能写这样一篇，略表自己的怀念之情。

1996年2月26日

我又一次到冯契的家

1996年11月29日，我又一次去了冯契的家。

说“冯契的家”，我认为还是比较确切的。虽然他已经不在，但是他用

的书、坐的椅子、写字的桌子都在原来的位置。我觉得同十几年前第一次去那里时比，似乎没有变化。他的老伴——也是我的清华同学，而且是同一个系的同学——赵芳瑛仍住在那里。也就是说，他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还是那个样子。因此除了用“冯契的家”这四个字之外，恐怕没有更合适的词汇了。

去了那里我才了解到他过世的具体情况：他并没有患不治之症。病情的进展极快。起因是便秘。我也有这种经验，几天便秘，我就有些紧张，不舒服。这次他便秘的时间长了一点。而上了岁数的人，灌肠之类是要小心从事的，但是真的时间长了，别的办法不见效，该灌肠时不去灌肠这是不应该的。他怕去医院，怕去了医生不让他回家，没有去。我也怕住院，能不去时我也会拒绝去住院。后来去了医院，护士不知道他有易噎易呛的毛病，结果他吃饭时不小心把一块馒头吃到气管里，造成窒息。如果在家，赵芳瑛知道他有这种毛病，经常提醒他小心，也许就可以避免。我也易噎易呛，有时不小心食物就会走错了路。就在去冯契家的第二天，我把一个药片吃到气管中去了，幸而吐了出来。总之这两个病都不是无法医治的病，并不特别要紧，可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使得他突然去世。他比我小几个月，去世时也已到八十。这个病总的来说，原因在于老了，因此他突然去世的偶然性还是有必然性为根据的。我见到赵芳瑛，看她还是能想得开，不怨天尤人。这当然是很对的。

去他那里，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一时说不出究竟缺少什么。后来弄明白了，原来缺少的是他的声音。我有不少的话想同他说。但说了听不到他的回声。不久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哲学所的“自然辩证法组”成立四十周年开了一次纪念会。大会上我讲，现在“经济繁荣”（指经济学这个学科比较繁荣），文学现在也走向昌盛，文艺刊物、报纸副刊不少，但是哲学贫困。这话是在首都讲的，首都哲学界认为我讲的符合实际。我想知道冯契对上海哲学界有何看法。在首都我提出要定期举行哲学论坛，我也想听听冯契的意见。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那晚我只有把我想向冯契提的问题，向陪同我的冯契的两个学生——华东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伟平、哲学系系主任童世骏说了，我想听听他们关于如何使哲学这一学科能够很快地脱贫的意见。

朋友们的书

在我读的书中，有一类是“朋友们的书”。

——有一些朋友，久疏问候，不了解这些年都在从事怎样的创造性活动，他正感兴趣的是是什么。接到书，看了一下知道许多。

吴承明，是“一二·九”时清华同学，他学的就是经济。我开始研究经济学是1942年后的事情，现在才说得上与他是同行。建国后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史。他是一位资深的专家。1991年寄给我的一本书，却是诗作和诗论。读了，知道他在这方面完全是行家。在医院里本想写封信给他，不知道这本书被什么人拿走了，后来一直没有找到。信也就没有完成。

李庚，“一二·九”时他不在北平，而是在南京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后在武汉见面，他在救国会和全国学联，我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为了共同回忆1938年初上海北平南北救国会合流建立民盟前身“抗战建国协

进会”这段历史，前几年通过信、见过面。那时知道他在文联工作，正主编一部多卷本《中国新文艺大系》。他得脑血栓后行动不便，这几年又因不知改为七位数后的他家的电话号码，没有联系。不久前收到他的《真情集》，从诗中知道武汉见面后他走过的道路和这些年的真情实感。

——有一些朋友，是多年来一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彼此很了解，但是接到书，读了，还是有新鲜的感觉。平时见面，许多事不可能谈得那么细，那么深。读了书在本来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更了解，在本来接近的基础上更加深切了。

黄秋耘，他同我的关系不寻常。他是“一二·九”时的清华同学，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全国解放后，他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过相当长一段时间，那几年有时见面。后来他一直在广州工作，见面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他每出一本书都寄给我。他的那本《风雨年华》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期的事，书中还讲到。书的前言中引用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话：“欲语唯真，非真不语，非全真不语。”我在自己写的一篇超短文中引用了，并且就用“欲语唯真”作为文章的题目。近年又收到他的《作品选萃》，散文、小说、杂文、文艺随笔，每一篇都看了。看了之后，秋耘之作为秋耘，他的人格，更具体地、更生动地、也更鲜明地显示在我的眼前。去年冬天去广州到他家见他之后，我写了一篇《秋耘和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其中写我在他家里想起他的那篇《雾失楼台》。

韦君宜，我与她相识同黄秋耘的时间可以说是同时的。我们都是清华同学，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一起参加民先队，后来先后入党。这些年，她每出一本书就送我一本。长篇小说，中篇和短篇小说，还有散文随笔。现在摆在我案头的就有她的一本《海上繁华梦》。书中收有五十一篇散文杂文，大部分是1986年她突发脑溢血后写的，其中三篇写于1936、1945和1948年。最近我又收到她的《露莎之路》。这是一本完全在病后开始写的。她这样描绘自己写这本书的情景：“一天写一点点，今天记住明天要写的内容，用了过去写两个长篇的劲，写了这十来万字。”冰心说韦君宜“是一个极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质朴真挚”。这几年她的作品还表现她的顽强和毅力。的确如她在《露莎之路》后记中所写的那样：“这本书写的时候，已经是脑溢血发作过，半身不遂，手脚都不方便了，只有脑子还一部分管用。心想，人活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谁病到这样还写小说呢！但是我得写。”她的这种精神，对我也是一种鼓励。由于我对她的历史了解得不少，读了我就有把握地说那是一本自叙性的小说。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不用真名，而且最后还编造出一个梦装扮了一下。她写这部小说，不仅显示了她的毅力，而且也显示了她的勇气。延安抢救运动的情景写进小说的，我还没有见到过。读了这本书，我写了一篇《读罢露莎之路》，准备到她家里听听她的意见，再拿出去发表。

——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和我建立起了友谊。他们出了书，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我，寄书给我。我和他们经常互赠作品，以文会友。

邓伟志，社会学家。我同他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反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这种伪科学的宣传。从对四川唐雨“耳朵识字”的报道开始，这种伪科学的宣传已经历时十五个年头多了。应该说眼下不但没有停下来，而且越演越烈，已经达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我是学物理学的，长期做党的科学工作，任内我对这类伪科学宣传处理过几次。我又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者，对

这种伪科学的欺骗，我看得非常清楚，这是完全应该反对的。邓伟志没有我这样的经历，也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认识很坚定。我认为这是不容易的。从这件事开始接触后，我们对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看法很近。我写的东西他注意看，他寄给我的东西我也看。最近他送我一本《我就是我》的随笔文集。书名不知道是否受我的影响。我写过一篇超短文，用的题目就是《我便是我》。文中我写道，“凡是属于我的好的东西，不论遇到多大压力，都不能放弃，咬紧牙关，我就是我。”冯玉祥将军的白话诗《我》，刻在泰山石壁上，几年前看过，其中这一句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邓伟志的这本一百七十来篇，将近三十万字的书我只看过一部分，但是我知道他写的是真实的自己。在自序中他说，“‘真’字在这本书中的是大写的。”

王元化，是文化界很熟悉的人物。他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也有过“胡风分子”的经历。我同他的结交是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后。他来北京，也许还去了天津，帮助周扬写那篇论及异化与人道主义的纪念文章。这篇文章引起的轩然大波，许多人还记忆犹新，但已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为了留下一个历史记录，让后人评论是非曲直，在1988年春我义不容辞地选了周扬、于光远、黎澍、苏绍智、廖盖隆、丁守和六个人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时写的论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选》。在这之前，我和元化还没有见过面。在这之后，由于所见略同，就经常见面，不论他来京或者我去沪总要找时间会面。他出的书也总寄给我。他是个严肃、深刻的学者。他涉及的范围如《文心雕龙》的研究，我没有任何知识。对西方文学我也极为生疏。但是我喜欢读他给我的书。读了可以使我增进我原先缺少的知识，我也多少有些考据的爱好，也喜欢多知道些掌故。见面时由于自己既没有足够的知识，又没什么见解，谈他书的时候比较少。但我还是喜欢他的书，常放在枕旁，今天读一篇，过些时候再读一篇。

李冰封，五年多以前他还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我同他原来只是一种很一般的工作上的关系。彼此成为朋友，却是在他离开出版局局长工作岗位之后，这时我对他的思想、他的人格，有了理解。最近他给了我《李冰封随笔散文初集》，读了他的这本书之后，我写了一篇《〈李冰封散文初集〉读后》。文中我写到，从他“离休”后写的文章看来，他始终没有因为那样的遭遇有消极情绪。书中他引了陆游的《书愤》“壮志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来赞扬湖南籍的一些老同志创办“老战士林场”的壮举。我读了1991年他写的这篇七千字的散文时，就看出他也以此自勉。

——还有一些朋友是文学家。1989年3月我在“邵燕祥杂文作品讨论会”上，偶然看了一本杂志《杂文界》，就随手写了一篇不到一千字的《我慕杂文家》给了坐在我右手边的顾骧。他拿去《光明日报》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就表达了自己对杂文有“仰慕之情”，虽然“不敢挤到这个行列中”，不过有时我又有“不甘心”，“觉得自己多少具备争取做一个杂文家的条件，那就是我常有不少可以写成杂文，而且对于杂文最适宜的题材和思想，不过总是写不成。看来还是要和杂文家交朋友，这样也许可以使自己增加一些杂文家的气质，希望有朝一日写出几篇被读者认为够格的杂文出来。”

于是我和牧惠、邵燕祥等就交了朋友。他们也就把他们写的书寄给我。尤其是牧惠，我手边就有他的好几本书。他们的书也就成为我学写杂文的“参考书”。牧惠和邵燕祥的作品常常引起我的共鸣。牧惠的《歪批水浒》引起

我对文革后期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的回忆，写了一篇《使我回到了1975年秋天》。这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对邵燕祥的那篇《一瞥钟情过温州》我也写过读后感。

后来我又结识了老烈。他是个很风趣的人。说话写文章有他自己的风格。他送了我一本文如其人的《老烈杂文》，后又送我一本《诗文会》。看了《诗文会》我又知道他对京戏很有研究。拿到他的这本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赠非其人”，因为我是个对京戏没有兴趣的人，把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么一本印刷很精美的书送给我，真怪可惜的。不意书中老烈的文章再配合上图画、诗、题名、篆刻，竟引起我的兴趣，使我写了一篇文章给《羊城晚报》的《书趣》副刊。

我还结识了漫画大师廖冰兄。原先我不认识他，不知他从何处看了我写的《碎思录》，就画了十来张与我的文章相配的画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于是我开始与他通信并称兄道弟。后来读了介绍他的文章，看了他的画册，并且两次去广州和他见面。不过我们两个人都有相当水平的“聋”，交谈多少有些障碍。他是画家，同时是文学家。在这里就把他的作品列入我的文学家的“朋友们的书”之列。

原先我觉得用《朋友们的书》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挺不错。可是写到这里，我又觉得颇有缺点。我的朋友很多，送给我的书也很多。在这篇文章里写不全。比如我的哲学和经济学朋友送给我的书，数量上最多，在这篇文章中就没有涉及。又比如已经过世的朋友如孙冶方、黎澍给我的书，对它们我有比较多的话说。可是说来话长，我不能在这篇文章中写了。再比如我也应该写写外国朋友的书，这样的书不多，如果为了求全，也应写而未写。还有一些朋友——像李锐、曾彦修等的书，应该写在黄秋耘、韦君宜那一类里的，也没有写。因此题目没有能够同文章的内容一致，太不全了。不过我不想修改题目了，文章已经写得不短，也就“到此为止”了。

1994年9月29日

忆艾思奇

1996年，是艾思奇逝世三十周年，也是《大众哲学》出版六十周年。我想写一篇回忆艾思奇同志的文章，讲讲我与他的交往和我对他的认识。

闻名

对艾思奇，我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大众哲学》一书，艾思奇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很流行。许许多多青年就是由于读了这本书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提高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艾思奇也就因此一下子出了名，在进步青年中间受到了崇敬。

那时候我还在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许多同学就同我常说起艾思奇。我对哲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在1936年上半年选了一门张申府教授开的“形而上学”，在图书馆从头到尾读了申府教授指定的两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英译本。在啃这样两部书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书太难读，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太重要，一般的青年应该能读到通俗的作品。就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大众哲学》，觉得它正是我希望看到的那种作品，非常高兴。当时在清

华的同学中有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但也有一些人对这本书有所非议，认为水平低，把哲学讲得太简单了。而且在《清华周报》上发表了批评《大众哲学》的文章。说不满《大众哲学》这样的话的人不多，但也不止一两个。有学哲学的人，也有不是学哲学的。我感觉到在清华经院主义的色彩太浓厚了。有些同学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重要性。要提高群众自觉地为社会进步的事业奋斗的认识水平，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通俗化工作怎么行呢？“通俗”必然要“简化”，把道理讲得很复杂，怎能使群众接受呢？我认为只要不伤原意就可以了。当时我就和这些同学辩论，我说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学生，读读这本书也有好处。在辩论中还有别的同学在场，我们是多数派，但并没有说服人数很少的几个人。

在1936年上半年，我虽没有见过艾思奇，但我看过他的书，而且为他写的书发表过议论。

见面

没有想到不到半年，我就见到了艾思奇。

1936年大学毕业后，我要去广州一个大学当助教。暑假，我就在家乡上海，经大同大学的同学程淡志的介绍，参加了一个正在发起中的、叫做“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团结自然科学界进步分子的“外围团体”。

这个团体的第一次会议，也就是它的成立会，是包了八仙桥东方旅社的一间客房举行的。参加这第一次会议有十多个人，我记得的有章汉夫、孙克定、钱保功、程淡志等。这次会议讨论的不是与自然科学有关的问题，而是讨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的那封有名的信件。会议是章汉夫主持的。他在会上讲了发起的经过和这个会的宗旨，讲这个会是艾思奇提出成立的，他介绍艾思奇本人就是学自然科学——生物学的。不过那天艾思奇因为有别的事情，不能分身，故而由他来主持会议。从章汉夫的讲话中，使我知道艾思奇不只是一位文章写得很好的作者，而且还是活跃的组织工作者。

成立会后不久，在我没有离开上海去广州前，又开过两次会，都是在法租界震旦大学附中的一个教室里举行的。这两次讨论的内容倒是学习苏联人果林斯坦写的《自然科学社论》（中译文，上海辛垦书店出版）。在这本书中有介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某些内容。

有一次会议艾思奇去了。那一天他迟到，来到会场时，我已经作过发言。开会时主持者并不知道艾思奇会来，可是他来了，大家很高兴。我看出大家对他很尊重。

这一天我第一次见到艾思奇，听到他的讲话。见到他，同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原先我以为他一定善于辞令，发言会很生动，一定谈笑风生。实际情况不那样，他讲话很少，只是对书中一两个说法提出一些疑问，希望有人回答他的疑问。他完全以一个学习者的姿态发言，给我留下好的印象。

那一天，别人并没有把我介绍给他。他来了之后，我也没有再发言。我相信他不会注意到会有我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只能说那次见了他，可是

这是按照我当时听到的话记下来的。后来了解他学的是冶金采矿，是在日本福岗高等学校学的。艾思奇是云南腾冲人。有一次我去云南还到他的家看过一次，家中有不少藏书。他十七岁时就去日本，参加廖承志组织的东京支部读书会，不久发生济南五三惨案，愤而回国。二十岁二次去日本，才在福岗学冶金采矿业。

还谈不上彼此相识。

相识

我和艾思奇相识是在三年多后的1940年，在延安文化沟的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新哲学年会上。

1938年下半年成立了一个“新哲学会”。主持这个新哲学会务的是艾思奇和何思敬。这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们两位是特别重视的。我到延安后先同何思敬教授见面。何思敬介绍我参加这个新哲学会，不久我就参加这次新哲学会年会。

我一到会，何思敬就把我介绍给艾思奇，对艾说我对哲学兴趣很高。从何对艾说的话中我知道何事先已对他谈到过我。会前艾很忙，除了表示欢迎外，没有说什么话。

这次年会到的人很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人都到了。学者们参加的我记得的有茅盾、范文澜、和培元、周扬、郭化若、陈伯达、杨松等。会议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在会议开始时他们讲了新哲学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在何思敬同志致开幕词回顾过去时，讲新哲学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成就是“我们的会员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新民主主义论》……”，许多人听了他把毛主席写这篇文章说成是新哲学学会的工作，不禁笑了起来。毛泽东自己也哈哈大笑。可是艾思奇接着作会务报告，似乎没有发觉大家笑的原因，还是一本正经地讲基本上同样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艾思奇的系统发言。

在这个会上，我从对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分析讲了自己对“过渡”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家对我的发言看来相当有兴趣。会后在文化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会餐。我就坐在毛泽东的旁边，艾思奇也在同一张圆桌上。在餐桌上，毛泽东就我的发言发表了研究哲学的人应该学点自然科学的主张。艾思奇也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谈话。

这一次，我同艾思奇可以说彼此“相识”了。

同事

1946年我从北平回延安，在《解放日报》工作，艾思奇是副总编辑，我是言论部副主编，我和他成了在同一个单位里工作的同事。他是报社的“领导”，但当时机关里官气很少，大家不称他什么“艾副总编”，都叫他“老艾”。艾思奇分工管副刊（他对文学一直很有兴趣），不管我这个言论部，但是机关里常举行晚会。晚会上大家出节目，或者唱歌，或者说些逗乐的故事笑话，也要艾思奇“来一个”。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表现为难，他大概真的不会唱。逼得没办法，有两次他都这么开头：“我生平只会讲一个笑话……”，接着就讲这个“唯一的笑话”：女主人和女佣都是宁波人，女主人叫女佣的名字“lai xi”，佣问“so”（什么）？主：“dolai”（拿来），佣：“so do lai”（拿什么来），主：“lai mi so si do lai”（蓝棉纱线拿来），佣：“do lai la, do lai la”（拿来了，拿来了）。他讲过不止一次，报社人对他这个笑话很熟悉，我也就记得很清楚。一次晚会有人也给艾思奇开玩笑，编造他的“笑话”：有一个晚上，艾思奇开完会从窑洞里出来，不知道窑前有人挖了一条沟，不小心跌了进去。他并不忙着站起来，而是躺在沟里想，“这次我跌进去究竟是必然性的呢，还是偶然性的……”。大家笑，他不笑，也不生气。艾思奇就是这样随和、没有一点官架子的人。同事们都很喜欢他。

1946年底，有一个消息说胡宗南要进攻边区，于是报社就离开延安搬迁到“山沟沟”里去，只留少数人在延安看战事的形势发展决定去还是不到山沟沟里去。我是被留下的一个。那时我是报社党支部委员。大队人马走后，检查保密工作时，我在艾思奇办公室的字纸篓里发现他写的一篇关于解放区家庭问题的社论草稿。内容不涉及任何机密，但是上面毛泽东用毛笔作了大量的修改，最后连题目都改了。改完后毛泽东写了“此文不发表”，退给了艾思奇。于是这个有毛艾两人字迹、还有洛甫用红铅笔打的杠杠（毛泽东注有“红杠是洛甫打的”几个字）的手稿，就一直珍藏在我身边。后来我送去革命历史博物馆，请他们制作了一个复制品，因此我至今还保存着它。

朋友

后来我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个成员。1948年起调到中央宣传部长期负责政治教育、理论宣传、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我与艾思奇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是在工作上交往比较多，过去又是同事，于是彼此就成了朋友。

建国初期，北京有一本影响很大的杂志《学习》，它是艾思奇等同志发起的。这个杂志第一期有一篇开宗明义的文章《从头学起》就是艾思奇写的。我不是这个杂志的发起人，是从第二期起要我担任主编的。由于这个杂志是艾思奇等同志发起的，他对这个杂志的工作很热心，我就经常约他写文章，他在这本杂志上写的文章就很多。

在建国初期，社会上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我和艾思奇不但在《学习》杂志的工作上密切合作，我们还有其他不少一起做的工作。比如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组织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学习理论，就请了艾思奇和我两人当教员，给政协委员们上课。请艾思奇和我两个人给高级人士（不是民主人士，而是兄弟党领袖）上理论课的事我记得清楚的还有一件，那就是印度支那某一个国家的领袖到北京来，要我国党的学者给他讲毛泽东思想，他们请的教员就有艾思奇和我两人。我们两个教员就在钓鱼台国宾馆给他一个人上课（他没有让自己的随员也听一听）。我与艾商量好，由他对《实践论》和《矛盾论》作系统介绍后，我作补充。

我和艾思奇在哲学观点上很一致，没有发生过学术争论。包括三反五反期间在《学习》杂志发表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重性而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两重性那组文章中的观点，我和他也都是是一致的。他的那篇文章就是我们——杂志编辑部向他约稿的。那时我已经不再担任《学习》的主编了，主编是王惠德，我作为中宣部政治教育处的负责人领导这个杂志的工作。

还有一件事想补充说一说的。那就是我对自然辩证法这一哲学领域兴趣很高，也就特别去抓这方面的工作。1941年我在延安组织了一个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读书会，读的书是《反杜林论》哲学部分。这个座谈会定期在文化沟中山图书馆的窑洞里举行。艾思奇也是这个会的积极分子，经常出席。建国后，在北京我也致力开展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发起的各种活动，只要我去请他，他总参加，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不平

建国后，我和艾思奇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以外，往来不多。中央党校的地点在西郊，和我工作的地点很远，我从来没有去他家串过门。他的情形知道得很少。不过我在中宣部多次听说中央党校批判艾思奇。一次是艾思奇在讲

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时，举了中国革命产生自己的领袖是必然的，而这个领袖是毛泽东不是别人则是具有偶然性的。为此艾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只是我，在中宣部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同我的观点一样，对党校这样批判艾思奇很不以为然，认为艾思奇这么讲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央党校有很爱整人而且整得很凶的人，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央党校不奇怪。中宣部同中央党校又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想也不敢去惹事。后来又听说批判起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来了。初听到，感到有些惊诧，这么一本在抗战以前出版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著作，何以成了批判对象，简直是不能理解。据说批评这本书简单化庸俗化。我就想，通俗化三个字就有一个“俗”字，而通俗化就一定要把复杂的道理用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当时我正看《淮南子》这本书，书上就写有“大乐必简”，“大礼必简”，讲“浣爵而饮，可以养家老，而不可以飨三军”这样意思的话。至于杨献珍那一本严肃的哲学著作《什么是唯物主义》中，把弄虚作假，丈夫想生儿子、老婆生了女儿、一脚把老婆踢到床下之类的事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大家倒觉得实在不那么合适。因此许立群说这是庸俗化简单化时（我倒附和了几句），反而引起杨献珍极大的不满。

后来，那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得知出版了厚厚一本《我的哲学罪案》。攻击艾思奇批评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整人。书中批判艾思奇的地方很多很多，话说得很凶，有些话简直是谩骂。对于这件事，同我完全没有关系，不过我也可以提供一个第一手的材料，证明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是毛泽东本人，艾思奇只是一般地写过文章而已。我说的这个材料是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周培源和我谈论哲学问题时，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讲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周培源耳朵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中南海出来后问我“主席是讲了杨献珍”？我说“是的”。不过我整理记录时把“杨献珍就是一个”这几个字略去了。说要批“合二而一”应该说是毛泽东的意见，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我没有看过艾思奇的文章，但说艾整人，把毛泽东的事算在艾思奇的帐上，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

总而言之，我从自己与他的接触中，深感艾思奇决不是一个整人的人。要说他有什么缺点，委曲求全，退让得太多。没有早日离开当时的中央党校这个是非之地，也许可以算做一个失误。“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周扬语），不断挨“整”的这样一个人，却被诬为打手。我虽不了解详情，而且事不关己，但是心中一直忿忿不平。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有艾思奇这个词目，对艾的评语是：“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的，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群众化。他在1934年发表的《大众哲学》曾经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起过启蒙作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对他的评价应该这么写才是公正的。

1995年11月10日

杨匏安夫人

1936年我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岭南大学当助教。我去广州的目的是在华南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但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华侨子弟，也有一些是外国人，提高他（她）们的觉悟很吃力。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后，广州文化界举行了一个纪念会。在会上我继洪深、尚仲衣等人讲话后，自动走上讲坛作了一个演说，感情很激动，还朗读了我写的几首纪念鲁迅先生的诗。讲完走下讲坛，有四个青年人找我，其中有一个便是广州仲恺农工学校的杨宗锐（现改名杨明）。还有三位，两位也是仲恺农工学校的学生，黄裕梅和凌云衡，一位中山大学的学生李康寿。鲁迅纪念会后，我的活动走出岭南大学校园，在广州的其他学校、汉民路几家书店等开展工作，并且成立了一个青年革命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杨明年龄最轻。那时的杨明才十六岁。他普通话讲得很好，而我才去广州，广州话才开始学。于是，我出去活动时就常常找他一起走，帮我翻译，因此我同他就比同别人要接近一些。

有一次，我对他做“思想工作”。我说“我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何如何……”我一直以为知识分子大都是在小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没有想到他说：“我不是在小资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这样我才问他的家庭状况。他告诉我，他家是中山县农民，他的父亲是杨匏安。杨匏安是很早入党的共产党员之一，而且是党中央委员。1931年他父亲三十五岁那一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不过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他是从孤儿院出来到仲恺农工学校的。后来他才告诉我，他的父亲就义后，全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回到了广州后没有地方去，就同他的妹妹一起去了孤儿院。后来何香凝知道了，设法帮助他进了这个学校。杨宗锐小时候一直同他父亲一起生活，过的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困苦的家庭生活。

我再问他的母亲。他告诉我，他母亲和父亲是在家乡结婚的。他的母亲姓吴，叫吴佩琪，也是中山县人。1918年全家搬到广州，住在一个叫杨家祠的地方。这个杨家祠就是他的家乡中山县南屏乡北山村姓杨的人家在广州兴建的祠堂。他们全家在那里住了几年。杨宗锐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杨宗锐的妈妈从丈夫给她讲的那些和在家里听到的同志们的谈话中，明白了许多道理。她还跟着她的丈夫去过外国，对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得不少。她知道

杨匏安 1896年11月6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后改中山县）。中学毕业后曾东渡日本，接触西方和社会主义思潮。1916年二十岁的杨匏安从日本回到家乡，在学校教学和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鼓吹革命。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从1919年5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底为止，他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著文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间几乎是在同时。他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南洋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活动了一个时期，于1929年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此时他编译了《西洋史要》、《地租论》等著作。1931年在上海被捕，8月在龙华遇害。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华南地区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党中央担任很重要的工作，他是廖仲恺、谭平山、林伯渠等人的好友，在党内则与周恩来、陈延年等一起工作。在他诞生九十周年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匏安文集》，在他的家乡——今天的珠海市内，建造了他的铜像。在广东知道杨匏安的人较多，但仍有不少人不了解他。全国其他地方知道他的人就比较少了。应该使更多的人了解他，向他学习。1996年他百年诞辰，中央文献出版社增订出版了他的文集。并在珠海举行了纪念会。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写了纪念文章。

自己的丈夫做的事是正义的、光荣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同时她也知道是非常危险的，她知道自己见过的革命者一个一个地牺牲了，怕自己的丈夫也这样，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最后她的丈夫还是被杀害了。杨匏安的家本来就穷。现在丈夫死了，孩子又很多，生活很困难。杨宗锐给我讲他家的情况时，大儿子在香港一个小店里打工，二儿子（就是杨宗锐）在仲恺农工学校读书，那个学校不收学费。其他的孩子在中山乡下。母亲有病就住在广州的杨家祠。

听了杨宗锐给我讲的这些情况之后，使我对他的父亲产生了一种崇敬的感情，对他的母亲也很同情。于是我就要杨明陪我去杨家祠，看看他的妈妈。

1937年1月的一天，我去看她了。

我看到她住在杨家祠一间很大的大厅里。我没有看清这个大厅里住有多少人家。我的印象有许多家住在那里。杨匏安夫人住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一张凳子这么大的空间。她住的地方同别人住的地方之间没有墙壁，而是用柜子隔开的。

我们去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大概她的病不能下地，主要是卧床。她生的不知是什么病。杨宗锐只知道是“血崩”。我想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子宫癌。但是又穷得没有钱去治疗，而且还要赚点钱过日子，因此还在劳动——躺在床上剪放在面条上的红花。剪一百个只有几分钱的手工钱。我去的时候她正靠在床上，手中正拿着剪刀和大张的红纸，把剪好的纸花放在身上的一个竹箩上。

在她儿子把我介绍给她之后，她让我坐在那张凳子上，她对我说了一句：“现在的世界真不好。”她一下子就讲到世界，的确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的口气。我听了很激动地对她说：“世界不好，我们就要把它翻过来。”我从她的表情中看出，自己的儿子带了我这样一个从北方来的陌生人，而且是一个发出“要把世界翻过来”这样的豪言壮语的人，有着丰富经验的她，一下子心里可能明白过来，“他的丈夫后继有了人”，因此显得既是得到了一种安慰，又很担心自己这个儿子的安全。她对我苦笑一下，说了一句“宗锐还小，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再没有多讲。

她显得非常衰弱。我算了一下，五年前杨匏安去世时才三十五岁，假定他们夫妻的年龄相近，那么她的年龄也就是四十岁左右，可以说还属于中青年的范围。但是她看上去仿佛已经有六、七十岁。那天她似乎不想多说话。我想多说一些，可又考虑到我们在一个完全不隔音的地方，不能多谈什么。因此坐了一会儿之后，只好告辞。临走时，我握着她的手，不知说些什么好，只说了三个字“你放心”。

我见她的这一次，从见面到分手，不超过一个小时，但是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一直想着她说的那句“这个世界真不好”和我说的“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翻过来”。我说的这句话，仿佛是我的一句誓言。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这是我第一次见她，也是最后一次见她。不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也是杨宗锐最后一次见她。出了杨家祠，我和杨宗锐分手。杨到仲恺农工学校的同学黄裕梅那里去，我到汉民路去学日语。没过多久，杨在汉民路的书店找到了我，满头大汗，告诉我黄裕梅刚刚被反动派逮捕走了。除这位同志之外，我们还得知我们的那个革命团体还有好几个成员在同一天被捕。于是我就把杨宗锐带去了香港，后来杨又同另一个战友力一到了海南岛，来不及向他患着重病的妈妈告别。

杨宗锐的妈妈病故了。她最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有没有亲人在她身边，都说了些什么话，我们都不得而知。后来我见到杨宗锐时，只问了他妈妈去世的时间（他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没有问更多的情况，因此至今一点也不知道。

1937年我回到北平，杨宗锐就去了海口，在海口他与力一找到了党组织。1938年他去延安时路过武汉，我引他见到周恩来。周恩来非常关心杨敏安的后代。对这次接见杨明写过一段回忆。我把这段回忆作为这篇文章的附录。杨后来成为一个电子专家，工作到离休。我和他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

1996年1月18日

附 杨明：周恩来叔叔与我的一次谈话

一九三八年，我自海南赴延安，四月过武汉。于光远同志告诉我周恩来叔叔正在八路军办事处，我听了非常高兴，立刻请于光远同志带我去见他。当时我心里有点矛盾，一是怕耽误他的时间，二怕已有八年没见过面，周叔叔可能不认识或者忘记我了。没想到周叔叔听说我来找他立刻就接见了，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不要介绍了，我认得你。长得更像你父亲了，连说话的神情都像。”谈话转到对我父亲的回忆，周叔叔讲述了我父亲被捕的经过和对敌人作斗争的情况，特别赞许他品学高尚，英勇坚强，严正地拒绝了蒋介石对他的各种劝降活动，最后把蒋介石安到牢房和他通话的电话机都摔碎了。蒋介石劝降无望就将我父亲秘密杀害于龙华，组织上拟定的劫车营救办法就未能实现。周叔叔又将我父亲在狱中作的“示难友”一诗让我抄录，并给我讲解此诗的含义和用语所指。教导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努力学习他的榜样，然后又一一询问我的家人情况。他说“一二八”事变后，组织上为了寻找我们一家费了很大周折，他除了托何香凝先生及一些同志找我们之外，又亲自化名周翔宇写信给我们的乡亲探听我们的下落（后来我见到省委连贯同志才知道他就曾受托到中山家乡找过我们）。周叔叔得知我祖母尚健在很高兴，称赞她支持跟随我父亲搞革命（她生九个孩子，只养活我父亲一人），现在又支持孙辈参加革命，值得钦佩。听到我母亲已病逝，周叔叔非常难过，叹息她死得太早，说她为党做过很多工作，我们时常都记得她（母亲在上海曾掩护过周叔叔及父亲的机关）。周叔叔问我这几年怎样渡过困难，做过些什么事？我说祖母和母亲靠打零工、做手工，我们小孩子能做的也一起做，但基本上是到处寄食流浪。我和妹妹经陈大年先生的担保进了孤儿院。周叔叔对孤儿院的情况很关注，叫我详细讲一讲。我讲到的百名孤儿孤苦伶仃，病得无助，整天都生活在悲惨气氛之中。那些富人资本家和社会名流借慈善之名从中谋利，残酷剥削虐待孤儿，为他们创造财富，训练他们需要的廉价劳动者以及侍候他们的奴婢，孤儿们孤苦无告，弱者夭折死亡，幸存者前途渺茫……。周叔叔听罢感慨地说，这都是社会剥削制度所造成的，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要进行革命，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要将革命工作做好，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状态。你和妹妹经受过这样的生活锻炼虽然苦一点，但对你们的成长是会有好处的，周叔叔说要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处在这样苦难中的人，才懂得一个革命者责任的重大。周叔叔又问我参加过哪些社会活动，通

过什么关系去延安？我告诉他，何香凝伯母一九三五年回到广州将我从孤儿院接出来，送到“仲恺农工学校”读农科，由此我参加了救亡运动，结识了由北平南来的黄秋耘、于光远、力伯皖等同志，组织“民先”分队部。后来逃避国民党的通缉到了海南，和海口市委林克泽取得联系，并由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是组织决定去延安学习。周叔叔听了很高兴，勉励我说这很好，看来你们是长大了，到了延安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了，你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点理论政策，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将出版，你到延安就能看到。主席非常英明，这部书反映了我们党的一些基本战略思想，很重要，你必须认真学习。你祖母及家人我们会通过省港组织的廖承志同志妥善安排好。我怕耽误周叔叔太多时间再一次向他告辞。临走他又问我住在那里，我说住在“民先”总队部，等待有同行的人一起走，以便相互照应。周叔叔可能看我年少，初到北方，便建议我搬到办事处住几天，待有军运列车去西安搭车同去较为便捷安全。为此他又请来钱之光同志为我作了安排。几天之后钱之光叔叔亲自送我到“达志门”车站，将我介绍给押车副官冯××同志（同车还有严熹、范杏仙、孙更新同志），又将周叔叔给我作路费的三十元转交给我。我心中充满着革命长辈亲切关怀的温暖，深思着那些严肃的教导，走向革命圣地延安。

1987年5月1日

写在1996年10月14日

两星期前，老朋友力一走了。后天在八宝山举行对他的告别仪式。我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和他见面。决定写这样一篇文章寄托我的哀思。

至今我没有问过他父亲母亲家庭的情况。我只知道他是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三大家族”之一的力氏兄弟之一。“三大家族”这个词是我起的。方琦德、方珂德、方璞德（杨永直）、方馆德、方成德（何钧）……就我所知，就有这么多的“方……德”。叫“叶笃…”的也有好多位：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正、叶笃成（方实）。力一的兄弟姐妹也真不少，有力伯杭（力一湖）、力伯皖（力一）、力伯法、力伯津、力伯京、力伯长、力伯莪（苏椰）、力伯良、力一洲。力一告诉我，他的亲兄弟姐妹所起的名字，均表示诞生时他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杭州、安徽、法国、天津、北京。只是力伯长诞生时他的父亲也在北京，因此这个“长”字表示他父亲住在北京的长安街，而不是在长安、长沙或者长春。从这一点可以知道他父亲的社会地位不低，而且是一个活动能力强的人。

但是我和力一友谊的产生，不是在北平，而是在广州。1936年我在广州发起建立一个青年革命团体。这个团体事实上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广州地方队部。可是我考虑到人数还是少了一点，想等参加的人多一点后再正式打出这个旗号。由于这个团体立即着手编了一张小报，起了一个报名《一条心》，大家也就把这个团体叫“一条心”。就在这个时候，在北平的民先总队部发现“力伯…”中有一个人广州，并告诉我这个“力伯…”就是“力伯皖”（后来改名“力一”），他在广州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了

后来问了杨明，他父亲的职业是医生。

他。他就立即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

姓“力”的人很少。他参加这个团体后，在一次活动中，有人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姓力，力量一定很强，我们这个团体有你参加，就叫做‘力社’吧。”这句玩笑话不知怎么传到别人耳中。在延安整风审干时，有人就向我提出问题：“蒋介石的哲学是‘力行哲学’，‘力行社’是一个蓝衣社的组织。你们这个‘力社’同蓝衣社是什么关系？”这件事我似乎没有对力一说过。

力一是我们团体中年龄最大（比我还大两岁）的，说话做事很稳重。我们这个团体的事我总是在同他商量后作出决定。

他参加我们这个组织是在十一月中下旬。不久，放寒假的时候到了。北平民先总队部利用清华民先队员黄超显回香港之便，带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桂林找李宗仁、白崇禧，为民先做统战工作。并捎来了一本捐册，要我向李、白捐一些钱。我找力一商量了一下，要他请几天假同我一起去广西。

我们先到梧州，找到了清华民先队员黄汉炎。力一提议我们在梧州先开一个座谈会，建立我们这个团体和梧州革命青年间的联系。黄汉炎找来了六七个人，就在他的家里举行了一次座谈。当梧州的这些青年朋友们知道我们准备去找李、白时，一致反对我们这一个计划。他们根据所了解的情况认为，这时候去不但搞不成什么统一战线，而且可能遇到危险。我和力一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重视当地人的意见，就从梧州回到广州。这是1937年1月上旬的事。

从广西回到广州后不久。有一天我和杨明从岭南大学过珠江去找我们团体里的成员，研究寒假后的工作。就在那一天，我们发现这个团体里的黄裕梅、谢恩昆、李康寿等人被捕。在一家一家通报这个情况后，最后到了东山力一的家里。他那里警方尚未光顾。夜间和清早我们研究了营救被捕同志和向社会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事。第二天晚上，我们三人在天字码头一家茶楼碰头，作出决定，我和杨明立即去香港争取有陈济棠背景的《港报》和有广西背景的《大众日报》，希望他们发表消息和抨击广州当局的评论。在香港活动的结果，这两家报纸不愿这么做。过不久，在香港一家反动报纸上登出广州当局破获了一个共产党不法分子的团体。被捕到的人已在广州大沙头“正法”。从文字来看，无疑指的是我们这个团体。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想回广州看看。于是让杨明留在香港，我在二月一日学校开学那天到广州。回校后，一位同事告我，警方已来校多次捕我，让我快离开。这位同事送我到广九车站回到香港，那天回广州来不及同力一联系。

1937年1月我与力一分别后，一直与他联系不上。1938年4月底或5月初有一天，力一和杨明突然到武昌民先队部找到了我。这时我才了解到分手后他们的情况：（1）警方始终没有去广州国际广播电台去找力一的麻烦，可能被捕的人中没有人供出他来。但在广州安全没有保障，他就设法离开广州去海南当电报局的局长，并把杨明找去。（2）在海口电报局他和杨明找到海口市的党组织，并且入了党。（3）海口党组织同意他们去延安学习。见到他们后，我帮他们和长江局联系上了。分手一年多，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加入了党。

他们先去了延安。1939年7月我去延安，我和力一不但不在一个单位，甚至不在一个系统。力一在中财部工业处，参加了政府工作。我在中央青委做文化工作。与屈伯传等人一起建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是我做的

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力一和我都是研究会内人数很少的驻会干事之一。他参加了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开辟的一个副刊《科学园地》的编辑和写稿的工作。他是文章写得最多的人之一。其中《炮打原子》应该说是一篇非常出色的科普文章，甚至可以说不仅是一篇科普文章。他在1942年2月预言了原子弹可能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用力一自己的话说，这是自己比较大胆的设想。考虑到在延安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当时他能有这样的见解，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1942年整风后，我们又因“审干”“抢救”等，中断了联系。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在流动中，也一直没有联系上。建国后我同他和杨明不在一个行业，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也很少见面。1960年3月我去捷克参加《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学术讨论会，路经莫斯科。非常凑巧，他、杨明和我三人都在莫斯科。我们聚会畅谈了一次，这时候我知道力一已经成为加速器的专家，杨明也成了电子行业中的专家。

行业不同，工作上没有接触，在北京市住的地方又很远，大家都忙，彼此见面的机会很少。这几年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也多次说要去看他，但一直拖到他这次住进医院才同杨明一起去看他。那天才抢救后，身体状况有所改善，但他已经没有精神说话了。后来听到的消息说，情况有好转，但尚未脱离危险期。不久后又听说感染上了肺炎。我知道，多种严重的疾病并发，一定很危险。果然，医院说现在医学手段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无能为力。十月一日前夕，与我相识六十年的朋友终于走了。虽然这是自然界无情的规律，但我还是排除不了悲痛。写这样一篇东西，讲讲彼此间的友谊，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袁也烈和我

1972年9月我从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邻居告诉我对门有一位老同志常打问我的情况。再一问，这位“老同志”就是1973年初我在北平入党后编入的第一个党小组的组长袁也烈。

我是1969年搬到这个院子里住的。当时听说过，在我的房间里一抬头就可以看见的那座两层楼里，住的是一位海军高级干部。我心想海军中我没有很多熟人，也就没在意。而且那时我们这些“走资派”从不往来，因此连那位高干姓名也没有想去了解。不久我就下干校了，一去三年。干校回来后，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老战友竟近在咫尺。我很快就去拜见他。

一问，他已经是七十三岁了。青年时代的战友竟然也有年过七十的，这是同他见面后第一个感想。回来就对家里人说了。至于他也是一个“走资派”，在文革中也挨过整，这些大家都彼此彼此，反而在脑海引不起什么波澜了。

老战友见面不免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同袁也烈最早的接触是在1937年3、4月间。1936年秋我去广州，组织了一个青年革命组织，它在1937年1月被国民党当局破坏。李昌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带信要我到北平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我也就在三月从广州回到北平后成为党员的。这时候袁也烈已经在北平。那时他在帮助北平的民先队员学军事。民先——它的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1935年党中央决定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党员、原有的共青团不再存在之后成立的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团体。估计到抗日战争有可能在不久后爆发，民先队员们有学习军

事的愿望，党组织也希望这些青年人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于是袁也烈就成为民先队的军事教官。民先队还给了他一个民先总队部武装部长的名义。他开始担任这个工作的时间，比我从广东回到北平的时间要早一些，因此我到总队部工作不久，就知道地方队部有个外号叫“老官话”的老红军担任教官，他帮助总队部在西山组织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夏令营演习，我还看到他编的给民先队员看的《游击战术纲要》。

我入党后不久，有一天，李哲人——李昌去延安参加党中央的会议后他负责民先全国总队部的工作——对我说：“你已编入了一个党的小组，不久会有人来找。”后来这个人来了，个子很高大，有一副只要见一次就不会忘记的面容，湖南口音，他就是那个“老官话”。那时他没有告诉我袁也烈这个名字，我也不问他的姓名。见面后，他要我跟着他上街，说在街上谈话反而安全。他说我是他担任小组长的一个党小组成员，其他小组成员暂时不同我见面，我和他先“单线联系”。他告诉我当时的北平党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北平党的领导机关是市委。民先全国总队部的工作是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但是生活在北平的党员还是在北平的党内过组织生活。他对我简单介绍了党的组织系统与组织原则。这是我与他第一次一起过组织生活。过了几天之后，他又约我上街，并且要我跟着他去西单南宣武门内的湖南会馆。他就住在那里。那天在街上和会馆里他和我作了第二次谈话，并且给了我一个党内资料，是关于军事方面的。1937年半年中，他和我见面只有三次，除了上面说的两次外，第三次时间很短。

在几次他和我的谈话中我看出他的工作决不限于当民先队的武装部长，不过地下工作的规矩是不作兴问的，因此我不知道他全面的工作情况。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市委在《人民之友》的增刊上发出号召，要共产党员和接受党领导的革命者“为保卫北平而流最后一滴血”。因此大部分党员留在北平。可是党组织决定我去保定，为民先全国总队部的名义与各地民先队部联系。我本来应该早一点动身，可是由于对战争形势缺乏正确估计，没有预料到我国的军队很快就被日军打败，直到北平沦陷当天早上我们才离开北平。那天早上七点左右我出西直门。在那里我看到有不少人也正想离开北平，他们都是民先队员或党员。在这些人中就有“老官话”。各有各的任务，我也不便在人群中和他说话。我们这些人走在一起，走到北平西郊的田村与日军的一个坦克军队相遇，我和赵德尊等走在最前面的五个人被日军抓住。袁也烈动作敏捷，跑得快没有被抓住。后来了解他回到了城里，听说党派他带领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打进石友三的学兵队里做党的工作。

我和袁再次见面是在1948年初，地点是山东渤海解放区。那一次我是作为“中央土改工作团”的成员到这个解放区搞土改的。在去渤海前我并不知道袁也烈在那个地方。到了渤海，我们参加了开得很长时间的全区土地工作会议。渤海区党委的书记是景晓村，行署主任是李人凤。袁也烈是军区司令。他们是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会议的主持者。在会议期间我和袁也烈又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不过因为是在冬天，他穿了一件皮领子的军大衣，比在北平时显得魁梧。十一年不见了，本来想同他好好谈一谈，彼此了解一下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可是那次土地会议对于渤海区党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来说是一个心情很紧张的会议。康生出席会议，这个家伙一有机会就要整人，那时他要整区党委的那几个领导人，康生攻击渤海区党委的书记景晓村

思想上没有入党，其他几个人，包括袁也烈在内也都犯有“错误”。我看出在这种情况下袁也烈不会有同我叙旧的闲情逸致，因此只简单地交谈了一下。会后我下了农村——阳信县的董家佛堂。那年在渤海始终未能畅谈。

从那次分别到再次见面，中间相隔的时间就更长了，不是十一年而是二十四年。建国后不久有一年，我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他在海军里工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最早的领导人中的一员。后来又听说他主持水产部的工作。由于不但在远洋、而且在沿海捕鱼都需要海军的保护，他一身二任——既在海军又在水产部负责，对于领导这个工作有一种特别优越的地方。但是因为同他没有发生过工作关系，彼此也不知道地址，一直没有见面。没想到在文革期间我们会住得这么邻近。即便如此，也还是在彼此成为邻居三年之后才见面。

这时候他和我都在家等结论，有时他到我家里来，有时我上他家住的楼上去。本来整个院子都是他的住宅，文革后搬进去了好几家，他家人的居住面积受到了很大的压缩。他家和我家住的都成了杂院。我们之间话题不是很多，但是除了往事和彼此都熟悉的人之外，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是免不了要谈的。我发现他并不那么爱讲文革中的事情，不过见面多了，对他的情况了解得多了一些；他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委屈。他早年是跟小平同志在左右江闹革命的，这段历史也似乎成为他长期被整的一个原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他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一伙，为了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向他逼供、取证，他都坚决抵制，维护历史事实的尊严。对“四人帮”给他作出的诬陷结论，也寸步不让，多次申诉。这些情况他只是断断续续地告诉我的。

在这一段时间的接触中，我也了解到他早期工作的历史。初相识时我和他都是一个青年团体——民先总队部的工作人员，以前我把他看成同一代人，在对他了解得多了一些之后，觉得他是我的前辈。他比我长十六岁，我进小学时，他就在长沙参加革命，听毛泽东讲课。在五卅以前他就反对滇系和桂系军阀在广州的叛乱了，投奔黄埔军校，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秘书长聂荣臻领导下，担任政治部工作。1925年他作为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连长北伐，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建立了战功。1927年他列席过党的五大，八一南昌起义中他率领一个营，机智勇敢地全歼了驻守南昌东门的朱培德部两千余人。1928年他被派去广西龙州，这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西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龙州正在酝酿起义，1931年继百色起义之后，龙州也举行了起义，百色成立了红七军，龙州成立了红八军，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两个军的总政委。袁也烈在红八军一个纵队担任参谋长，在左右江的军事斗争中艰苦奋斗，直到与红七军会合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对他早期历史了解得越多，我越觉得他应该受到我的尊敬和爱慕。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摆过老资格，只是青年团体的同事和第一个党小组长。

从1972年到1975年我和他作为邻居相处了三年。1974年党组织找我做一点临时工作，那是正式恢复工作的前奏。1975年夏天，开始正式恢复工作，到了小平同志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可是他一直在家等结论。虽然有一个时期因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他的处境似乎好一些，可是不久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结论一直拖着。

1975年我的小女儿在史家胡同小学念书的时候，暑假老师布置作业，要写“暑期通讯”。通讯要写事实，有事实才能写，她犯起了愁。我忽然想到

一个好题目，对她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袁伯伯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你可以到袁伯伯那里访问，把他讲的记下来，不是一篇很好的通讯吗？”去之前我还找出《星火燎原》，让她好好学习书中袁也烈的那篇《八一的枪声》。回来后看出她对这次访问高兴极了。她对我说，在听了她提出的要求之后，袁伯伯说：“有些话以前不好讲，现在可以讲了。林彪他说自己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建立了什么伟大的功勋，其实八一起义时他根本不在南昌，而在一个叫‘涂家埠’的地方。连南昌这个地方都不在，他怎么在这场起义中建立什么‘功勋’呢。”袁也烈说那时他是林彪的上级。当他是连长时，林彪是他属下的一个见习排长。当他是营长时，林彪是他属下的一个连长。他说，“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在南昌起义中地位很高，不会知道林彪的情况，我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小女儿就把访问结果写成一个通讯，我见了也很高兴，说“一年级小学生竟写了关于党史的第一手材料”。可惜这个《暑期通讯》没有保存下来。过后不久，我也到对面楼上，说起那次“访问”，他说自己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林彪是学员，北伐时他和林彪在一个团。他当连长林彪是见习排长就是那个时期的事，而他当营长林彪是他属下的连长是到了江西之后的事。北伐时的汀泗桥大战，林彪没有参加。林彪是队伍打到武汉时赶上来的。他对我说，到北京后，林彪装着不认识他，其实决不会不认识他，而是不便认识。——“认识”，讲起过去的事情来，林彪他编造的许多假历史，就不好办了。这次小孩子访问使我对他又多了一层了解。

不久后他就进了医院，我到医院探望了他。他在红七军北上时负过伤，上海被捕后，五年狱中生活又备受折磨，文革后年已七十的他又到干校劳动，身体是很衰弱了。而对他的精神迫害还在继续，这对他的身体当然十分不利。不过那次在医院见他时精神还好，没有想到不久他的病加重了，更没有想到接着他就去世。我听到关于他的噩耗很悲痛。

我同袁也烈的交往就是这样的三个时期。1937年抗战前后在北平，1948年在渤海，1972年后在史家胡同，而以后一段的时间最长。

袁也烈同志去世后，我同他的夫人罗加同志经常接触。她给我看了有关也烈同志的许多材料，她讲的关于袁也烈同志一生的事迹比袁自己讲的多。从罗加同志处我知道袁也烈在山东工作的时间很长。1939年7月，他就随纵队司令徐向前、政委朱瑞到了山东，我在渤海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山东工作九年了。先是做军政干部学校工作和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长，后是做清河军区参谋长。1944年初“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他就担任军区参谋长。日本投降后改任渤海军区司令员。在我见到他前不久，渤海军区主力组建渤海纵队，袁还兼纵队司令。这就是1948年初我见到他时的职务。像他这样一位在渤海地区指挥我军与日伪和国民党长期战斗，战功累累的指挥员（景晓村一直是他的亲密合作者）却成了康生攻击的对象，不过他还是继续担任指挥员的职务，在解放潍县城之后，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他调任山东军区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在山东长期工作，调去海军后同在山东工作的同事也保持着联系。山东有许多同志了解他、怀念他。他实在走得太早了一点，如果他能看到四人帮垮台，也许身体就会得到好转。

统铺之交

抗战初期在太原和武汉工作那段时间，基本上我都是和许多人一起睡统铺。统铺也者，是许多块木板搭起的一张大铺。它的宽度视情况而定。木板上先铺上褥子，每人一条被子，睡在一起。统铺上除常住者外，来了人，加一条被子就可以了。同睡在一张统铺上，意味着不但白天生活在一起，临睡时也生活在一起，躺在铺上还常说话，关系是很密切的。我就把同睡在一张统铺上的朋友，称之为“统铺之交”。

在太原典膳所二号，我同马寅一起睡在一张统铺上。1937年8月初我奉命在太原设立民先全国临时总队部。我自任临时总队长，并找了民先山西省队长马寅兼组织部长。典膳所二号，原是山西省队部所在地，临时总队部也就设在那里。那时马寅很年轻，只有十八九岁，我那时也只有二十二岁。他是上海人，在正风中学参加抗日运动，并入了党。由于在当地太“红”了，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太原。典膳所的那两间平房是他找了一个化名为朱青的女同志，冒充夫妻租下的（房东不愿租给单身汉）。租定之后，那个“朱青”以在外地上学的名义，从未来过这里。住在一个院子的房东也就装聋作哑，没有再管。原先到民先山西省队部来的人倒不多，它主要是个通讯地址。山西省各地寄给省队部的信都寄到这里。可是全国临时总队部也在这里办公后，来的人就很多了。特别是后来我把平津流亡同学会也设在这典膳所二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不过那时抗战已经爆发，房东也就更不便来管了。

马寅这个小伙子是很能干的。我们相识前，他从上海来太原不过半年，工作已经初步开展了起来。临时总队部迁到太原后，我人生地不熟，许多都靠他联系，别看他年龄不到二十岁，办起事很踏实可靠。临时总队部我经过牺盟会，清华同学纪毓秀找了薄怀奇当宣传部长。薄的年龄同我差不多，而且是专职，相比之下兼职的马寅工作做得更多。不过有时我又觉得那时他还有些小孩子脾气。马寅在抗战爆发前后做了一个时期民先工作，太原沦陷后调去做地方工作，不知哪一年他也去了延安。由于他是回族，做了民族工作。这一转行，以后就一直做民族工作。他在国家民委工作，成为一个民族问题的专家。我和他一直有联系，当时就常怀念在太原时的日子。

民先全国总队部武汉办事处设立在武昌育婴堂街七号，那是夏农苔的家。夏把他住房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用。夏是法国留学生，在法国时入了党。让我们用的房子同典膳所二号一样也是一进院一排平房。不过典膳所只有很小的两间，而育婴堂有四间，且每间也大了不少。搭在房内的那张统铺比典膳所也大不少。那时在办事处经常工作的，除我以外有毛雍如、蔡锦楹和沈毅，三人都躺在这张统铺上，此外还有可以容三、四个人的铺位。在办事处工作过一个时期的武衡、刘导生和后来在国家统计局当副局长的常城等，都在这个大统铺上睡过。1938年武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过武汉的民先队员很多。没有地方住就睡这张统铺。只要是单身的男子，我们一律欢迎。来到这里都是主人，而且都参加一些工作。

而育婴堂街的那张统铺上也常堆上一些资料等等。白天常派其他用场。人们坐在矮凳上伏在它上面用它作写字的桌子。记得有一次为了准备在武汉游行示威，大家做了许许多多纸旗，都在统铺上写字，然后贴在竹枝上，做好后便堆在这张统铺上。

沈毅、毛雍如两位已经过世多年了。沈毅也是法国留学生，是民先里昂队部的队员。在抗战前民先在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和里昂都有队部。乔冠华、张铁生是柏林队部的，夏农苔是巴黎队部的，沈毅是里昂队部，抗战

爆发后他们都回国参加抗战。只有沈毅一人我希望他留在民先总队部办事处工作。他后来跟我一起去了广州。沈毅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是他教会我用法文唱国际歌。后来《国际歌》歌词的中译文，从瞿秋白译的“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改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认为这个改译有原则性错误，特地再向他请教。他给我详细讲了法文中这句话的原文是“不要说我们什么也不是”，意思是不要说我们很卑贱，瞿秋白的原译是正确的。而有人以“人的价值不能用钱来衡量”为理由，反对瞿秋白的译文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改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直接违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句，关于无产阶级的论断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以后我还和沈毅讨论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句话法文原文的构造，弄清楚原句的主词不是译文中的个人而是社会，前一句的主词是社会从每人那里取得的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而社会给予他们则按照他们的需要。在清华我虽学过一年法文，但忘掉了许多，在我向他请教后对我自己的主张就更有信心了。沈毅写给我的信至今还保存着。沈毅是在国外学文学艺术的留学生，回国后在武汉民先办事处时入党。他能很愉快、很积极地做很具体很琐碎的工作，并且是在偏僻的地区工作，我认为是很值得表彰的。

毛雍如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在1926年参加了共青团，后来中断了联系。抗战爆发后在延安陕公参加了民先队，由陕公民先介绍到武汉办事处来，我就把他留在办事处。他和另一个同他一起到武汉来的蔡锦楹在我们办事处机关里做接待来往民先队员的工作。毛和蔡两位工作勤勤恳恳，十分踏实，我把工作交给他们做是非常放心的。我们也就是在那一段躺在一张统铺时成为朋友的。我和毛、蔡之间一直保持着友谊。毛稍大于我。蔡比较年轻。蔡现在还健在，我们不时通信，去年七月我们还在北京见了面。

我读郭述申年谱

郭述申同志逝世快两年了。1994年7月14日上午，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还在关心他的家乡湖北孝感的教育事业，催促他努力促成的给这个县的教育基金早日寄出，午睡时就安详地与世长逝了。

他是湖北孝感人，在他的一生中为湖北人民革命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他最后的一件工作也是关于湖北人民的。湖北人民会永远地怀念他。他也是我在湖北工作时的领导。1937年9月22日他受党中央的派遣来到武汉。我也是同年同月很可能同日从太原来到武汉。在抗战以前有几年湖北不存在党的领导机关，郭一到武汉就在汉口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党的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他是书记，并把我也找去，要我担任委员，是他布置武汉临工委的每个委员分头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十年来前一次在他家里回忆当年武汉的工作，他记不起自己担任过武汉临工委那一段。当时我想他毕竟八十开外的人，老了，记忆力可能有些衰退。最近他的夫人许云同志（她也是我在武汉工作时的青年同志）送来《郭述申年谱及著述补遗》，翻到1937年9月那一段，里面仍然没有把他当过武汉临工委书记这件事写进去。我又有有点奇怪，因为那次我们共同回忆那个时期历史时，他已想起了武汉临工委这一段工作，记起他开过的那次会，记起听过我作为临工委委员在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后向他作的汇报。我把去建立武昌省师乡师后两个支部的党员名单（其中有赵辛初同志）交给了她，这件事他也记起来了，但是在年谱中仍旧未提。但转

念一想，在他从 1927 年到 1964 年的这三十七年中，他担任过的领导职务，不讲在军队中的，在人民团体中的，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许许多多职务，也不讲在党委工作中担任过的委员、部长和由于被降职而担任过的下级领导机关中的书记等，单说省、区一级的书记，他就做过不下十多个。我查了一下年谱，里面有京汉路南区特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豫东南特委书记、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鄂陕特委书记、湖北省工委书记、湖北省临时省委书记、辽北省委书记、吉江省委书记、嫩南区党委书记、旅大区党委副书记、旅大市委书记（后第一书记）等十三、四个，很可能还有遗漏的。他当地方党委书记的时间真长，也真多，而武汉临工委书记的时间很短，不到一个月，而且有可能没有经过上级批覆，所以不愿意写进去。

在他担任省工委书记期间，我担任省农委委员。省工委派我前去鄂西解决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长征后、未能撤离洪湖苏区的同志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党组织要求省工委承认其合法性的问题。至于省工委改为临省委时，我已离开湖北省到长江局工作去了。当我在报上读到《关于保卫武汉问题——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卫戍区政治部书》这个文件是由湖北省委董必武、郭树勋（郭述申的又一个名字）、郑位三的名义发表时，我以为已经有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正式的湖北省委，看了这个年谱之后，才知道这仅仅是使用了一下湖北省委的名义，这个省委并没有正式建立。

1937 年 1938 年我在湖北省党委机关工作的时间很短，临工委和省农委加在一起也只有三个来月，郭述申同志的历史又这么长，我没有资格去评论郭述申。但是我对他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在武汉和后来在北京接触中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印象。看了这个年谱之后，也感到正是他品质上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他在党的工作中几经逆境，屡受坎坷，几次受批判、撤职和险些被杀头等事情。当然这有党历史上的一般性质的原因以及可能有本人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为人忠厚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终于保持了节守，保持了人格，也终于享受九十高寿，这对他来说应该是庆幸的。

1996 年 1 月 18 日

徐特立和我的忘年交

当我还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共产党里有一位老革命家——徐特立同志。

1938 年 1 月，我在长江局青委工作。这时候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退到长沙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临时大学”。后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把临时大学迁到昆明组成一个“联合大学”。为了处理有关迁校中的问题，长江局决定派我前往长沙。

在工作任务完成后，我向湖南青委提出要见见徐老。于是我就在长沙八路军通讯处第一次见到了徐老。第一次见到徐老的时候，他已经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那一天见到他是上午八、九点钟。我去时看到一大群青年正围着一个大圆桌很热情地听徐老谈话。那时，当地的革命青年知道徐老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从延安回到长沙，就来找这位革命老人，聆听革命的真理。

徐老就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讲党奋斗的历史和革命烈士们的故事。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徐老几乎每天一清早就和青年们谈话，一直到晚上。见到徐老时，因有许多青年在场我没有更细地介绍自己，不过徐老似乎已经知道我的身份，示意让我坐下。我就对徐老说我今天没有什么事，我也愿意听徐老谈话。他虽然是给一般青年谈话，但也讲了一些我不知道的故事，我就在一边安静地听。

吃中饭的时间到了，我见到有的青年回家去吃中饭了，但也还有留下的青年，徐老就要通讯处的同志把自己吃的饭拿到桌子上来，一边吃一边同那几个留下的青年谈话。等我从食堂吃完饭回来，他还在谈话。那些青年也要回家吃饭时，原先回家吃饭的青年又回来了，他就似乎不知道疲倦地一直谈下去。直到通讯处的同志对他们的谈话提出“到此为止”，请那些不懂事的青年照顾徐老的身体时，人才散去。

在青年们走了以后，徐老亲切地问了我一些情况之后说：“每天到这儿来的这些青年都很好，其中不少人政治觉悟很高。有的来了多次，我已经和他们很熟了。我真想介绍其中一些人入党。可是，省委说我是公开的党的代表，不让我做这个事。在省委会上我提了好几次意见，可是多数人硬是不同意。你是上级机关派来的，能不能把我的意见向长江局反映一下？”

初次见面，一个很老的同志，就对我这样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苦恼，而且这个苦恼是党不让他发展青年入党。在他的身上，我感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真诚、朴实，和与青年人一样的单纯。

两年后，我在延安又见到了徐老。那时他正筹办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当他知道我在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之后，就与我畅谈科学和教育的问题。以后每次见面差不多谈的都是这个主题。不久，我发起组织了一个学习“自然辩证法”的座谈会，主要是联系自然科学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个会是我主持的，那时我在中央青委机关工作，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我们这个座谈会就在延安文化沟内中山图书馆举行。徐老每次都参加。文化沟在延安北门外二公里的地方，徐老在延安南门外的四、五公里处的杜甫川里，离文化沟近十公里，他总是骑着一匹马按时来开会。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读书、一起讨论，甚至一起争论。在讨论热烈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我们和他年龄上的差别。

1941年我调到西北局工作之后，我住的地方离自然科学学院很近，我经常去看徐老，他很愿意和我谈话。我们成为年龄相差近四十岁的忘年交。因此我敢把徐老视作朋友，不怕别人笑话。

1977年初，我清理自己的图书时，发现在一本书中夹着两张纸，那是1946年我在北平《解放报》工作时，从北平发给徐老的一封信，不知这封信怎么又回到我的手上，夹到我的书里来了。而在那两张信纸的背面，却是徐老密密麻麻写的一篇没有写完的中学课文，是关于度量衡知识方面的。这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它使我想起徐老多次对我说的：青年们不但要学革命的道理，而且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学文化。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要给青年们多做一点事，写点适合青年们的东西。徐老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从他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他总是那么勤勉地工作。这两张纸，有一次给徐乾（徐特立的儿媳）看了，她把它硬从我手上抢走了，她说徐老的手迹应该由她保存。

建国以后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少了，他兼中宣部副部长完全是名义上的，

从来不出席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1965年我在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偶然地遇见了他，那时他89岁，仍然很健壮，还能去泰山游览。我们有多多年不见了，一见面他就同我谈我国的教育事业。他对我国搞教育工作的领导有一肚子意见，看见了我说了两个来小时，似乎还没有说够。泰安车站到了，他不得不下火车。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这次谈话他还和我谈了他将来打算做的事情。他老是像青年人那样一直是想着未来。我一直以为他会活到一百岁以上。但是……

有一回，徐老过生日，我们大家向他祝寿，我也讲了一段祝词。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徐老不老，徐老是个老青年”。明年——1997年是他一百二十岁的诞辰，我想把我对徐老的这一个突出的印象，说给青年同志们。

从黎澍同志的著作中学习

失去了我的老朋友、好朋友黎澍，几个月来我不但在感情上不平静，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为了纪念他，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

黎澍长我三岁，他参加政治活动、文化活动都比我早，但总算得同一个时代的革命者，都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受教育者。后来我们都积极从事科学研究，他是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特别是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我的研究领域则主要在经济学、哲学方面，黎澍专门研究的领域正是我研究得比较少，或者说没有什么研究的领域。因此，我在遇到有关历史学的问题要向人请教时，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黎澍。对现实生活发生的某一件事情，当我想听听历史学家会有什么看法时，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黎澍。在长期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黎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者，他的工作不是按照社会上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某些人的意愿去编写历史，而是根据他所掌握的和不断加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方法，来具体地研究历史，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想写篇关于黎澍的文章，我也已经答应了《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徐仲勉同志。我认为我应该写篇关于黎澍的历史学观点和历史研究的成就方面的文章，我也已经把黎澍写的几本书收集在一起，免得写文章时临时找不到，可是迟迟未能动笔。这不仅因为在黎澍同志去世后的两个月的时间中我一直出差，没有能坐下来好好思考，更是因为我对历史学得太少，需要认真地读一点书。为此我向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来了黎澍同志写的《早岁》和《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附带讲一句，这样好的两本书的印数实在太少了，以致现在许多同志想要而得不到，从这里我们看到我国发行工作的改进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对黎澍这两本书，我们是否可以想些办法使得出版社能够再版一次）。这篇文章我是很想写的。我想抽出一点时间从黎澍同志的著作中学习。今天我能够做的，还只是表达自己的这个愿望和心意。

我和黎澍认识得很早，是在1938年1、2月。我在长沙《观察报》社所在地第一次见到黎澍同志，看到了他和杨庚同志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的忙碌景象。不过那次，对我来说只是和一个同志相识和留下一个青年时代深刻的印象，以后各奔东西。1948年我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建国后不久，黎澍也到了这个单位，于是我们就常常在中南海黎澍住所海阔天空的谈论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时才能说我们真的成了朋友。我和黎澍关系密切，来往更加频繁是在文革后期回到北京之后。把“四人帮”抓起来的第二天，我第一个想到

要找的人就是黎澍。就在当晚，尽管我从唐山看地震后的景象回来，天已经很晚了，我仍找到了黎澍，李新同志也来了，在建国门大马路上交流信息，作出这个消息可靠性的判断，并分析了可能发生的形势。然后很快地去告诉别人。以后我们之间就经常这样：每逢出差回来，我总是很快地和他打电话联系。在这种交流中，我和他说得总是非常投机。一个人总要有几个知心的好友，黎澍同志就是我这样的好友之一。他去世之后，我出差回来，有时还习惯地拿起电话想和他通话。可是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去者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活着的人就继续为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奋斗！

1989年2月21日

黎澍逝世四周年

——他对病和死的一些观点

“今天是一二·九”！偶然抬头看到挂历，不禁说了这么一句。

这时触发我情感的是好友黎澍的逝世。他是“从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行者，又在‘一二·九’运动纪念的日子离开我们”。他去世后，他的十二个朋友（其中也有我）共同写过一篇文章，但我还是想单独再写一篇。可是千言万语不知如何写起，所以至今还是待完成的一个计划。今天我又动了一个念头，把他逝世时的情况向没有看过1989年1月号的《新观察》的读者做一点介绍。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中取得教益。

黎澍是1988年11月29日下午5时左右正伏案写作时晕倒在地的。立即被送往医院后，前三天，他还像平时那样关心手边工作，第四天原有肾功能不好的病情突然恶化，随之发生肾衰竭、肺部感染，昏迷不醒。医生们对他进行了两次生死之间的抢救，未能奏效，已无回天之力。

这时，黎澍同志的夫人徐滨，记起黎澍多次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知觉，只有一口气是没有意义的，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抢救。”徐滨认为，“黎澍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作为他的忠诚的伴侣，不能不尊重他的意愿。”于是在医院明确肯定地答复她，现代医学只可能使黎澍维持像植物人那样的生命、绝无可能恢复知觉之后，她郑重地向医院提出终止抢救的要求。

停止抢救的时间徐滨定在12月9日。黎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仅在政治上和科学研究（他特别注意的历史学领域）上是这样，在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上也是这样。他的夫人忠诚地成就了他的意愿。这个动人的事迹难道不应该广为传播吗？

黎澍在世时还讲过：“进八宝山，死了还要排座次，何必呢？再说那里的人并不都喜欢我，我也并不都喜欢他们，又何必挤到一起去呢？”他去世后，徐滨也就没有把他的骨灰送进八宝山。黎澍的精神遗产为他树立了不朽的碑铭。“学习楷模”这样的话，要由人们发自内心地去讲，才是真实的。我和我所知道的黎澍的朋友们，都把他视作我们的楷模。

1992年12月9日我动了写这样一个东西的念头，不久以前才从友人处找到那一期《新观察》，相隔了一个月，但还是写了下来。对这样的事迹的

介绍是没有时间性的。

轮椅上奋笔战斗的记录

我和顾文华是 1938 年春在武汉相识的。从那时到他去世正好五十年。

文华的年龄略小于我。1938 年，我二十三岁，他二十一岁。1937 年秋，他的家乡苏州沦陷后，他经南京、武汉来到山西临汾。在临汾加入了民先队。1935 年党中央决定结束共青团的工作，团员全部承认是党员。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二·九”运动中成立了一个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青年群众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文华在山西临汾加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团体。1938 年初他从临汾又到武汉，到民先总队部武汉办事处报到，我留他在办事处工作。不久，他找到了一个“战事书报供应社”的岗位。书报供应社社址在汉口，但他仍经常到武昌这个办事处来，与民先保持密切的联系。1938 年长江局决定在全国发展民先队、在武汉也要建立民先地方队部时，毛雍如和顾文华当选为地方队部的负责人。不过那时我已离开武汉去广州了。

从 1938 年我南下广州，到在北京与他重逢，中间有十五年之久不通音讯。1953 年他从中南调来中央广播电台，与我时有接触，越到后来关系越密切。由于文华的夫人陈陶曾在与我有很深的历史关系的《学习》杂志社工作，我与他之间的来往又多了一个因素。

1953 年他来北京工作的时候，还没有电视台。广播就是最现代的传播工具，后来才有了黑白电视。他当了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工作的领域一直没有变。他在局里管的事很多，对内广播这一摊一直由他在抓。因此在文革中他就成了造反派的“宠物”，因为没有他，广播局的批斗会就没有了最主要的对象。据说就是这个原因没有让他下干校。

我 1972 年 10 月从干校回到北京，他由于周总理的关心被结合了。有一次在王府井我遇见了陈陶之后，我们就联系上了。文革后我和他的关系比文革前更为密切。1976 年他在工作中从“四人帮”的走卒那里听到“四人帮”整我的消息，陈陶特地来我家，要我有所准备。那时我也看出了这一点，不过朋友的关心，我还是很感激的。文华由于长期地受批挨斗，加上工作的繁忙，身体就垮下来了。在几次脑血栓之后，到 1979 年他就全身瘫痪了，这一病就有八年之久。

广播工作既有文化思想方面的内容，又有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内容，工作是很繁重的。文华的身体一直是很壮实的，数次垂危，抢救脱险之后，身体十分虚弱。先是全身瘫痪，后来才恢复到偏瘫，动作不便，语言受阻。在这种情况下，他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竟然写出十来万字的文章，这是一件很令我感动的事。因此我认为收入他的文集里的不但有宝贵的史料，有他的独到见解，也有一个不知屈服为何物的充满着社会使命感的革命志士的顽强精神。

他逝世后，陈陶把顾文华写的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交给顾文华所在单位。单位也有人热心，准备出一本文集。不过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本集子至今还没有出。我想为了纪念，最好还是印若干本，不仅对家属，对朋友们也是一个珍贵的纪念物。

人们叫他阿丕

我认识陈丕显是 1938 年 5 月在南昌。那时他不到二十二岁，我不到二十三岁。两个人都做党的青年工作。当时东南分局设在南昌，管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它同设在武汉的长江局一样都是党中央的派出机构，但由长江局代管。分局向长江局提出要求，说分局管青年工作的同志才从农村到城市，对城市青年工作不熟悉，希望长江局派个长期做城市工作的同志去帮助他们一个时期。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

到南昌后我就住到新四军军部。我首先要找的就是陈丕显。那时人们都叫他阿丕，我也这样叫他。没有几天，我就发现我去那里是多余的，因为已经有好几位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党员回到南昌。邹韬奋的弟弟邹文宣，已经担任南昌市青年部部长，还有张馥、程一惠、吴志元等。陈丕显的红军、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不便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不便公开与当地的青年们一起活动，但他通过党内渠道，对南昌市青年工作状况很熟悉。在南昌实在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做，于是，我和他有很多时间谈话。

我们俩的经历完全不同。他给我讲了许多许多故事，我听了觉得很新鲜很有趣。我也给他讲了许多故事，他也听得津津有味。从他那里我知道，许多长征前的苏区和长征后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他讲得非常生动具体，绘声绘色，使我了解到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的状况真不下于万里长征，使我受到教育。

有一天我问他在苏区担任过的职务。他告诉我，他曾经是“中共中央儿童局书记”。听了后，我不由得笑了。儿童工作中央还设有局，局内还有书记。他见到我笑，很严肃地对我说，儿童工作难道党中央不要管吗？他说中央不但设有儿童局，还设有青年局。在他当儿童局书记时，胡耀邦是青年局书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胡耀邦的名字。他还把胡耀邦描绘了一通，我对胡耀邦也就有一些印象。

我觉得那次他去南昌没有多大收获，也许最大的收获就是交了陈丕显这个朋友。

1938 年 6 月回武汉后，各奔东西，没有来往。只有几次听人说，他担任的工作越来越重要，还听到一些老同志说，阿丕进步得很快。后来他成了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和迫害。在文革前，我去上海时也去看过他几次，他都很忙，我也来去匆匆，没有机会叙旧。

再一次同他有比较多的时间接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时候。记不清楚是 79 年还是 80 年，有一次我去武汉，刚住进宾馆他就来找我。不是礼仪性的，一坐就半天，东谈西谈，使我想起四十年前在南昌的日子。他希望我常常来湖北，给湖北“多做一些贡献”。我说我很愿意多接触实际，特别是我在湖北工作过，只是夏天不想钻进这个火炉。我讲了 1956 年我在武汉时，有一次他们要我做报告，听的人站在游泳池里，而让我坐在游泳池边搭的一个台上，真热得我够呛的故事。我还讲了那年我住在东湖宾馆床上的席子烫得不能入眠，半夜要了个船在东湖里游荡，用一把蒲扇沾了水扇，把全身弄湿，还是热得不得了。他说现在条件不同了，夏天也可以来，不会让你受这种罪。

1981 年夏秋之交，他打电话找我，说今年水大，他想去工作过的荆沙地

区走一趟，考察一下荆江。他告诉我长江办事处的林一山将同他一起去，他希望我也同他一起看看，他一路上还可以同我谈谈。那时我正热心国土经济学研究，并且提倡“国土经济文学”，就约了作家张锲和孟伟哉一同去湖北。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我们从武汉坐了一条轮船西上，过了城陵矶就进入长江的荆江段。然后去洪湖（这个县碑过去是没有的）、公安、石首、监利等县。先是坐着船考察水情，然后听各县的书记、县长汇报情况，讨论水利等问题。在公安我们还看了洪湖地区党史纪念馆。1937年我在湖北省农委工作时曾经处理过洪湖“自发党”的问题（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后，洪湖地区未能撤退的党员自动组织起来的一个组织），对这些县的情况有所了解。四十年过去了，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最后一站到了沙市。

在陈丕显考察我们只是跟着他走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林一山同志的许多见解，实地看到了这个地区的情况。在沙市招待所三楼房间里我还看到与窗户在一个水平线上的长江轮船行驶的情况，使我对荆江水患的严重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我后来发表的关于建立“灾害经济学”的思想就是在这次随同陈丕显考察荆江的过程中萌发的。

陈丕显有一个预防和减轻荆江地区水灾的主意我很赞成，那就是现在这个地区的垸子越来越大，水来了人跑不到堤上就有可能淹死了。当时有一个想法，在垸子中央堆一个大土堆。陈的意见是，这样做不如盖一座三、四层的楼房，平时在那儿建一所小学，水来了人可以上去避难。荆江水一般来得快也退得快，一个垸子有这样一座楼许多人就得救。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可惜他来不及实现这个想法就离开湖北到中央去工作了。

一个省委第一把手，在省委所在城市时是忙得不得了，出差时，特别坐在船上，就空闲了不少，因此一路上东谈西谈谈得很多。在南昌分别后，两人的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的机会的确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不但叙了旧，还讨论了当时彼此感兴趣的问题。

陈丕显到北京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住在中南海。那时中顾委的机关也在中南海，我也时常到他家聊聊。有些我不了解的历史会去问他，他知道的就同我讲，使我弄明白不少事情。譬如我问他关于当初苏区 AB 团的事情。他就告诉我，那时有一种对知识分子很不放心的错误观点。他的哥哥是个小学教员，就被打成 AB 团镇压了。可是他仍被重用，并不因为哥哥被镇压而受到任何牵连。还讲了一些别的鲜为人知的镇压 AB 团的事情。在那几年，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自由交谈的关系。

有一些工作他还找我商量，比如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时，他约我到他家，告诉我这个组的任务，并且，要我兼一个副理事长的职务。我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事不止这一件。

后来他也从现职退下来，进了中顾委，当上了常委。在中顾委的小会和大会上我常见到他。见面的频率不低。中顾委撤销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往，有一天忽然接到电话，是通知他不幸逝世。他在北京医院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我却一点没有得到他住院的消息。1995年8月23日凌晨4时35分，我年青时的朋友又少了一个。

钱俊瑞和姜君辰：
好几个单位的同事

三十年代我读过的文章和书籍中，有中国农村研究会经济学家们写的那些书籍和文章，它们曾对我的思想进步起过颇为重要的影响。它们的作者是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孙冶方、秦柳方等。后来才知道，张稼夫也曾同陈翰笙一起工作。他们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但是他们做的工作不是《资本论》的翻译和注释，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通俗解释。陈翰笙等做的工作是对中国农村——主要是他们熟悉的江南农村进行调查、描写和分析。（注：有一本《中国农村描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作者似乎姓杜，名字没有记住。这些年我注意到在当前的经济出版物中“描写”这样的书很需要却又缺少。因而人们，包括经济学研究者，讲一个东西，缺乏具体的形象的概念。例如“骡马大会”对于计划经济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具体事物，但许多人不清楚。如果有一本“骡马大会”描写那就好了。这件事我多次提出建议，但始终未见有这样的书出版）农村研究会经济学家们还开展过一个中国农村经济性质论战，这也是一场很重要的科学论战。当初没有想到，这些经济学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其中的钱俊瑞和姜君辰还成了我好几个单位的同事。

我和钱俊瑞认识得最早，1938年初钱从上海来到武汉。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他在《全民抗战》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涉及到党的青年工作，而我那时负责长江局青委的工作。我约他见面谈话。以后为工作上的事我们多次联系，彼此就熟起来了。

这里说的“工作上的事”，当时主要是关于推动国民党元首叶楚沧的儿子叶南出面在武汉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叶南在北伐期间曾加入过 Cy，“四·一二”后脱离了组织，但对党对革命还有感情。叶的妻子、妻妹、妻弟都倾向革命。他对我说，这个组织一方面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又有叶楚沧等国民党元老背景，活动经费估计也不成问题，它可以成为一个党领导下的青年统一战线组织。钱希望党能够同意他去做这件事情。并且建议民先全国总队部和全国学联能够参加到这个协会中去。因为这是件大事，就去请示长江局领导，长江局指示可以按照钱的意见去办。于是我与钱商量，成立一个以叶为主席、叶妻袁晓园为秘书长、钱为宣传部长、赵梅生为组织部长和不在青协中担任具体职务的全国学联的祁式潜和代表民先总队部的我为委员的一个委员会，作为青协的领导机构。在这个青协中我和钱俊瑞成为“同事”。但我并不去办公，民先另派刘导生去做青协组织部副部长。

八年后的1946年，党中央决定在北平办《解放日报》和建立新华社北平分社。从各地调人建立机构。党中央把原在山东《大众日报》负责此时正在山东分局的钱俊瑞调来北平，担任报社总编辑兼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这个机构由一个五人组成的编委会领导。五个编委中有一个是我。这是我与钱俊瑞正式成为同事。北平《解放》报只存在了一百天，就被反动派勒令解散了。在这一百天中，报社和新华分社做了大量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经历了新闻史上有名的“四·三”事件，即1946年4月3日凌晨有二、三百名军警到报社逮捕报社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同志们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抗。钱俊瑞等几十个人被捕，被拘留到北平市警察局。钱在斗争过程中表现出勇敢机智和善于与国民党斗争的品质。在狱中他写了《我们被捕了》的抗议书。报社同仁对钱的领导非常满意。这件事在1996年2月纪念《解放》报创刊五十周年时，张沛、孙政和我三人合写了一篇《百天战斗的历程——北平〈解放

>报社从创刊到查封》，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在报刊上发表了。

接着我和钱俊瑞又在延安《解放日报》成为同事。1946年8月党中央把他和我都调到延安《解放日报》，他是报社的副总编辑兼言论部主编，我任言论部副主编。这是我和他第二次正式成为同事。在那段时间内，言论部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我做，他只担任了一个名义。到1947年3月我就参加了一个中央组织的土改工作团从延安离开报社，出发去晋绥等地区。

在1947年土地会议之后，钱俊瑞来到河北建屏县（它是从平山县分出去的一个县）担任书记。我则在这个县的贾峪村搞土改。钱任平山县委书记后曾来贾峪蹲点。我在这个村里和他一起呆了一段时间，并在同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这是我和他第三次同事。这次我对他的回忆深刻的是一起参加整风。整风中两人各自详细介绍本人的经历。在他的介绍中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讲皖南事变后的一段经历。他讲了在没有脱离险境的情况下，他在一条小溪旁边刮胡子的情形，显示出他在险境中从容不迫的心理状态。

建国后，他在教育部、文化部工作中的情况，我在中宣部都听到一些。文革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后，他担任了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成为同事。他在世界经济研究所时还是那么活跃、那么健谈，并写了一本有关“世界经济”的书。我与他接触得比较多的是在1963年香港新华社特别邀请他、许涤新、宦乡和我四个人去研究香港问题。我是在西班牙参加了世界经济学家大会后，从伦敦回到香港与他们三位汇合的。那次在香港，给我留下的很深的印象中也包括他的发言。没有想到回国后不过两、三年，他就逝世了。后来许、宦两人也相继去世了。

我和姜君辰成为同事是在1944年底，那时他才从国民党统治区到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大学任财经系主任。我在审干结束后在财经系做他的助手——财经系秘书。给我的印象是，他的确是个长者，工作很认真，只是才到解放区，对解放区的情况不熟悉，很谦虚、平易近人。有几十个学生，不分班，班上有几个教员，教会计的马刀克就是一个。此外财经系还有一个研究室，内设三个研究组，任务是编教材。在研究会里的人除各组一两个青年人外，同我一样都是审干后留下的，连我在内都带有暂时安插性质。姜的精力放在几十个学生上，不大管研究室，三个研究组都得我帮助他联系。我们相处得很好。

第二次我和他同事是在北平《解放》报。他是钱俊瑞的助手，在报社任副总编辑，是五个编委之一。“四·三”事件中，他是被捕去的人之一。那天由于他坚决反抗，头朝下地被特务从楼梯上拖下来。他到北平的时间比我迟，比钱早。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编辑部的房子就是他扮作一个富翁买下的。买房签字仪式就在那所房子里举行。那天他穿了一身西装，我也在场，签字场面我记得清清楚楚。

第三次同事是到了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后期，他从合作总社调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副主任。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主管世界经济研究所。那时狄超白已离职，孙冶方还没有到职。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完成后，国务院建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他被调到专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机构任专职副秘书长，我也在这个委员会内。这是我同他第三次同事。

在文革中他还在学部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就变成这个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我也。这是我和他第四次在一个单位同事。

记吴华

我和吴华都是“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彼此知道，却没有见过面。我和吴华发生通讯关系比较早。1937年9月我初到武汉以全国总队部名义与广州联系时，吴华就已经回到广州。他告诉我，不一定在广东成立民先地方队部，但一定要同民先总队部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系。以后果然不断收到广州寄来的刊物《游击队》等。他到广州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同广东省国民党书记长谌小岑取得了联系。谌在抗战时曾经参加过我们党，与党脱离关系后没有做什么坏事（建国后他是国务院参事）。吴华又找到了一位邓明达，他比较年轻，是国民党员，思想进步，请示省委后把他吸收入党，成了跨党分子。经过省委批准，不用民先名义（很多人知道民先是党领导的），不去建立民先地方总队部而在取得谌小岑支持的情况下，成立了以邓明达为队长的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对他的这种作法，我是赞同的。不论作为民先总队部负责人，或者作为长江局青委的成员，我都赞同他的作法。他是一个懂得做统一战线工作、也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

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4月。那时在武汉，不仅有民先总队部办事处，全国学联的机构也设立在那里。党决定在武汉召开全国学联代表大会。这个会议在党内是由设在武汉的长江局领导的，具体由长江局青委管。这个会议到了南方许多学联的代表，吴华作为广东省的代表来到武汉。考虑到吴华所代表的学生组织实力比较强和吴华本人的条件，大会的报告决定由吴去做。他的发言稿是由在全国学联工作的蒋南翔等集体起草的。当时长江局委员中负责领导青委工作的何凯丰还亲自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吴华报告一开始就引用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是何凯丰加上去的。吴华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是很成功的。

我和吴华在工作上的关系比较密切是在1938年8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1938年7月间，长江局书记王明提出，国民党成立了三青团之后，我们党应该有一个旗鼓相当的青年团体来和三青团抗衡，以便建立青年抗日统一战线。于是长江局根据王明的建议作出了要在全国普遍建立民先队的决定。要我去广州向广东省委传达长江局的这个决定。我到广州后的活动就是吴华帮助我安排的。我就住在东皋大道吴华父亲拥有的房子里。这时候吴华是广东省青委书记。

今天回过头看，长江局当时的决定是不正确的，看来还是用青抗先这个形式好。可是广东省委，广东省青委在听了长江局的决定之后，还是表示照长江局的决定去办。就在那个时候广东省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我是1938年8月到广州，9月间，因为党中央要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省委书记张文彬就从广东出发去延安。党中央也准备在六中全会之后召开全国党的青年运动工作会议，于是吴华也就随同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去了延安。因此，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大鹏湾登陆时，吴华不在广东。省委留在广州的人和我这个从武汉来广州的人都不再进行把抗先队改为民先队的事，而是很好地利用抗先队的形式去做战时动员工作。

那时去一趟延安很不容易，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张文彬同志才从延安回到广东，那已经是1939年初了。这时广州早就成了沦陷区，省委机关设在韶关。我同他又一起在省青委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1939年5月我就离

开韶关回延安了。

我同吴华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印象很深。他后来长期做华侨工作，是侨委的负责人之一。侨委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吴济生——他后来改用的名字。他的家人——妻子和子女都出身在香港。他在北京侨委工作时，家中的成员有的就在香港。他们在广州、西安等地还投资参与我国的建设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和他，还有他的妻子等在北京多次见面。见面时也常说起香港回归的事情，他家有香港侨民的身份，与香港的关系很密切，他本人既有较好的政治水平，又有较好的办事能力，做侨务工作的确是很合适的。可惜他未能活到1997年。

1938、1939年在广东 新结识的朋友

在1938年10月到1939年2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在广东新结识的朋友真不少，彼此的感情相当地深。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战争的烽火烧到了广东，过的不是寻常的生活。日寇在惠州大鹏湾登陆后，国民党不战而退，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几百个青抗先队员该怎么办？这是省委考虑的一个问题。这时候省委书记张文彬带了青委书记吴华去延安了，省委研究结果，就要我这个武汉来的客卿作为省委工作人员来抓这件事。于是我就认识了一个在广东省党内做过青年工作的老马（老马不姓马，似乎姓梁），省委要他帮助我。他同我一起工作。这位老马是个麻疯病患者，病都上了脸，应该说已经到了后期，活不了多久了。他自己当然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他的情绪完全正常，工作很积极。这么一位好同志竟然患上了这种不治之症，真是不幸。我一天中有不少时间同他在一起，晚上两人挤在一张不大的床上。也真奇怪，我当时一点厌恶和害怕被传染的想法都没有。除商量工作外，他给我讲了广东省党的工作的许多历史情况和他丰富的经历。他工作很认真，只是他这个麻疯病患者不便出面活动，外面的活动只能我一个人去，他只能躲在房间里出出主意。没多久，党组织还是决定他回家乡南雄，后来听说不很久他就去世了。他离开广州后我搬出了他的家。我少了一个能帮助出好主意的人。

战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已经可以判断，广州很快就会沦陷。国民党当局只是在空喊。抗先还是没有取得在战地进行动员工作的合法名义，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着落，而我们又不能让这些革命青年散了，如果那样，我们的损失太大了。事情的确不好办。于是只好一面由队长邓明达抓紧同谌小岑交涉，我们在危城广州等交涉结果，一方面要做好迅速从广州撤退到安全地方的准备。保证队员们的生命安全是最为重要的。老马不在，省委其他同志工作也很紧张，我只有同青抗先总队部的几个同志一起筹划。不要看他们年轻，也都很有办法。形势到了必须组成行军队伍随时准备出发时，为了提高抗先总队部同志们的信心，我冒充懂得军事，帮助青抗先组织队伍，进行操练。把队伍先转移、撤退到比较有利的地方，做好一声命令就能出发的准备。可是直到广州沦陷当天凌晨，广州的国民党官员们不但没有答复我们的要求，甚至连要走的信息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在没有安排好下一步怎么做的情况下，我们半夜立即离开广州，连夜撤退。幸亏我们敏锐地觉察了这

一点，这个决心就是我和抗先总队部的同志们一起下的。我们坚决实行“逃跑主义”。全队（包括个别的少年和有残疾的人）接连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一直地走，总算走在日寇的前面，过了北江，脱离了险境。

抗先的总队长邓明达跟着谌小岑，没有在队伍里，带队的是陈恩，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总队部的人还有黄泽成、梁威林、陈能兴、唐健、温盛湘、李鹤年、朱醒良（朱荣）、陈嘉等人，都是二十多一点。我自己1938年也只有二十三岁多。我们这些人肩上的责任不小，大家出力，二百多人一个没有少地安全转移，总算为广东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走了一路，使我对总队部的同志有所观察、有所了解。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责任心强，而且也有办法。比如走到佛山已是傍晚，这时候邓明达和谌小岑还有锺天心也在佛山。陈恩、黄泽成几个人很快找到了邓明达，决定抗先队全队在佛山的中山公园接受谌小岑、锺天心的“检阅”。这个主意就是陈恩、黄泽成等人提出的。那天晚上，抗先全队人马已经走了一整天，非常疲乏，而且那时还没有吃晚饭，可是大家振作起精神到了公园，高唱革命歌曲《保卫华南》、《武装保卫大广东》等，雄纠纠气昂昂，使得国民党官员大为振奋，立即办好了接受抗先队员为第四战区战地工作队的手续，在广州未能解决的问题就在这时候得到了解决。这件事情他们就做得很好。

还记得一件事，队伍到了三水的马房，面对着大江无法过去，大家很焦急，有三位抗先队员（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由李鹤年带着）看到江心有一艘轮船，就弄到了一只小船，上了那只轮船。因为他们手中有几支木壳枪，威胁那只船把我们渡过了江，解决了那时最要紧的问题。

总之，在那次逃跑脱险的行动中，我和总队部的人增进了了解，成了朋友。我不知道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一个怎样的印象。1981年有一次我在机场等飞机起飞，当时已经有四十多年未见过面的，抗先总队部的温盛湘，竟然从我坐在椅子上奋笔疾书的样子中（他们知道我有利用每一分钟的空闲时间工作和学习的习惯）认出了我。从这一件趣事来看，他们对我的友谊还不浅呢！

从广州过了北江，在四会会议上，省委分配我到北江翁源工作。我们一行坐了一条船逆江北上。船上的人有冯锐、冯初弟兄，容民铎、容民生弟兄，刘邦彦（大刘）、小刘兄妹，赵炳权、刘渥丹一对恋人，省委梁加的爱人牛女、邓大姐和纺织女工小陈，连同我十二、三人。我们不分男女，光着脚，轮流踩着清晰可见的卵石，唱着船夫曲，拉着纤，一步一步在北江上走了四天。这个景象的确美。在大坑口上岸，经过翁城到了龙仙圩，在陈屋这个小村过了相当长一段特别愉快的生活。抗战爆发后，我东走西走，还很少在一个地方静下来。现在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住了下来。在那里有许多可以怀念的事情。

从三十年代我从广东去延安后，到八十年代，四十多年中我同广东的同志们一直没有联系上。自从那次在机场温盛湘把我认出后，我和许多同志取得了联系，以后我每次去广东都想见见他们。不过其中有一些人去世了，有一些病得行动不便，有的人甚至与在广州的朋友也失去了联系。但我同能够联系上的朋友们在广州多次聚会，回忆着过去。我的秘书知道我想和老朋友会面，几乎每次陪我到广州时，都问我这次找不找你的那些老朋友。可是许多次我去广州停留的时间实在太短，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张，没能去找他们。去年我去肇庆，从肇庆坐汽车回广州时，特地到四会转了一下，找到四会县

委党史办，要他们带我到曾开过三天会的凤凰村。凤凰村会议在广东党史上应该是有一定地位的。四会党史办的同志知道。但是沧海桑田，去那儿一看，当初的凤凰村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在那儿见到的是一家合资工厂。但是我还是想找时间到四会去，同当时的老朋友聚会。不过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做到就很难说了。

哲学家、翻译家何思敬

1936年我在广州时，就听说中山大学有一位何思敬教授，但是等到我慕名走访时，他已不在广州了。我只见到尚仲衣教授。1939年到延安后听说他在当地，并了解到他家离我的工作地方——中央青委机关和延安中山图书馆很近。我就找到了他的家。自我介绍了一下，希望经常受教。何思敬和他的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我是才二十四岁的青年哲学爱好者。很快地他就和我熟悉起来。开始讨论彼此关心的哲学问题。几次见面之后，他就告诉我，延安有个新哲学会，他可以介绍我参加。我当然喜出望外。这是1940年2、3月的事。

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到他家，他告诉我这个新哲学会就要开年会了，你已经是这个会的会员，可以参加。开会的时间是6月21日下午，开会的地点就在文化沟内新建的“文化俱乐部”。到了那一天，我早早地就到了。那一天到的人真不少。文化俱乐部的一个特大的窑洞里人坐得满满的。除何思敬和艾思奇两个负责人外，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张仲实、陈伯达、周扬、杨松、尚向荣、郭化若、冯文彬、和培元、范文澜等，总共有五十多人。

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他说新哲学会成立了两年，工作有了不小的开展。他说我们的会员毛泽东不久前写了一篇《新民主主义论》，是在革命战争中产生的伟大哲学著作。……他把毛泽东写的这部著作作为新哲学会的工作，听的人都觉得有些滑稽，禁不住笑了起来。在场的毛泽东也忍不住大笑。我在场看到了这个景象。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张闻天和朱德都讲了很简短的话。接着就进行了自由讨论，许多人都发了言，我也在这个会上讲了意见。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七点半。这个会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很感谢何思敬把我介绍到这个哲学会。

40年、41年我经常去他家，每次去都谈哲学，思敬同志也每次发表不少见解。他给我讲的见解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告诉我哲学名词到黑格尔手上时可以说很完备了，马克思没有另外用什么新的名词。黑格尔虽然是个唯心主义者，但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因此他的许多词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用，只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这个名词就可以了。只是许多名词的中译很成问题，因为这些中译是直接来自日文的翻译中搬过来的，而当时日本哲学界受康德主义影响很大，翻译这些哲学名词的人都是康德主义者，因此把黑格尔的名词翻译错了，使这些哲学名词带有明显的康德主义的色彩。何思敬说，“对象”这个词就是翻译错了的。黑格尔用的这个词的德文是Gegenstand，直译是“对着我们站着的东西”，而不是对着我的“象”。准确的译名应该是“对站”。他说，“概念”这个词也是译错了的。黑格尔用的是Begriff，它的意义是“被我们抓住的东西”，不是什么“概念”。至今我认为他的见解很有道理，但无法改变过来。我认为何思敬的意见实行

起来很困难，因为俗成的语言改变起来很困难，但是应该多作宣传，避免望文生义产生错误的理解。

何思敬还对我讲 Sein(德文的“是”)不应译成“存在”，最好译成“然”，音义都近，Dasein 译成“本质”也不如译成“所以然”。这就没有要正确翻译 Gegenstand 和 Begriff 重要了。

40、41 年在延安有一个用读书会的方法读书的风气。陈云在组织部有一个读艾思奇、吴亮平《唯物史论》的读书组，张闻天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读米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读书组。这两个读书会我都参加了，何思敬都没有参加。张如心在八路军军政学院组织了一个《资本论》读书组。何思敬是这个组的主角，他的组织关系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就在八路军军政学院。这个读书组我也经常参加。我在自然科学研究会也组织了一个《反杜林论》读书会，何思敬倒来过许多次。在这个读书会我经常可以听到他的高见。在那个时期我正学克罗茨维奇的《战争论》，也经常向他请教。

毛泽东曾赞扬何思敬是一个很好的法学家。可是在法学方面我没有请教过他任何问题。我看重他对黑格爾的知识和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见解。当然我也看重他对翻译工作的认真。近十年来我发表言论，表示不赞成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我认为共产主义不止两个阶段。我从马克思用德文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看到马克思并没有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样的概念，他用的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一个更高的阶段”。我认为应该根据原文改译过来。我在作这种推敲时，查到何思敬和徐冰在延安时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译本，见到他们完全按照马克思写的德文翻译，翻译得完全正确。而现在人们使用的《马克思全集》和选集的中文本是根据《哥达纲领批判》的译本译成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一俄译本的根据是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译文。我还是认为应该按照何思敬的译本，忠实于马克思的原文为好。

初识周扬

到延安后认识的、后来成为我的朋友的人中，周扬是一个。我认识他也经过“闻名”、“见面”、“相识”、“同事”、“朋友”这样一些阶段。

在三十年代，我听说过周起应这个名字，算是闻名。我是无名小卒，这种闻名是单向的，只是我闻他的名，而他未闻我的名。1940 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开成立大会那天，我同他都在主席台上。我请人指出台上都是些什么人，指到周扬时我注意看了一下。这是 1940 年 2 月间的事。这种见面也是单向的，只是我见了他的面，而我是什么模样他是完全不知道的。6 月，延安开新哲学年会，我又在与会者中间把他辨认了出来。这还是上述意义下的“见面”。不过在这个会上我也作了个发言，可能我是会上唯一的陌生面孔，因此周扬也许会注意到我，那么也见到我这个面了。

散会后，在文化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里，我有幸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而且紧靠在他的身边。毛泽东在餐桌上问了我的姓名、专业，讲了一通哲学家要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的道理。这时周扬可能也在这张饭桌上（也有可能是在另一张桌子上），但我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当然那时还没有交换名片这样的事，只能说互相认识，不能说“结识”。

我和周扬从“相识”到“同事”相隔了四年。那是在 1944 年，党中央决

定重建延安大学、任命周扬为校长的时候。重建后的延安大学向正规大学迈进了一步。它下辖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三个学院。行政学院的前身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管的、专门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地方行政干部的学校。这个学校本来不出名，1942年后，在抢救运动中一度成为专门从事“抢救”后的甄别工作的地方。我也从西北局来到这个学校接受甄别。那时集中在那儿的人很多很多，并不上课，也不搞运动，只是住在那里等“结论”。重建延大时它又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校。它的地位比整风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院内设有财经、教育、行政三个系。鲁艺很出名，那时沙可夫任院长。自然科学学院改由李强担任院长。这两个学院内也都设有若干个系，学习时间也比较长。三个学院加在一起是当时延安干部学校中最大的。延安大学校长的职务，应该说是很重要的。那时我在行政学院刚结束甄别，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而是跟着行政学院归属延安大学，留在延安大学，成了周扬的部下。

但是如果不发生毛泽东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大课的事，我和周扬还不会熟悉起来。有一天，周扬把副校长张如心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毛主席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大课。这门大课应该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毛主席还说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让于光远讲。周扬说，这门大课就由张如心、我和他自己三个人开。我先讲自然发展史，接着张讲社会发展史，最后由他自己讲第三个部分。每周上一次课，每部分讲四到六次，就在延安南门外的行政学院礼堂讲。（延安大学校部与行政学院在一起）。校部和行政学院全体工作人员和各系师生都听。鲁艺在延安东边十来公里的桥儿沟，而自然科学学院，那时也已经从南门搬到北门外大便沟内。这两个学院都离上课的地方很远，只好派“代表”听课。

很快就开始上课。三个人各自准备，各讲各的。周扬提出，在一个人讲课时，其余两个人最好听听，便于向毛主席汇报。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周扬和张如心果然去了。我讲了五次，他们是否每次都去，记不得了。而张、周讲课时，我是一次也没有漏掉，都去听了。我很想了解张如心和周扬的理论水平，同时那时我还是延安大学教务科的副科长，更该了解有关这个“大课”的教学状况。

经过这三个来月的大课，我对周扬就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他操湖南乡音，但口才很好，讲的是自己的心得体会，既生动也深刻。通过听周扬的几次讲话，我很佩服他的学识和水平，看出他是个思想很开阔的人。

同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接触：日本投降后，延安大学全校师生要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于是全校组成了一个行军大队。行政学院、鲁艺、自然科学学院各建成一个中队，周扬是大队长。我是大队秘书兼直属中队的队长。所谓直属中队，它的主要人员就是周扬一家、张如心一家、何干之一家。此外还有自然科学学院最低年级的十几个女孩子。自然科学学院那个中队想走得快些，不便照顾这些低年级的女孩子，就向大队部提出是否可以让她们跟我们这个直属中队走。其实那些女孩子都能走，让我耽心的倒是在行军中要照顾周扬的只有十来岁的两个孩子。我想这也许是比较麻烦的事。一路上周扬没有提出任何使我为难的要求，说明我是过虑了。这段行军，时间很长，有二十多天。行军中没有什么事，我和他闲谈的时间不算少，使我增进了一些关于抗战前上海文化界的历史知识，也使我增进了不少对他本人的了解。走了这一

路，我观察到周扬是一个学者和文人，是一个不太想做、可能也不太会做行政工作的知识分子。行军中的工作很琐碎，都由我去操办。

这是第一次和他同事。到张家口后，我去北平参加“北平《解放》报”的筹办工作，很快就与周扬分手了。没有想到两个月后和他又在北平相会。那时候美国的费正清邀请他、老舍和曹禺去美国访问。他就到北平来办理出国护照。他听说我们办这张报纸的人已经买了一个院子，就不想住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的招待所，要住到我们这个院子里来。我们表示欢迎。他不是报社里的人，我们就给了他一个“社长”的假名义。报社工作是由钱俊瑞以总编辑的名义领导的。周扬住在报社，在一起吃饭时，他也有时给我们出点主意。

周扬在报社的院子里大约住了不到两个月。那时他经常出去活动，同北平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就在他到北平后不很久的三月二十四日，中华文艺协会北平分会就在中山公园的水榭成立了。选举了张恨水、马彦祥、周扬、张光年、徐盈、彭子岗、陈北鸥、俞平伯、顾颉刚等为理事。当时我与周扬同住在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的一座小楼里，天天见面，一起吃饭，经常聊天。他在文艺界的活动，报社的同志不参加。那时在石驸马大街有一所房屋是师大女附中中学生解华芳的家，我为了联系报社的读者有时到她家去坐坐。盛家伦是她家的常客。在那里我也见过周扬。在那里我听他们谈论文艺界的事情，也增加了一些知识。

正好在这段时间内，北京发生了有名的“四·三事件”：二三百个军警宪特在四月三日凌晨闯进《解放》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进行搜捕。报社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被捕。周扬正住在报社。那天早上，由于报社同志们进行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坚决抵抗，他们派出的军警宪特虽然很多，三个人架一个我们的同志押往警察局，人手还是不够。因而周扬和我等二十来人，当时未被捕走。我们在报社编辑部继续和特务展开了斗争。周扬那天早上在方壶斋九号门口对那些兵士和警察发表演说的事，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在“北平《解放》报社”门口的这场斗争，当时我写了一篇通讯《特务现形记》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里面就讲到周扬演说的事。

五月底，报社被查封。周扬因为拿不到出国护照在查封前早些日子已回到张家口，做了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而我在1946年5月底北平《解放》报被国民党查封之后，6月初撤回张家口，暂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帮助工作。到张家口后我找到了他的家，给他讲了《解放》报最后几天发生的情况。之后我就同丁玲、李又常等人一起到桑干河上搞减租清匪反霸运动。

1946年8月中央组织部调我回延安到《解放日报》做工作。我就同几位同志骑快马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从这时起，到1949年北平解放，我和他之间没有来往，只是听到有关他的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和苏灵杨的那个行军时在延大直属中队和我走了一路的小儿子，在晋察冀中央局向阜平转移途中从大车上跌下去身亡。这件事带给他的悲伤是不必说的。我知道周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对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喜爱。

我和周扬交往的时间很长，这里只讲到建国前为止，所以题目是初识周扬。

《经济学家冯兰瑞》

1995年9月快到她七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印出了这样一本有待于补充增订正式出版的书。我为这本书，当然也是为她写了这样一个贺词：

快到兰瑞同志七十五岁寿辰了，她的朋友们把搜集到的她的传略、对她所作的采访、书评以及近四十年著作的目录，编成这样一本书。我很赞成这件事。当代中国女经济学家中，不论从写作之夥、见解之深刻和敏锐，无有出其右者。加以她又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经团联经济学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更为经济学家们所熟知。应该有这样一本书问世。她关心的问题很多。她是一九八一年最早提出应在我国实行股份制的经济学家之一，她一直关心劳动问题。近年来更专门致力于劳动保障的研究，作了大量的调查，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成了这个学术领域中的专家。此项工作正在积极而有效地继续进行中。她比我年轻，直到现在保持旺盛的创造力。我相信过些时候在她的著作目录中将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著作列入。兰瑞同志的工作将会得到社会更多更高的评价。我祝贺她的生日也祝愿她取得更多更高的成就。

于光远（章）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劳动节

那一天，我铺开宣纸，没打草稿，几乎一个字未改就写了这样一大篇。这说明对她该写什么早已胸有成竹，达到了随便几笔就可以成画的程度。

我同她1940年在延安见面，到现在已经五十六年了。但是成为在经济学领域中密切合作并肩战斗的朋友只有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也不短，而且这二十年间的风风雨雨，可写的事非常之多，是很值得写的。写时也要同她共同回忆。这样的工作留待来日。

今天，除了抄录一年前写的这三百多字外，只想再补充一个感想，那就是中国女经济学家不很多，我也认识多位，她们都有不小的成就，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我所写的“无有出其右者”这句话，并不夸张。除学识外她的特别令人可敬之处是勇于坚持真理。在这一点上，说她“二十年如一日”自然当之无愧，说她在这二十年中越经磨练越坚强更为适当。

我希望她八十岁那一年这本书能以新的面目正式出版。

附带写一句，这本书名没用《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其实她的知名度决不在许多公认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下。不过我还是赞成这样的书名，没有必要老是加上“著名”这样的字样。

一件待送往博物馆的毛衣

我保存着一件五十二、三年前织成的毛衣。

今天参加一个研究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的座谈会，想起了它，觉得应该把它送去博物馆，可是不知道有哪个博物馆会看重它。我珍藏了这么久，不愿意随随便便地交到不看重它的地方，可是一直保存在我这里，也不是办法。

这件毛衣一看就可以看出它的不寻常。平常的毛衣都是用染了色的毛织成的，它却是羊毛的本色。平常的毛衣，即便是最粗糙的，也不会是像它那样既不平整又不柔软。我知道这至少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用来编织它的毛线本身粗细就很不匀；同时制成毛线所用的是不适合纺织而是又粗又硬的山羊毛。至于只要望一眼就可以知道它是手工织的，这倒没有什么稀奇，过去人们穿的毛衣，机织的很少。不过手织这件毛衣的那个人有段不幸的故事，是

无法从它的外表看得出来。

它不只是我个人的纪念物，还反映了过去了相当久、许多革命者聚集在延安的那个年代。

我拥有这件毛衣的时间是 1944 年对我进行审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因为政治面目还没有“查清”，1943 年我先是到西北局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那儿集中了好几百个——也许是上千个同我差不多的人。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大多数人解脱了，但对其中还有一、二百个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对他们另编了一个“特别班”。我就是送进特别班者之一。这个特别班不再在延安南门外行政学院原址，而是搬到桥儿沟鲁艺的后沟。由于附近的机关学校都知道在里面的人问题“严重”，就在“特别班”三个字中改了一个字，把它叫作“特务班”，另眼看待。尤其是附近小学校的学生，为了“教育”我们，在我们出出入入时就唱：小汉奸如何如何，大汉奸如何如何，“汪精卫你也是中国人……”，希望我们革心换骨。这个特别班的人来自延安各机关，原先彼此大都不认识。我只认识其中一位 S，他是我“一二·九”时的清华同学，比我低一班，可是年龄比我大，也是民先队员。别看人家看我们问题严重，可是我们在班内过得却很潇洒。那时候对我们审查是用背靠背的方式，没有要我们再讲、再写什么。也没有进步到文革时期那样，对我们实行群众专政。那时的活动主要是搞大生产。一个人免费供应一架纺机，既学会纺毛线，也学会纺棉纱，并且是有偿的。每周还搞些娱乐活动，开晚会、跳交谊舞等。这交谊舞，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的。

由于比较空闲，我就干了一件别人没干的事。在延安时每人每年发一身棉袄棉裤。说是“棉袄棉裤”，其实名不符实，因为其中絮的不是棉花而是羊毛。过了穿棉衣季节，每人又发一身单衣。于是在天热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把棉衣中的羊毛掏出来扔掉，然后把衣服撕成布条打“草鞋”。那些羊毛质地很差，它从羊身上剪下来不作任何处理，就从自产地运到被服厂絮到衣服里去，甚至毛上沾的羊粪也不除掉，乃至隔着布都可以闻到羊粪味。前几年我也一直把它扔掉。这一年我却想出主意，不把这些羊毛扔掉，而是跑到沟边小溪流那儿去洗这些羊毛。一遍一遍地洗，洗净然后晒干，把这些毛作为制作毛线的原料。

制作毛线的方法，就是用羊骨头上某个特定的部分作为把毛加捻的工具。这是当地农民采用的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上纺线机纺羊毛线这种生产技能我是已经掌握到了的。但上纺机的羊毛必须是很干净、弹松了的，在纺前卷成一卷一卷的才行。可是现在我想用来制作毛线的毛却是乱七八糟，只有用羊骨去“拐”，即把这羊骨作为纺锤，在使之旋转中把毛捻成线，并且不断地把捻成的线缠在羊角上，直到太多不好缠了，才把线缠成球。这种工艺有一些优点，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可以一边开会或一边聊天时一边拐毛线。也不发出什么声音干涉其他活动。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对没有见过这东西的人来说，我描述这一大篇，恐怕还是没有明白，有机会我能表演一下就好了。

不知不觉，我这样制作出来的毛线球真不少。我用一块布把它们包起来，有相当大的一包。

在特别班有一个女同志，她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她叫“石瑛”。在延安，人们一般不照相，因此我保存不了她的照片。但是她的模样我还是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实在缺乏描写一个人形象的才能，我只能告诉读者，她个子不高，

脸圆圆的，即便在特别班那样的环境下，脸上一直有笑容，一种看上去带有讥讽意味的笑容。即便是这样，却一点也不使人有反感，反而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美。她的年龄不便问本人。别人原先也都不认识她，也说不出。那时我已经有二十七、八岁，我认为她会比我小好几岁。不过有时我觉得她很年轻，有时觉得不像我估计的那么小，甚至不比我小。我实在说不好她大概有多大。我只觉得她相当老练。她喜欢同同学们交往。她虽然并不很漂亮，但很讨人喜欢，大家都喜欢同她交往，我也这样。不过在特别班，自己知道本人是清白的，也相信别的人大多数是清白的，但不敢保证每个人都没有问题。对她，至少我自己也还有某种政治警惕性。大家发现上面我提到的那位S同她交往特别密切，乃至有些同学对这有了一些议论……。

就是这个石瑛，看到我一个一个线球生产出来了，有一天问我搞这么多的毛线想干什么。我回答她：“生产出来的东西总会有用的，比如说可以把它织成一件毛衣。我看线都已经够了。”没有想到她立即接着说：“我可以给你打。”我当然喜出望外，把我生产出来的那一包毛线球全交给了她。她也就开始打起这件毛衣来。她随身带有打毛衣的针。

虽然她并不成天打，可是她很熟练，没有用多长时间就织成了。而且这衣服上还织出一些图案来。织好一穿，觉得挺合身，并且觉得还很好看。在某些并不很热的天，特别在早晚气温低的时候，我就穿着它。当时拥有毛衣的人并不多，我就成了一个相当富裕的人。我挺为此得意，她也特别高兴，常常望着我笑。我很自豪，因为原料是我自己制作的。我也感谢这位石瑛姑娘，她使我有了一件别致的可以用来御寒的衣服。

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她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同志。至于她怎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怎么来延安的，为什么也被送进这个“特别班”，我们都一无所知，这些事情（在“特别班”同学之间）是从来不相互询问的。她是朝鲜人这一点，还是有一次她自己说给大家听之后才知道的。不过大家相信S一定知道得要早。

特别班办了几个月也就散了。各自知道自己的工作审查的结果，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开过结束这个“特别班”的晚会，彼此间就没有再来往。这一百多人因都受审查聚集在一起，审查毕又都各奔东西。我一直不知道这位朝鲜姑娘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这件毛衣我却一直带在身边。日本投降后，我从延安步行到张家口，它就在我的马搭子里。从张家口到北京，上飞机时我带的行李中也有它。我们被反动派驱逐送出北平，回到张家口，从张家口骑快马回延安，马搭子里又有它。以后第二次从延安出来，到晋西北、冀西、冀中、渤海等地土改，一路都没有丢。建国后我定居在北京时更没有把它处理掉。纪念物的意义就是帮助记忆，看到这件毛衣，我在“特别班”为制作这件毛衣准备原料、石瑛姑娘为我编织毛衣的事就会记起来。

我也想知道她的下落。建国后，S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局长，一次在会议上见到他，我问他石瑛的现状。他说只知道她回了朝鲜，当了师长，别的他也说不上来。

有一次我去吉林，同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起这个石瑛。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知道关于石瑛不少情况。他说石瑛回国后改用了本国的姓名（他把这个名字告诉了我，但我没有记住），受到重用，当了高级干部。五十年代在她本国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处境很恶劣，从本国逃到了吉林，要求避难。可是我国考虑到两国党关系，不敢收留，把她又送回去了。以后听说很快就不在

人世。外国的、特别是政治组织内部的情况，别国的人不可能清楚。但是我想吉林省同志所讲他们接触到的情节应该是可信的。至于事情的本质如何，吉林同志说他们也一点都不了解。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没有掌握任何资料，但是总觉得她不会有什么问题。几次我想象她一生中最后的那些日子，一定是一付可怜巴巴的表情，恐怕不会再有我印象中的笑容。

这件毛衣究竟有谁愿意把它珍藏起来呢？

1995年7月14日

介绍一个“消费合作社”

1944年底，我从行政学院“特别班”（人们称它为“特务班”，即为在“抢救运动”中曾被视作有“特务”嫌疑的人办的班）里解放出来，分配到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做财经系的秘书（主任是姜君辰），同时还兼这个系的研究室三个组中的一个组长。这三个组中，我所在的那一个组是研究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的。还有两个组，一个组研究的是陕甘宁边区财政金融问题，组长是建国后长期担任广东省统计局局长、现为广东省统计学会名誉会长的陈应中（1992年我了解到陈已经88岁了）；一个组研究的是陕甘宁边区商业问题，组长是建国后担任过上海市计委主任的陈锡章。我们都是“抢救失足者”那次极“左”运动的对象。经过甄别后，对我们的安排虽然明显带有临时的性质，但是毕竟摘掉了反革命嫌疑的帽子，大家的心情都还是比较愉快的。在这一段生活中有一件趣事，那就是在那里工作的几个人办起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卓有成效地使“社员”们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提高。这个消费合作社挺特别，过去没有听说过，以后也没有听说过。这个独一无二的消费合作社是谁发起的，怎样作出决定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记得合作社社员有陈应中、杨进琳、李力行和我，共四个人。

那是一个怎样的“消费合作社”呢？

陕甘宁边区比较穷。在吃的方面，只有过年过节宰猪杀羊时才能痛痛快快地吃几顿肉，平时连豆腐也难得吃。老百姓中有一句话：“豆腐是我的命，有了肉，我就不要那条命了。”可是说也奇怪，老百姓却不吃猪和羊的内脏。猪下水，外边的人去久了，他们开始学着吃，羊下水还是被拿去喂狗。延安大学山下川里有一个屠宰房，每天至少杀一头羊。我们发现可以免费拿到羊下水，就瞄准了这个屠宰房，办起了这个消费合作社。

中午下班的钟声一响，合作社全体成员立即飞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的下山去屠宰房取下水；有的去拣烧过的但还有相当热量的“煤核”；有的生起炉子。陈应中则在另一位当下手的社员帮助下掌勺烹饪。他的手艺真不错，最初他讲他会作出可口的菜肴，大家将信将疑，一吃都说毫不夸张。整个合作社社员们分工明确，动作迅速，各项工作在时间、空间上衔接得很紧密，迅速产出，迅速消费，不因生产而延长很多吃饭时间，而结果则是社员们的营养水平大大提高。这个合作社坚持了几个月之久。这样的消费能做到长此不厌，一方面固然因为老吃山药蛋汤嘴里“淡出鸟来”，另一方面也因为陈应中能用同样的原料，作出几种不同的菜肴。

这个合作社没有资金，全凭劳动入股，每天生产的都消费掉，自产自自，没有任何储蓄。说没有资金，锅和调料总是要购置的，但是我记得没有向社

员集过资，看来都是陈应中自己拿钱去买的。

这个合作社每天只活动不到一小时，生产消费都在半小时多一点时间内完成。只有一个例外，那时我叫喊自己目力衰退，陈说羊肝有明目的疗效，给我做了好几次羊肝焙制的丸药。日服三次，每次若干粒。这是中午那一餐外我对合作社产品的额外消费。在这个合作社中，所有社员干的都是粗工，我干的是拣煤核，只有陈干的是“技术活”。他多劳不能多得，只能吃同样的那一份。他没有叫嚷眼睛不好，他制作的丸膏也归我一人享用。

想起那个合作社，觉得很有趣，就把他记了下来。家里的人看了问我写这个有什么意思？我回答说什么意思都没有。就算随便讲讲故事和对当时友人的回忆吧。

附带再讲一个故事：也就在这段时间里，1945年2月阴历甲申年除夕，延大财经系我负责的那个研究组全部人马——李力行、周龙雏、吕潼、杨进琳和我五人，聚在一起包饺子过节。不记得谁提议要在窑洞门口贴春联，庆贺元旦。你一言我一语地凑了词，李力行提笔写了一付对联“三十晚上包饺子五棍同乐，总有一天煮肉枣大家联欢”。“煮肉枣”三字的出处是那时延安人结婚，常买回一条肥肉用它煮出的红枣特别好吃。那晚同乐的五棍，因为不到一年日本投降了，谁都没能来得及请人吃这种红枣。五人中吕潼、周龙雏已去世多年。我听到有关周龙雏的一个故事。他在张家口工作时，人有到他单位接洽一件事，他把那人带到负责人那里。第二次那人又去找他，他说：“我不是把你带去见你要见的那位负责人吗？怎么还来找我？”那人回答：“共产党不是官越大衣服穿得越旧吗？你不是比那个人官大吗？”这样的话现在决听不到的。吕潼是五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却走得最早。李力行以后断了联系。杨进琳后改名杨晋，离休后在北京家中，今年二月还到过我家。五人中我是最年长的。

我和惠德半个世纪的交往

惠德走了。走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但事实如此。半个世纪的老友，就这样离别了，我是很悲痛的。

在他住院的时候，我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正发着高烧，精神当然不足，但是还说了一阵子话，脸上还有笑容。第二次我去医院时已经通知病危。我进病房时，护士和家属恰巧不在，病房中静悄悄地，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昏睡着。我没有惊醒他，默默地长时间地望着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去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评论拙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的书籍。这样一本书当然不能没有惠德的文章。他答应写。在他完成那篇文章写作的那一天，我们通了电话。电话里他对我说，写这篇文章他是很用心的，并且告诉我为了写那篇文章，我那部多卷本二百多万字的书，他每一篇都看了。他还说，第二天下午要亲自送稿上门。第二天，我等着他。他下午没有来，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是一向很守时间的，不会无缘无故地不来。我打电话去，家中没人接。后来知道就在那天中午，他在家里摔倒了。家里的人陪他去医院检查了。再过了一天，刘敏告诉我王惠德摔倒的事。她说检查结果脑部没有损伤，多少有些宽慰。那几天我每天都同惠德家里保持联系，知道他一直有头晕的症状，卧床治疗。我想这次摔跤跟他写那篇文章的劳累很可能有关，因此我内心非常不安。

那时我正感冒，天气又冷，不能去探望他。又过了两天，我就让秘书到他家里去探望他。秘书回来告诉我，惠德还有一点头晕，但是精神很好，很高兴，谈话时间不短。惠德把未能送来的文稿交给了她，并且给她看自己仔细研读过的我的那五大卷，书中夹了许许多多条子。秘书讲，惠德这次下的功夫真不小。我打算在天气暖一点的时候到万寿路新居去看看他。没有想到，过了一些日子听到消息：他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后来，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高烧不退，红血球不断下降，医院对家属发出警号：要作最坏的精神准备。医院千方百计地诊断病情，采取各种办法治疗。我就在这时候去医院看望惠德，并且找了主治他的医生询问。医生告诉我，他们初步诊断患的是血液或者淋巴系统方面的癌症，但是不能确诊，为了查清病情，正采取抽取骨髓等办法检查。在这次去了医院之后，我就出差了。两星期后回到北京，马上同惠德家里联系，知道情况更加不好……。

惠德是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进医院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去世，只住了四十天。去世后，病理检查，查清在脾脏有许多肿块，在腋下淋巴中也找到了癌细胞，最后的结论大概不久可以作出。

惠德从中宣部副部长的岗位退下来之前，在全国政协负责学习委员会工作。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他知道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学习和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文化方面写了不少文章，就打电话要我到政协的学习会上作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报告。他很少要我做什么事，而只要他提出的，我没有不答应的。过了一些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报告会还要过几天，不过还是要我作好准备，随时会举行。后来又打电话说，还要再等几天。这么一拖两拖，八届政协大会召开了。在八届政协之后，他不再是政协委员，这件事也就作罢了。他在政协时还为工作上的事找过我一次。而他在中宣部时，我没有同他有工作上的联系。他是个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理论工作者，他分管中宣部理论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后来理论局的工作不由他管，真使我难于理解。因此我知道他在中宣部是管不了什么的，所以他不会来找我，我也不会去找他。看来他担任政协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的工作，比起当中宣部副部长的的工作，多少还实在一些。我也看出他在中宣部工作期间的情绪不高。

到中宣部之前，他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时，我们倒谈过不少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翻译问题。我同他谈过马恩著作中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用的是两个德国字，而在马恩全集译本中却把它都译成“公有制”一个中文词，这是不妥当的。我也告诉过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没有使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个词，也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他讲的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更高的阶段”。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何思敬、徐冰的译本没有译错，而后来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译得却不准确。我还把全集之所以没有译好的原因也弄明白了：他们不是按照马克思写的德文原文而是按照俄文的译文去翻译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提法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马克思著作时对《哥达纲领批判》的俄译。而苏联的编译局把列宁当作翻译权威，不忠实地按照德文去翻译……。类似的想法我都与惠德说过。通过他，编译局的同志大概也都知道了我的许多想法。

当他在编译局时，我们还常常见面，谈各式各样的话题。

惠德是六十年代初从老中宣部调去编译局的，因此在文革中砸烂阎王殿

时，他不在“判官”的名单之中。在文革中，不同单位的走资派之间是不容许来往的，因此他是怎么度过那些岁月的，我不知道。以后也没有去问过他，大概少不了也挨批斗。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后找到了他。他已从江西鄱阳湖边的中办五七干校回到编译局工作。从他那里了解到中办江西干校的劳动强度比宁夏中宣部干校要强得多，中办的“革命同志”对走资派的要求也比中宣部于校苛刻，因而他吃的苦头不小。

他是中宣部的老人，连续工作也有十六、七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一起工作。

记得1948年8月，我从山东渤海到东柏坡村中宣部报到的那一天，气温很高，我来到这个村庄时，已是黄昏时分。比我早几天报到的惠德已经在一所农民住宅的屋顶上等着我了。见面后，他建议我当天就同他一起在屋顶上露宿，我就把铺盖搬了上去。他站着拉小提琴，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我躺着听。那晚在晴夜星空下，我和他天南地北地说了很久很久。将近四十六年前的这些情景，似乎就在眼前。我相信他也不会忘记。可是现在不能同他一起回忆这一段往事了！

早在延安时，听说马列学院有个王惠德，才二十岁就在这个党的最高学府教《资本论》，并且同王学文——他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权威——进行过尖锐地争论。在延安我只是有机会同他匆匆一晤，彼此没有谈过多少话。1946年我从北平回张家口，在晋察冀日报社见过几次面。不过1946年在东柏坡一起工作前，我同他还只能说是泛泛之交。

在这之后，我们就成了亲密的朋友了。

1947年党中央离开延安后，由于人员分散，中宣部只有一个部长，而没有机关。1948年夏天从各方面调集人员重新建立机关。初建的中宣部机关很小，设在平山东柏坡村。半年多以后中宣部迁到北京。先是在香山，后来搬到西四北大红罗厂，1950年搬进中南海庆云堂。中宣部有将近两年时间没有设处，在这期间我和惠德是部内做理论工作的“部员”。后来设立了政治教育处、理论教育处，我和惠德又在同一个处内工作。在香山时，我们合作写了《中国革命读本》，在建国前1949年8月出版（1951年5月增订再版）。这是一本印量百万的通俗读物。1949年9月艾思奇、胡绳等发起创办《学习》杂志，从第2期起要我担任总编辑。王惠德就成了这个刊物经常的撰稿人。也是在195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我和惠德担任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一共讲了二十三讲，这些讲话后来编辑成书出版。后来他和我加上胡绳三人又写了一部《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共三十讲，他和我还有廖沫沙、庞季云还合写了《政治常识读本》。这两个教材也是印量很大很大、一版再版的。1952年在我负责主编了一个时期《学习》杂志之后，惠德接替我当这个杂志的总编辑。

惠德的特点是逻辑性强，文字表述清楚明白，学风朴实。在我们之间讨论过许许多多问题，而且总是讨论得很融洽。

在建国初期，我和惠德一起工作得很起劲，而且还一起受过一次份量很重的批评。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惠德已经接替我当《学习》杂志总编辑。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两面性。我把这个看法提了出来，惠德很赞成。于是《学习》杂志就组织了艾思奇、吴江、许立群各写了一篇文章，我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在这个刊物的第二、三期上发表了。这件事大概是被陈伯达注意到了，

报告了毛泽东。《学习》杂志因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为这件事，《学习》杂志停刊整顿了两个月。在停刊结束后《学习》杂志恢复发行的那一期，由胡绳执笔，他和我署名写了个《我们的检讨》，其中有几处点名批评了我的同事王惠德。

关于陈伯达还有一件事既涉及惠德也涉及我。在五十年代后期，中宣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陈伯达（他兼中宣部副部长）在大会上又讲自己是“小学生”，是“小小老百姓”。这时候，王惠德忍不住对我说：“你听，他又讲那样的话了，多么虚伪。”这话被坐在前排陈的秘书听到了，向陈伯达作了汇报。可是汇报时他把说这话的人说成是我。陈听了十分生气，要当时负责中宣部常务的胡乔木批评我。胡倒没有那么做。这事陈的秘书虽然把王惠德的话记在我的头上（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坐在我们的前排，后脑勺没有长眼睛），可是并没有冤枉我，因为我也会说同样的话。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我和惠德哈哈大笑了一通。

我和王惠德在性格上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爱哈哈大笑。我也从没有见到过他愁眉苦脸。而且为了笑，我们还收到寄去人民日报社的“读者来信”，说深夜于光远和王惠德的笑声扰乱了他的睡眠。五十年代在中南海庆云堂，我和惠德住在西厢。晚上十一点后我们不想工作了，就开始说笑。还有一个田家英，也常常在这个钟点，穿着一双拖鞋从勤政殿溜达到庆云堂我或者王惠德的房间一起说笑。住在对面东厢南有个小院的李致远，同我们本来是一个处一个党小组的。他不给我们当面提出意见，却寄信给人民日报反映，报社把原信转给了我们，吓了我们一大跳。以后小心谨慎，收敛了不少，不过本性难改，有时还是免不了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和惠德在性格上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建国前后，我们俩写了几本“畅销书”之后，一起出了名。甚至有人误会他和我是一对夫妇（王惠德本来的名字是王慧德，那就更像女性的名字了）。那时请我们两人去作演讲的人很多，惠德常在电话里同邀请单位软磨二、三十分钟婉言谢绝。我认为花在软磨的时间不值得，不如用这时间去作报告。我在去作报告前通常只在纸条上写几个题目，而惠德办事比我认真，报告前总要写出详细提纲。因而电话答复的方法也就不同了。他在逝世前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大心思写了上面说的那篇评论我的书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成了我们之间友谊的纪念物。

三十位经济界友人评《探索》

这本文集是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 月出版的，应该说还是一本新书。书名是《科学攀登的历程》。作者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是董辅初、汪海波、孙连

关于陈伯达就此事向中央写的报告，我当时不知道，直到 1955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之后，才看到其中对 1952 年胡风给路翎的信中摘了这么一句话：“……向卢 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编者对“陈向中央的报告”几个字加了个注：“指一件党内材料。这个材料又由胡风转抄给路翎，附在这封信内。”信中的这一句话，和那个材料中加的那个注，别的人不会注意，而我一看就明白了，而且我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关于毛泽东对我们的批评，就是由陈伯达向我们传达的。不过当时陈有这个报告对我们保密，我一点也不知道，反而局外人胡风、卢甸、路翎等知道了。

成、张卓元、李定中、张友仁、何国前、林子力、唐宗焜、何伟、唐丰义、熊映梧、苏东斌、晓亮、上进、张问敏、冯兰瑞、冒天启、李新家、王惠德、吴光辉、蒋映光、林京耀、忠东、吴象、张朝尊、李克明、吴敬琏、齐翔延、李成勋。

作者大都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所写的大都是他们有专门研究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问题。这是一部学术水平比较高的文集。其中的文章都不是泛泛之作，而是对我写的这五卷《探索》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才写的。

首先要提到的是王惠德写的那篇文章。他曾对我的秘书小胡说，他是像看《资本论》那样看了光远的这几本《探索》。他还说，光远这几本《探索》精彩的地方真精彩，噜苏的地方也真噜苏。这个意思也写进他的文章中去了。他写道：“光远同志常以他思索通畅的文章来叙述某个问题。当然有时也会使人感到拖沓、噜苏。”文中他指出，这“五卷中有些看法已经落后了、过时了，特别是第一卷、第二卷中这方面的问题更明显”。他也注意到我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工资是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的观点，“前后有些变化”。并且注意到我自己在文中说“不但思想未成熟，而且没有写完，准备再作修改或重写”。“可是以后未见再作修改或重写”，这当然是对我的批评。王惠德的文章有一万多字，讲了许多问题。令人惋惜的是，他在文章写完后不久，突发重病，这篇文章成为他最后的著作。

董辅初写的文章是评论这五卷之外的我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这一本书就其性质来说是应该收入《探索》之中的，但因篇幅过大（有三十二万多字）和与《探索（四）》出书时间过近而没有收入。董文把书中我提出的几个理论观点作了很好的概括。我想，看过我那本书的同志未必能抓住我书中提出的那些新观点，而读了董辅初这篇评介文章后就能一下子抓住我那本书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

又比如吴敬琏曾经参加了好几年我主持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对于我的观点比较熟悉。他注意到了我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论这一点。他文中一开始就谈到1992年8月出版的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他指出，我虽然很早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但是在这本书中仍不断改变自己的一些用语（这当然也反映我的观点的变化），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的确如他所说，如果我写的东西停留在《探索（一）》的水平上，虽然对斯大林的说法有所纠正，但也还只是在苏联教科书的基础上做做补充，所进行的不过是它的“细化和延伸”。

对我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论述，文章的作者们注意得比较多，这的确是近几年来我研究的热点。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介绍更多的学者对我的多方面的评价，书的内容是颇为丰富的。提出意见是很坦率的。我认为这是一本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文集。有这么多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评论某一个经济学家，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但是后来没有做好发行工作。我也一直没有写一些文章同作者们作进一步的讨论，今后应该补救这个不足之处。

我也写他二三事

1993年《瞭望杂志》发表了曾彦修写的《于光远二、三事》。朋友们写的东西看了觉得特别亲切。现在我把它作为附录收在这篇文章后面。

我和彦修是 1947 年一起参加中央组织的一个“土改工作团”时熟悉起来的。那个工作团的成员都是比较老的同志，如抗战初期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的高文华、在红军长征中赫赫有名的女将张琴秋等。有的人，我指的是廖鲁言，从年龄上似乎比我们大不了很多，但是从他的神情谈吐，没有人会把他看作青年。因此，这个团中有一个“三青年”，指的就是曾彦修、史敬棠和我。还有一个青年是毛岸英。他的年龄比我们又小几岁，是工作团中的“小弟弟”，“三青年”中也没有他。

曾彦修是四川人，年龄比我大概小三、四岁。我和他特别谈得来。他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的见解。那时他还不是杂文家，没有用严秀这个笔名，但是我知道他文笔比我强。我是个搞数学、自然科学的“料”，文字干巴巴的。在 1941 年给轻骑队写稿时我就常常想到这一点。我是在这张墙报上文章写得最多的人之一。这张墙报后来被认为问题严重而受到批判时，我就因为文字平庸直叙，在读者中留下的印象比较浅，没有受到特别注意。除了思想活跃、文字能力强之外，曾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人特别地瘦。可是建国后他从南方工作了一段时间回来时，我看到他肌肉丰满了起来，前后的反差很大。他是一个体型唯一使我注意到的人。在这里我写起这么一件极小的事，我自己也觉得挺可笑。

我们之间有这样一种友情：他关心的事，我知道了不会忘记，而且也关心。比如多年来他做着一件很重要的事，系统地清算斯大林时期的很重要的人物“日丹诺夫”。日丹诺夫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中比较有学问的人。他在苏联共产党内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学术界给各学术领域——文学、艺术、政治、哲学、历史、自然科学……中的有创见的新思想无限上纲，挥舞棍子猛打。他的思想在我们中国也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中国党内也曾有过同日丹诺夫相似的人物。曾彦修做这件工作十分认真、非常严肃。从 1986 年开始已经写了十年，搜集到最可靠的材料，用严格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他自己写一部分，并且找了专门有研究的人写另外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可是直到现在尚未完稿，真是“大器晚成”。它的出版将在国内外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文化界不少人知道曾彦修（严秀）是个杂文家，不知道他还是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他肯下大功夫，用无法与之争辩的事实材料和逻辑思想来进行战斗。1983 年他为了说清楚自己在人民出版社当社长时，出版“灰皮书”的事实，写了一篇证据确实逻辑性很强的材料驳斥胡乔木对他的非难。这个材料连同七个附件有许多万字，使胡看了哑口无言。

曾彦修对我关心的事也一直记住，也很关心。知道我反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立场，常常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就在昨天（1996 年 11 月 18 日）还收到他从 1996 年 10 月 18 日《南方周末》上剪下来的一张剪报。该报记者以《非此即彼：只有一个说谎者》为题写了一段导言，然后在报上发表了《中国气功科学：美国正在开发“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科协简报：美国终止“人体特异功能”》两则截然相反的报导。这位记者说，这两份材料都是何祚庥和郭正谊提供的。我看了这篇后，回答是清楚的，《中国气功科学》传播的是谎言，《中国科协简报》介绍的是真实情况。我也看出《南方周末》发表这样一篇东西意在揭露，而且用这样的方法来报导，也很有趣味。不过我又觉得一般的读者看了之后会看不清楚。曾彦修在信件上写道：“此件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特寄上供参考。此报历来是反对特异功

能的，这也可能意在揭露。又《参考消息》已登过，因无效果美国早已大大减少此项‘研究’的拨款的报道。”这也说明他关心我关心的事情。我手边正有一篇署名明道的文章《心灵战？还是？？？》，把有关这段历史经过讲得很清楚，准备复印后给他看看。

曾彦修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对过去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楚具体。有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我只是“知道”，具体情节就要向他请教。我希望他能把自己亲自接触的事情写下来，让后人知道那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附 曾彦修：于光远二三事

本栏叫做“文化人写文化人”。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等均可包括进去。于光远是位学者，当然也在“文化人”之列。

于光远若干年来曾写文著书，辟“特异功能”之说。于是，有些本来对他印象不错的人，从此对他也有微词了，说他在这点上缺乏“科学精神”，主要理由是他拒绝观看“特异功能”表演。我对这一批评不大能理解，但我对于光远庆幸，被一切人称颂岂不是一件倒楣的事？为什么宣传“特异功能”就有“科学精神”，而反对一下就没有“科学精神”了呢？何况于光远是看了大量宣传“特异功能”的书和长篇宣传品的呀！这不等于说只有相信或宣传确有“特异功能”的人才算最有“科学精神”吗？怎么说得通呢？于光远力反“特异功能”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时间不会太久。当然，相信此说的人永远会有，但那时总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显学”了吧！

于光远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科学精神呢？我从几件大小事件上看去，他似乎是一个很有科学精神的人。由于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勇于闯新路的人，凡是这样的历史人物无例外的都难免会有某些粗疏和不精到之处。于光远涉及面很广，即使有某些缺点，也不失大醇而小疵吧。如果大家在一切问题上都定于一尊，世界上还会有进步吗？他的“广”和“新”，并非空想而来，几十年来，他几乎一天也不休息，天天干十几小时的调查研究 and 读书，这才是他“广”和“新”的基础，下面让我说些小例子吧。

1947年12月，我和他同在中央组织的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工作。到冀中时，住在饶阳县冀中区党委的某村。刚到的第二天上午，他一个人就溜得不知去向了，午饭好像也误了。回来后说是一个人跑到十里外的五公村去了。五公村是那时解放区著名劳动模范耿长锁所在的村庄。他说，想去看看，时间不够，所得甚少。不过觉得那里如编筐、打草绳等副业不错，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特别说，这个村子有九条对外通道，他仔细看过，有五条就足够了，多浪费了好几亩地。从这事起，我开始知道他事事注意，无不调查。

1948年春，我们到了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区阳信县，住在区党委所在地的何家湾。他在他的工作组内，晚上灯火不够时，就向工作队员讲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我问他，这些农村最基层的干部听得懂吗？他说，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要讲。少讲一点，讲浅一点就行了。我说，人家取笑你在对农民讲《资本论》呢。他说，不管它，农村干部的平均主义思想很严重，更不懂得为什么要保护工商业，我从道理上给他们讲讲，原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是最落后的社会制度，这决不是我们的理想。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得多，要使他们懂得不能乱搞平均主义，不能把什么都吃光分光。更不能破坏资本

主义工商业。光宣布“政策”，他们并不能从思想上接受，所以要讲讲。

1979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他打电话叫我立刻到他家里去，有紧急事，说车子已出发来接我。当时，他正同数人在谈工作。他要我把1977年我写给他转呈中央的关于揭发康生在“文革”中制造北平1936年“61人”冤案的那件材料，立即重新写出，他要立刻上交。那材料1967年是我们在上海交谈后由我执笔的。内容是康生于1948年旧历春节那天对我们谈话的详情。那天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土改工作团吃饭。饭后客人们在何家湾村边散步时，康是在为我们介绍刘格平的情况时，附带涉及此案的。康说刘很古板，比别人多坐了8年监。经过是，北平监狱中有61个老同志，立场很坚定。中央考虑当时敌情紧急，日军很可能即将对华北大举进攻。占领平津，而党又急需这批干部出来工作，就命令他们办理出狱手续赶快出来。他们不肯，后以纪律相绳。他们才出来的。但刘格平仍不肯，所以在敌伪时期他继续坐监，这次于光远对我说，昨天碰见耀邦，对他讲了这事，他十分重视，要我们立即写好材料交他。现在原件一时未找到，你赶快重新写一遍，立即送出。我于是用铅笔急急将此次康的谈话经过及内容写出，于看后改了个别字，加上我们二人的署名就交秘书立刻去打印，直送耀邦处。我反复说，两个人恐怕不好，要多找几个，当时在场的人看后共同签名，于说，不必了，我们负完全责任，两个人证明即有效。万一别人记不清了反而会节外生枝。现在不能搞这个繁琐哲学了，耀邦很重视这件材料，等着要。他对这事一反平日慢慢谈理论的习惯，一股救人如救火的热心肠充分表现了出来（后来中央在为61人全部平反的“红头文件”中全文附录了这份证明材料）。

于光远的兴趣很广，七八年前，他经过研究后出面大力提倡“笼养苍蝇”。因为在科学条件控制下的笼养苍蝇不会传染疾病，其幼虫（蛆）经过处理烘干后，是营养十分丰富的饮料，于还亲自尝过，说，颇香。一次他在火车上同一个林业工程师谈及此事，于说，对方是科学家，自不以为怪。我请他尝，他也尝了。1984年初夏，我偶然一次在广州小岛宾馆碰见他和吴南生同志在谈话，两人对此都有兴趣，“笼养苍蝇”成为话题之一。于随身也携有一小袋样品，不过这回他没有请对方品尝就是了。人家品尝珍馐美味，他为科学品尝苍蝇的幼虫，是谁在为这个世界做出牺牲呢？

前几年，我问过于，对三峡大坝问题为什么从不发表意见。于说，我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什么意见都不能发表。转过来，他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荆江分洪”吗？我回答了，大致不错。他说，“荆江分洪”其实是保一面，淹一面，实质是灾害面的转移，以减轻损失。水如果再大一些，那就会北面也保不住。他问我知道1954年那次分洪的损失不？我说不知道，他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好像是好几十亿元），死亡人数还在外。他说，现在如果再来一次“荆江分洪”，损失比那次可就要大十倍、几十倍了，人民死亡，动辄就是几十万。他说，仅就防洪一项，我就不可能发表反对意见。至于赞成有的问题我也不能回答，因此我对此事就不发表意见。

于光远这个人整年到处做调查，看资料，想问题，提解决办法，一生从无休养之类的清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工作十几小时。凡遇到假日，他总是外出调查。他说，如不出去，这几天就只能在家里陪人聊天了。他不懂得吃，说不出味道的好坏；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不去注意就是了。他自奉如此，但对“民食”（还有鸡食、猪食等）却十分关注。他大力提倡食品的工业化，说中国人用在做“吃”的时间太多了，这同现代化的要求不符。我

说，工业化出来的食品太贵了，“花”不起。他说，慢慢来，总要“花”的，发达国家无不如此，食品大量工业化生产了，就会降价，现在是奇货可居。他又研究过国内的多种“可乐”型饮料，说“天府可乐”最好，出面提倡组织“天府可乐”集团，与美国“可乐”竞争，且可打入国际市场。他还津津有味地对我谈过，他要向北京市领导建议，京北一二个县（好像是密云、怀柔）建立一个无污染食品基地。在这些地方不准发展污染性工业，禁用某些化肥农药，断绝污染源，专门生产畜品、果品、蔬菜及其他饮料、食品等。这事他做了没有，我不知道。

他做过一些很重要的事，对我只简单提过，主要是别人告诉我的。在50年代中及60年代初两次订全国科学规划时，他曾两次组织专家学者对苏联战后对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上的一些新理论、新成就、新设想的毁灭性的批判（其中日丹诺夫在哲学报告中作的“权威性”的否定、批判也在内），重新进行研究、审查。结果，证明那些批判和否定全部都是错误的，有很多则属于蛮不讲理地否定既成事实，不具有什么研究价值。这件事，于是带头人（还有其他什么人我不清楚，我想是有的），对此，将来总有人会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的。

于光远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程度，有些同他有过接触的人曾说，他简直到了“顽固”、“死硬”的程度。一个同志曾说，你把他烧成灰他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于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的、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用头脑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同志常对我说，有些人特别致力于攻击于是个反马克思主义者，真不知从何说起？

于的学问，我多不懂，因此此文不敢涉及一字。但他是一个光风霁月、毫无一点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思想异乎寻常地活跃，一心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人；一个一心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研究作出贡献和带头的人；一个一生只服从真理、服从科学、服从人民利益的人；一个只知道给予，不知道索取的人，这些，总是能够成立的吧？

近几个月，他因病住医院。我虽去看过他，但很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忍耽误他的休息。近日，一位同志对我说，他在住院期间又写成了一本书，好像名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札记》，十几万字，已快出版了。说罢，他叹息说，对这样的人为什么老是要……呢？

田家英的悲剧

听说有好几位同志写了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已经出版了这方面内容的书。不过我至今一篇都没有看到。在延安有两个田家英，我说的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很长时间的田家英。当过中央组织部的那一位，早已不用这个姓名。

我也想写写田家英。我写的内容，肯定与别的人不同。因为我没有同田家英一起参加过党中央最高层次的，如1959年在庐山开的那样的会议。我也没有同他共同参加过某个中央文件的起草。我记得他曾经找过我，要我做过两三件事，大都是毛泽东关心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要他特意来问问我的。但是一件也记不起了，想必是不很重要的。我和田家英的接触可以说大都是非工作性质的，但是我和他很熟。在我面前讲话也许他认为是最可不必顾虑的人之一。在他心目中，我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尽管我爱讲、爱写，但

是他相信我懂得什么可讲、什么不可讲，懂得讲各种话的分量。相信我不会给他制造任何麻烦。还有一条当然是更主要的，那就是我们谈起话来很投机，彼此有气味相似的地方。一个人总希望有几个可以随便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发泄自己感情的“朋友”。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会先从他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从钱箱中偷钱讲起。田家英告诉我，他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有的是黏性很强的膏药，他就把膏药抹在竹竿上，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讲这个故事，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但是我认为田家英自己并不隐讳讲这些事情。一个年轻人给老板捣捣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故事可以表现出那时的田家英是一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青年。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会再讲他怕蛇和有点像蛇的动物，连听都怕听。你告诉他这本书上有蛇的照片，他就连打开这本画册的胆量都没有。如果你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在他前面，他会吓得逃跑，我觉得这时他真像一个小孩子。有一次几个朋友给他恶作剧时，他已经二十六岁了，当时看到他“脸无人色”的表情，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可是我没有见到他见到真的蛇时的情景。

我也许会去讲他自己说如何一贯喜爱古文，喜欢古代的诗词歌赋。我当然也会去讲他如何走向革命，如何从四川来到延安。这些，他向我描绘过。至于他到延安学习革命的真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后来又如何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他做学院内某个班的行政工作，王惠德、曾彦修等做教员。这些我是听别人说的。这一段经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引起我的重视，也就没有多少印象，我只知道他和王惠德、曾彦修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朋友的。我会讲在延安的那些朋友中他比较年轻，人们就亲热地把他叫做“田儿子”。他也高兴地接受这个称号。田和他许多朋友都在延安北门外党中央机关工作，我离开中央青委机关后到了南门外的西北局。一北一南相隔好几公里，因此那时候我和他不算特别熟，但是见面时我也跟着别人叫他“田儿子”。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也许会写他如何跟我同一个时期在晋西北搞土改。只是在晋西北时，他在静乐，我在保德。以后大家都到了河北的平山中央工委。我同他就是在平山熟起来的。1947年我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他也在那里。1948年我从山东渤海回到平山，在中央宣传部当一名部员，而且担任党中央机关总支（还不是党委）管学习的委员，我住在东柏坡，他住在西柏坡，相距不到一公里。作为总支委员，我常在驻有中央机关的几个村庄跑。就在这时候他到了毛泽东身边。在怀念文章里总要讲讲彼此是如何成为朋友的。

后来他脱颖而出，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对这，他从来不讲。这样的事今天许多读者比较感兴趣，但是这方面我写不出什么来。因为除了毛泽东为了让他开开眼界，进北京城之前曾给了他一段相当长的自由时间到新解放的各城市去跑，回到中央后向我绘声绘色的描绘了一通之外，别的没有讲过什么。我对于一个人如何受领导赏识这样的事情，从来不发生兴趣。许多读者可能想了解这样的事情，但田家英既然没有对我说这方面的情况，我也就不能提供第一手材料。至于说田家英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某人发现了他这个人才向毛泽东推荐的结果这个事，田家英没有给我谈起过，我也就不能在证实或者证伪上面有任何作为。不过我还可以说一句，在说到这个举荐他的人时，我并没有感到田家英对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有时反而颇有微词。

田家英钻研马恩列斯著作的情况，我不了解。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时，他的兴趣并不那么大。我们之间还发生过一个争论，那是关于我国第一个宪法中是否应该宣布实行土地国有的问题。我坚决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在这件事情上他倒和陈伯达一致，主张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我引经据典，他说不过我。但是宪法上还是写上归集体所有。后来他告诉我，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自己的看法对。那时宣布农村土地也归国家所有，农民正因得到土地使用而高兴得很，并不特别重视所有权，因此是会同意土地国有的。以后再改国有就很困难。过了多年之后，我也不赞成宣布什么土地国有了。我认为田家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子不如王惠德，而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上，他是下了功夫的。我承认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说自己在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中大大提高了这方面的水平，他还编了一本《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用圣经纸印还是厚厚的一本，足有一千四百页。在他送此书给我时，我赞扬他，他说他自己并不以为这样的工作有多大的意思，他做这事为的是要“靠这样的工作吃饭”。

当我担任《学习》杂志主编时，他是这本杂志的作者，写过好多篇文章。

我如果要写怀念他的文章，我一定会写当王惠德和我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三院时，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田家英穿着一双拖鞋，从他住的中南海甲区的永福堂到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聊天的事（在中南海内，从甲区到乙区是随意的，而从乙区到甲区就要事先电话联系，要住在甲区的人通知两区间站岗的警士才放行。所以我们从来不去田那里，而是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三人，有时在王惠德房内，而更多的时候在我的房内（因为我是单身），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一聊就是两个来钟头，很开心，三个人都常常哈哈大笑。这件事情还引起一件事：那时与我和王惠德同住“庆云堂”院子里的，有一位我的部下李致远。他和我、王惠德在同一个党小组里。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我们虽然住在一个院子里，但这个院子很大，他住的房子离我们相当远，原先没有想到对他的干扰会这么严重，更没有想到他会以读者名义写信给《人民日报》告我们的状。报社把这封“读者来信”转到我手中，使得我们三人吓了一跳。此后我们就不敢再大声说笑。但这种瞎聊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需要，只好压低嗓门，谁想大笑，另外两人就发出警告。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我也一定会写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召集我们听取农村调查汇报时，我同他在株洲到广州的火车车厢里的相会，在车厢里两人几个小时的长时间谈话。那次谈话涉及不少事情，我至今记得很清楚。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少不了要写我们对陈伯达的议论。这段回忆我倒能写出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内容来。陈伯达的虚伪是我们两人非常看不惯的。我自己在和陈伯达的第一次交往中就领教了陈的惊人的虚伪。那是1945年，陈伯达写了一篇很长的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我发现其中有错误，就写信批评陈。陈约我去杨家岭他住的窑洞。一见面就说他自己没有学好《资本论》，我的那封信对他是最大的鞭策、最大的教育，是他终身难忘的。可是后来出书，翻开一看，一个字都没有改，使我十分吃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和以后的发展，我曾写过一篇《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吆》。田家英对陈伯达的不满比我还要强烈得多。他对陈伯达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不满。他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田家英对陈伯达所谓的农村调查十分鄙视。他说陈打着重视农村调查的旗子，可是怕吃苦，不深入农村，舒舒服服住在城市的招待所里，

派人去调查，自己听听汇报，同时装模作样到下面走一走，随后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田说陈不是真调查，而是去琢磨毛泽东的思想动向，搞一些材料，写一些文章去迎合。田说陈伯达有时也会猜错毛主席的思想而倒霉、挨毛主席的批评，但陈又有本事挽救回来。后来我去天津，那时陈伯达作小站调查，亲眼看到田家英所说的陈伯达式的调查。陈住在天津遵义道的别墅里，我去时他正在给大家大讲佛学，讲“阿弥陀佛”，没有讲自己调查中得到的结果。

如果我写怀念田家英的文章，我想也应该写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苦恼。不过田家英对这种苦恼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常常用一些诙谐的语言，讲他在毛身边的一些故事。他讲了一些自己干的、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讲得似乎很开心，但我又觉得他心情颇为沉重。

他对江青的不满，在我面前也似乎没有顾虑地发泄。有一次，他说了一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妖孽指的就是江青。我不知道这样的话他是否还对别人说过。他明白，用不着交代，这样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对别人讲的。我和江青的最初相识是在1942年初随高岗去绥德米脂做调查，我们骑马到绥德，她就在我们这一行之中。可是刚到绥德，毛泽东一个电话又把她叫了回来。建国以后，江青在中宣部做电影处处长，常在一起开会。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贵夫人，不像革命者。我也知道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对这位继母很不满意，因此受到一些“同志”的帮助。我的同情在毛岸英方面，但听田家英这样说她，我不由得有些担心。我相信田家英一定把事情的本质看得很透彻，但是他又总是用滑稽的态度去表现他这种惊人的观察。

由于田家英有这样一个与我无话不说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事，由于他知道我不了解事情的复杂背景，而懒得给我讲的），他没有有头有尾向我介绍一件事的习惯，我也从来不想从他那里了解什么情况，从来不问他任何事情。我们只是随便聊天，但是在聊天中我还是了解到不少有关他自己的情况。

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看到陈伯达当了“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当了小组顾问，大权掌握在田家英对头的手里，我就想到了田家英，替他担心。虽然那时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我想总会比他好得多。

对田家英之死，我知道得很早，而且是在一种很特别的情况下知道的。那是1966年夏天，作为中宣部阎王殿的一名判官，我已经处在被打倒的地位。对我的斗争会也已经开过一两次了。但是家里电话还没有拆掉，不许我“会客”这样的规矩还没有立下来。也就是说，那时对我实行的“群众专政”还不那么严格。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有一天，党中央机关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工作时毛泽东住处的房东来到中宣部我的住所找我。在平山时我虽不住在西柏坡而住在东柏坡，可是因为我是党中央机关总支委员（总支书记是杨尚昆同志），几个村庄都跑，而且更常去西柏坡。那时我也常去田家英那里。因此毛主席的房东认识我。这次他来到我家，对我说，他才从毛主席那里来，见到了毛主席（这个房东每次来，毛泽东不论多忙，倒总要见见这个农民），说自己想见见田家英（他跟田家英也很熟悉，不但在西柏坡他经常见到田家英，以后他到北京，每次毛见这个农民，田也都在场）。可是毛主席对他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了三个字“呜呼了”。这个农民对我说，他不了解为什么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死一点悲痛或者惋惜的表示都没有。他还问我，田家英究竟做了什么事惹得毛主席似乎很不喜欢他。他也不知道田家英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他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之后一直犯嘀咕。他以为我知道

情况，希望我告诉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那时我对田家英的死还一无所知（他自杀的具体情节直到现在仍一无所知）。但是一听他的话，我就知道一定是自杀身亡。我听到这个噩耗，虽然很悲痛，但并不吃惊，因为田家英自杀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可以理解的。和他作对的人已经掌握了“文革”大权，而有权力保护他的人，连那个农民都看出已经很不喜欢田家英了，对田家英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他怎么还有活路？那时田家英不死，早晚也会在这个运动中被折磨死的。于是这个爱笑的、很乐观的人走上了绝路。我算了一下，他逝世时的年龄不会超过四十五岁。

1995年12月

《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我对田家英自杀前后的细节一直没有去了解，因而在写《田家英的悲剧》时始终一无所知。因此在《新华文摘》上见到王凡写的这篇文章后，很有兴趣地读了。从文章的口气来看，所写并非作者亲知，而是调查所得。文中虽未交代清楚材料来源（也许交代了，但被《新华文摘》的编者删节了），但根据我对田的了解和在“文革”初期的体会，我认为文中所写基本可信。

根据这篇文章，我将补充：

（1）田死于1966年5月23日中午，这是我原先不准确知道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房东找我的时间可能在六月初（仍说不准确）。

（2）从田家英的情绪变化中，在“文革”前有相当一个时期我就看出毛泽东已不那么喜欢他了。而在1961年毛还是比较重用他的。那年春天我和他一起坐火车去广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时，他的情绪是正常的，我感觉到这一点。以后见到他时的感觉就不一样。因此我觉得王凡写的这篇文章中把1962年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在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的前前后后，是可信的。对1959年田在庐山会议的表现，毛不会不知道，但还能容忍。而1962年田回京前后，参加刘少奇主持下的文件起草工作，毛就不能容忍了。田对毛的观察，当然比一般人深得多。如他在1961年春告诉我：曾希圣不久前去杭州向毛宣传安徽有个别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经验。毛听了说了一句：“你可以去试一试，可是要准备挨批。”曾以为毛批准了自己去试点，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田对我说：“曾希圣真蠢，毛主席明明是反对包产到户，对他进行了警告，他却听不出来。”王文中说，毛泽东的习惯是，当他不同意某种意见时一般不当即表示，或者不说话或者说一些别人捉摸不准的话。对这，田知道得很透。可是了解毛泽东较深的田家英，或许对毛刘之间的关系还是估计不足，并且可能对七千人会议后的毛泽东的思想状况有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做了这种最犯忌讳的事情。也许田家英由于自己的脾气使然，明知犯忌讳，也不顾虑，直说了。从王文中也可以看出田对毛刘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完全没有觉察。王文中讲的这个“团结问题”其实早就存在。在游泳池汇报时，田也觉察了。田说不上从维护团结出发，把刘少奇也有的看法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他知道再把这个说出来，后果将更严重。王文中写，游泳池汇报第二天毛就批评田家英回京后“不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却在居仁堂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文件”，事情就进一步表露了出来。看来那就是田在游泳池汇报之前，毛就掌握了田的情况，只是田自己还没有觉察这一点。不过

汇报时毛这么一问，聪明的田家英也就觉察到这个“团结问题”的存在。这时他怎么能再多说什么呢？王凡的文章说田是为了维护团结才说是自己倾向包产到户的，我看是低估了田的智慧。

（3）在1961年，我与田的一次闲聊时，我和他对包产到户都还没有自己的看法。对这么重要的问题，要掌握足够的情况、经过比较深的思考才会形成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闲聊时只是议论曾希圣的蠢和毛泽东的说话的方式，没有涉及事情的实质。那时田和我一样，不会去反对包产到户，也不会主张包产到户。田和我不一样的地方是1962年后，我没有再去农村调查，而他去湖南再作调查。据王文，田在这次调查后形成了对包产到户可以考虑再试一试的想法。这在当时是最大胆的想法。而我因没有再去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未能像田那样前进一步，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跟了上来。

（4）我在1961年再见到田时，感到他“怪”话说得多了。王文中说他自己妻子许多话不讲，比如“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样的话倒对我说了。道理很简单，我和他没有工作上的关系，不会发生要我交待与田家英来往的事。事实上在“文革”中就没有人要我讲田家英的事。但他有苦恼，我还是一个可以让他发泄一下的对象。上面说了田也不对我讲什么具体的事情，我也从不去问，他只要讲一些抽象感情上的话，我就会明白。有江青这样一个搬弄是非、耍阴谋诡计的人在毛身边，田的苦恼是完全有根据的。当然田也知道毛泽东和江青之间也存在的矛盾，在“文革”前田还有毛能与江疏远的希望。后来，田越来越感到毛也有利用江的动向，也就不能不担心国之将亡了。

（5）对田陈交恶的事，田对我讲得很多。朋友们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不少，田在我面前讲到陈的时候毫不留情。不过他知道毛对陈也不满意，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会一下子这么重用陈伯达。“文革”前不久的1966年初，中宣部开会讨论副部长间的分工，陈伯达自告奋勇去管“戏剧改革”一件事，而且只管这一件事。当时列席部长办公会议的我，感到很奇怪。“文革”爆发后恍然大悟，这表明陈打算由此投靠江青。结果陈成功地成为“文革”中的大红人。我也深知陈的投机性虚伪性，但是他有这么大的野心，当时还是估计不足。

（6）田家英的悲剧我认为由于他的性格不适合做毛的秘书工作。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的语言来说，喜欢自由散漫。却不幸到了这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王文中写的艾思奇，其实并不是什么中央“秀才”。“秀才”云云是写文件的笔杆子。艾思奇只是一个非常忠厚、不懂权术的学者。他虽然没有像田家英那样在最高机要的地方工作，也不参加写文件的事，但也不幸进入当时是非之地的中央党校。在那儿他受到很大的迫害。田艾两人都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艾在1966年“文革”尚未爆发时去了一趟杭州，就在政治上被江、陈等利用。江青决不会喜欢艾思奇这样的人，只是能利用时就利用一下。我在写《忆艾思奇》时，还没有把这样的事写进去。田和艾都是悲剧式的人物。中国有各式各样悲剧式的人物，在我们中国悲剧式的人物何其多！能够逃脱这种命运的人，真应该自我庆幸。

毛岸英的故事

我和毛岸英只有两年时间的接触。

1947年，大约是二月，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土改工作团，从延安出发到外面几个解放区去。参加这个工作团的大都是一些“老同志”，其中有抗战初期在湖南省委当第一把手的高文华和他的妻子贾琏，有徐冰和他的妻子张晓梅，有张琴秋，她参加过长征，是很有名的人物，还有一些别的人。团长是康生。快出发时我听说团中还有一个毛岸英，他不算团员，是毛泽东把他托付给康生的，要康生把他带在身边。我也是这个土改工作团的团员之一，因此在延安出发时，就看到了毛岸英。他个子高高的，身材很像毛泽东，面容也很像。当然不带任何湖南口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我就同他很熟悉了。

到了晋绥，团员中只有我一个人分配到了保德县的新畦村。毛岸英跟了谁、去了晋绥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反正不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康生把全体团员和晋绥当地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兴县的郝家坡召集在一起，毛岸英也一定跟着去开会了。而我因为患了病毒症，住在兴县军医院接受治疗，没有参加这个有名的、后来受过批评的“郝家坡会议”。一直到工作团结束了晋绥的活动前去河北平山时，我们又集合在一起。

工作团从平山（那儿属于冀西）前往冀中，康生没有同全团一起走，就把照顾毛岸英的任务交给了团中三青年——曾彦修、史敬崇和于光远。康生要我们照顾他，无非因为团中只有我们三个人年轻，那时我三十出头，史敬崇和我相仿，曾彦修不到三十。年龄接近，共同的语言多，便于接近。

其实毛岸英比我们小不了多少岁，大概二十左右，没有什么需要“照顾”的，我理解要我们做的事，无非是同他尽可能在一起，随便东说西说，在必要时，比如见到有不完全妥当言行时，提醒提醒而已。事实上毛岸英讲话、做事很注意，用不着我们对他说些什么。

我在延安时，曾经在《新中华报》上看到过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写的一篇关于苏联儿童生活的通讯。毛岸英的名字就是那个时候听说的。他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把他送“吴家岭园”吴满有那儿生活见习。这件事在延安传得很广。后来听说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一直不让他住在自己身边，总要找一个人经常帮助他、照顾他。在工作团前往冀中之后和以后在渤海解放区，就是我们三青年照顾他。

关于毛岸英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很可能全团已经到了晋绥还没有分散到各农村去以前的一天，有一位老同志，也不记得是谁，问康生，毛岸英回国后的表现。康生说了一些关于毛岸英的好话，也讲到他回国后，对家里的事不很满意，说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只看到毛泽东是他的父亲，没有看到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康生说：有人批评了他（没有说谁批评），毛岸英总不能完全服气。

在整个土改工作团期间，毛岸英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到毛泽东，对回国后所看到的家里的事也只字不提。他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也挺爱讲话，但在这方面他的口却很紧，连感情也不流露一点。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是相信他回国后关于家里的事一定讲了什么，受到过批评教育的说法。父亲娶后母，儿子不满的情况，是家庭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事。何况与毛泽东结合的是江青这样的人。我在延安就听说曾有不少人对这有过看法，甚至发表过意见。

他毕竟在国外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对国内的许多生活习惯和语言不很熟悉。比如他不会吃螃蟹，把螃蟹连壳嚼了吐渣。他有些话——特别是客气话——讲得常常意思正好相反，惹得大家发笑。

可是他在政治上看问题很尖锐。有一次康生在山东听当地干部汇报。汇报人讲到山东有一个国民党占领的村庄，被我们军队包围了许多天，但是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久攻不下。我们派了两个斥侯化妆进村侦察，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了，将这两个人杀了。汇报到这里，康生勃然大怒，说：“我们围村的军队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调一个炮兵团来给我把这个村轰平了？！”毛岸英听了，发表议论，批评康生这么说是完全错的。他说，村里面还有我们的百姓，怎能用炮去轰？我们对他说，康生是在说气话，他并不真的主张炮轰这个村庄。毛岸英反驳我们说，气话也不能这么说，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说这种没有原则的话。我们觉得他说得对，而我们对他说的话反而是不对的。

照顾毛岸英的任务先是由田家英，后来由曾彦修，最后是由于光远担任。最近我在电话里问了曾彦修在他照顾毛岸英时的情况，他说胡乔木要他系统地讲点党员知识，让毛岸英认识毛是何以成为党和人民的领袖的。曾说自己就是按照胡乔木的指示去做的。我问他，在我去晋绥前听康生讲关于毛岸英的那段话时，你是否在场？他说，不在场。我说，因为我当时已经了解到这是毛的家事。所以就不想对毛岸英上什么党史课。在电话里我对曾讲他对家里的事从不透露一句话时，曾告诉我，有一天他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他很少去那里）非常生气地说，她又在家里吵架。毛岸英不住在父亲住的西柏坡村，而是住在我们中宣部所在的东柏坡村。我倒常去他那里，但是多半是教他一些语文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总是很认真地听讲。有一位传记文学的作者写了一段关于我怎样帮助毛岸英学习的故事，而我自己反而想不起什么具体事情了。

纪念查汝强

这个带有纪念性质的座谈会，是我发起召开的，我也答应主持这次会议，但没想到临时因病不能到会，只好写这个书面发言了。

老查比我小十岁，平时身体很好，没想到猝然死去。他的死，不仅对于他的家庭，他的朋友，而且对于自然辩证法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是很悲痛的。

我认识老查是在50年代初，快40年了。那时我在中宣部理论处负责，老查是北京市委理论宣传处处长，我同他工作联系比较多。有一件工作是我们合作进行的，那就是要撰写一批关于建筑思想的文章。我主持其事，老查是我的助手。他是学外语的，对建筑学是外行。可是我感觉到，他掌握一门新学科的基本知识的能力很强，因此，工作是完全胜任的。后来，他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北京市委的工作遭到挫折。而我当时正在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根据上述我对老查能力的了解，就想方设法把他调了过来。从此，他就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岗位上一直工作了26年。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果真成了一位出色的专家。

在这20多年中，他所做的工作是大量的。我建议《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把他的学术自传刊登出来。这个自传的附录就是他所发表的文章目录。从这个目录中也可以看出，他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大量的。如果去读他的著作，就会看出他的写作态度是很认真的，写出来的东西是有较好的水平的。

在我兼任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的组长时，龚育之同志和老查担任副组长。文革后我不再兼任这个职务，而且研究组也改为研究室后，老查就成为了这个室的主任。同时他还长期担任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这个研究室和研究会之所以以“自然辩证法”命名，是为了表示我们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和恩格斯本人的敬意，表示我们愿意在这样的旗帜下工作。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事实上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研究室和研究会的同志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老查是坚持马克思的基本哲学观点的，并且为这样的观点写作。我是赞成他的这种基本观点的。老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努力吸收各种新的思想。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是如此。这一点，从他的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出。近些年来，老查参加的国际活动比较多。参加这些活动，是他吸收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后要讲一讲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的问题。我是这本书的主编，但是这件工作可以说一直是老查主要负责抓的。他出的力非常之大。这本书虽然目前还未最后完成，但主要的工作，可以说已在他的手上完成了。遗憾的是，他看不到这本书的出版了。

我认为老查是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学习的！

1990年12月24日 于北京医院

附记：

这篇文章写于六年前，在他去世四年之后的1995年1月，《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出版了。正文前，在编辑委员会名单中，查汝强任整部书的编委会常务副主任、编委会委员，自然科学哲学史卷主编、自然辩证法卷主编。然而他的名字都加上了黑框框，看了真使我伤心。这部辞典里，他撰写的那个《自然辩证法》条目中对恩格斯这部著作中的中译本写了一段话，对1984年10月出版的于光远等译编的新的中译本写了这样一段：“这个版本不仅在译文方面作了许多改进，而且将论文和札记混合起来，统一按照恩格斯总计划草案的基本思想作了新的安排。”这个作法就是查汝强提出而为编委会采纳的。我在这个中译本的后记中对这作了说明。

这部百科全书、这个新译本，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总的说是达到了较好的水平，但是我并不满足。本来想再作一番努力，使之达到更完善的程度，只是我也已过耄耋之年，特别是没有查汝强这样的同志帮助，我这个愿望看来是暂时无法达到了。

看陈翰伯《出版文集》后写的

方才收到一本书，信封上写的寄书人的姓名不认识，打开一看，原来是陈翰伯的《出版文集》。它使我想起了我和陈翰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接触。

我和他在“一二·九”时都是北平的学生。我在清华，他在燕京。而且那时我们都是大学四年级学生。清华、燕京这两个大学相邻，不少行动都是在一起进行的。“一二·九”当天两个学校的游行队伍汇合后，都在西直门外受阻。第二年一月的南下扩大宣传团，这两个学校组成了第三团，自始至

终在一起，直到被国民党当局派去的便衣从高碑店押送回来，在燕京体育馆开会成立民先队之后，清华的同学才回到自己的学校。不过那个时候燕京同学中给我印象深的是黄华、柯华等几位，陈翰伯只是闻名，似乎没有见面。

我们二人成为朋友是在建国后的中央宣传部。建国前，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我又在中直机关党组织中当一名委员，因此中央各机关的情况也就能了解一些。那时我听说陈在新华社工作，新华社在平山办了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由翰伯负责。建国后的1951年，这个班改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名称也改为宣传干部训练班，陈翰伯主持班务。这个班的影响不小，许多宣传干部都在那儿学过。于是我们彼此成了中宣部的同事。1953年他调到我主持的理论宣传处，做副处长，并主持《学习》杂志的工作。这个杂志是直接由理论宣传处管的，于是我同他又成了中宣部里一个小单位的同事。

理论宣传处的办公室是在中南海庆云堂三院的正屋，我、王惠德、洪禹、庞季云等住在三院厢房。《学习》杂志工作的同志中也有一部分人在中南海上班，他们在庆云堂四院，我和翰伯几乎天天交谈。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当然理论宣传处的几个人之间对工作不是完全没有不同的看法。好几位副处长都是从延安或平山马列学院出来的，而翰伯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毕业后又一直在好几家报刊工作，曾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任总编辑。在主持《学习》期间，长期搞新闻工作的人很自然地觉得这个理论杂志枯燥了一些，于是他运用自己的经验，想把这个刊物办得更活泼、更加密切地联系实际。大家都支持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试试。1956年酝酿改版，出过两期试刊，1957年起正式改版，改月刊为半月刊。《学习》改版后，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6月反右斗争后，他的计划就不能很好地贯彻。

1954年后，我在中央宣传部兼管理论宣传处和科学处两个处。可是到1955年后我就不再兼理论宣传处的工作。我和他就不在同一个小单位里了，但是我同《学习》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这个杂志创刊开始，我就担任它的主编，这是1949年10月的事。以后在王惠德当主编和翰伯当主编时，我一直间接地管这个杂志，并且给它写稿，因此到科学处之后，我对他提出的在这个杂志多介绍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主张表示完全赞成。

1957年底他就调去了文化部直属单位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对他去商务，我也很赞成，商务是出版界的一块老招牌，历史悠久，社会上影响很大，而且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毕竟独当一面，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才能。1958年党中央办《红旗》，干部不足，就把《学习》停了，有的人去《红旗》，有的人就跟着他调去商务，成了商务的骨干。

从此陈翰伯就进入了出版界，一直在出版工作的岗位，不再离开。多年有成效的工作，使他在出版界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在出版工作岗位，从商务到文化部出版局，到国家出版事业局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最后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当主席。今天我看到的书名就叫《出版文集》。

他到出版界之后，我和他的来往少了，但还经常有些联系。1965年9月世界科协代表大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组团时我想起了陈翰伯，就提名他为这个团的成员之一。这次我国的代表团的团长是周培源，我对外是副团长，对内是临时支部书记。当时会上“斗争形势”相当复杂，而我既要应付会上的问题，又要每天夜里写电报回国请示外交部。团内的事务我就请他帮我处理。那次参加代表团的同志比较多，有十二、三人，加上翻译，我希望

他们也要在会上积极发挥作用。我知道翰伯有丰富的经验，也善于团结同志，就要求他帮助同志们做好工作。他的工作果然做得很好，周培源和我，还有一块儿去的同志，对他的工作都很满意。

这是文化大革命前不很久的事。

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1980年后他生了病，83、85年我曾到他家去过两回。他的去世使我很悲痛。

时间过得真快，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不由想起他来，他的容貌、他说话时的声音似乎就在眼前。

同病相怜

一苇：

我让小胡来探视你时，你对她讲的那些我都知道了。也是她告诉我，你从南方回来后进了空军总医院，主要接受中医治疗。可是星期日袁宝华到北京医院我们在的病房区探视王玉清时（王患心脏病在这里已住过两个新年了），对我说，才到医院里探视过你，说你也正在接受化疗。对袁所说，小胡不信。我不知道事情究竟怎样？

我们现在是“同病相怜”，又都坚持工作。前天起我动了个念头，把我想发表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写成几篇小文章，加上一个总的题目，汇总在一起，由你作主，在《改革》上发表。我想写的题目不少，第一批想写这么四篇：《用最高的热情发展文化，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介绍我的“一制多式”的观点》、《关于系统地建立为乡镇企业服务的工作体系的设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再来谈谈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问题上我的“主体论”的思想》。汇总后的题目可否用《大问题小文章——关于发展我国经济的若干思路》。现在写好前三篇，不知道小胡那里能够打出多少给你看。我很想听听你对我这个作法的意见，也希望听听你对我写的那几篇文章的评论。

这些年我写的真不少，可是有些看法听不到评论，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理解。我一点不怕别人批评，而且欢迎批评。如果有人能够多写关于批评我的文章，我的某些观点的影响就可以出去了。当然那种有意识歪曲我的看法，随便“无限上纲”的文章，只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了。

我想在我们之间用不着彼此安慰，我们都会做自己的工作，保持精神上、心理上的健康。

我和蒋一苇的相识是由于他是《学习》杂志的作者。他与林润青、张先畴等同志熟识，原先也是做出版工作的。他在《学习》上也经常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常识的文章。建国后在机械工业部工作，文革时在那里接受批判。文革后有一次我遇到他。我就要他参加我在大连召开的一个关于组织力量写书的会议。那时他表示愿意做工业经济的研究工作。我就把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后来就长期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他对经济改革发表过很多引起人们重视的见解。他工作很活跃，在我的赞同下，他与香港中文大学的闽建蜀教授达成协议：由中文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每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轮流在北京和香港召开。我去香港参加过两次会议。后来听说他在重庆社会科学院兼了一个领导职务，并以重庆社会科学院名义创办了《改革》杂志。1991年我在北京医院接受治疗时，听说一苇也得了癌症，而且已无法动手术。我无法去看他，就让秘书小胡去看他。这是小胡看后跟我讲了他的情况后我写给他的信。

别的信息还是通过小胡来沟通吧。这封信就写到这里。
再见

于光远
1992年2月18日 元宵节

一苇重病之后

1991年12月，我正在北京医院接受放疗。有一天，一个朋友来病房探视。他告诉我，一苇病了，而且病情不轻，也是癌症。他告诉我，一苇事先完全没有察觉有这方面的病，是从南方出差回来，突然感到不适，到医院去治疗，被医院查出来的。听说肿瘤的部位长得不好，而且癌细胞扩散的面已相当大，不便动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很沉重。

过了两天，又有一位同志来看望我时说：一苇得知自己病情的时候，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正要召开一个经济学家的座谈会，通知了他，于是他推迟了住院的时间，抱病出席了这个会议，并且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他的发言中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大意是希望让我多发挥一些作用。当我得知一苇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仍然积极工作，我想，毕竟他还是他，不会因为疾病使自己的精神垮下来。

后来，听说一苇住进了空军总院。我想去看望他，可是因为自己也住在医院里，身不由己，所以只好请我的秘书胡冀燕代我前往。她去了，回来对我说，一苇的精神状态很好，谈笑风生，一点不像患了重病的样子。一苇把他那天座谈会上的发言详细告诉了小胡。当时一苇在空军总院一边接受放疗，一边吃中药。给他看病的那个中医恰好也是给我看病的大夫。一苇使用的药里有一种是提高免疫力的“香菇多糖”；他听说我还没有使用，就叫老伴向大夫要来了说明书，交小胡带给我。后来，我也用了这种药，每周注射一次，至今已经一年多了。

1992年2月18日，我在医院里给一苇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我们现在是‘同病相怜’，又都坚持工作……，也希望听听你对我写的那几篇文章的评论。”我之所以与他在信中只谈工作，是因为在我的实践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经验，那就是多想工作少想病，可以使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从而减轻病痛。我想，一苇肯定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因此两个病友工作上的合作也可以起到精神上互相勉励的作用。

我在这封信上还写了这么一句话：“我想，在我们之间用不着彼此安慰，我们都会做自己的工作，保持精神上心理上的健康。”

后来，我把信中提到的前三篇文章让小胡交给了一苇。他看后，在《改革》上发表了。第四篇因为写了八千多字，不能再算“小文章”，就单独在《改革》杂志1992年第4期上发表了。后来又收进了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一书。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为了在我国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一苇同志抱病参加并主持了《改革》杂志召开的“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讨会”。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是在我国召开的第一个专门讨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研讨会。在当时，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因为虽然小平同志讲了话，但左的势力还很大，

反对在我国搞市场经济的还大有人在。我因病没有到会，为会议写了一篇题为“不要再回避‘市场经济’这个词”的书面发言。我听说到会的理论工作者很多，有些人的发言很精彩。这次会议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它对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推动作用明显的。我自己就是从为那个会写发言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一连写了几十篇文章，在当年8月份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一书。

自从1979年中财委组织首都经济学家成立了理论与方法、体制、结构和引进四个研究小组以来，我一直认为，我国经济学家不但是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科学力量，而且应该是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舆论力量。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学家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认为一苇发起和主持的这次座谈会在经济学家运用自己的科学思想发挥自己作为重要的舆论力量的作用这一点上，是有划阶段意义的。这个座谈会在重视舆论的作用这一点上是特别明确的。例如，会前《改革》杂志就留出了篇幅，会后还打算另印资料在更大范围内赠送。目前已在首都举办了几次“中国市场经济论坛”，在这一点上思想更加明确。而这个论坛可以视作一苇同志主持的那个座谈会的继续。

以后，我不时听到有关一苇的消息。有时听说他病情稳定了下来，有时又听说癌细胞进一步转移了。后来，听说他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我知道，他的病情在恶化。但是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关于特区、开发区的大型研讨会，我去了，他也去了。这是我们两个病后第一次见面。他的容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眼睛依然炯炯有神，精神看起来也很好。在会上，他发了言。他发言时，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思路还是那么清晰。这次我们俩相见，彼此都很高兴。遗憾的是，他没有参加完会，发了言，就赶回医院去了，我俩没来得及好好聊一聊。

1992年3月，我因为白血球太少，化疗做不下去而出了院，可是8月份又因输血得了肝炎，住进了三二二医院，于是一直没能去看望一苇。

去年12月，听说一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我抽时间赶到了中日友好医院。他比我们上次见面时消瘦了一些，但精神仍然很好。他看见我，非常高兴。这次我们谈话的时间比较长，谈的都是关于经济形势和经济研究方面的事情，彼此的病情只是简单地说了下。因为我自己不愿意谈病，我想，一苇恐怕也与我一样。我把自己正在组织“中国市场经济论坛”的事告诉了一苇，他很感兴趣。当我提出《改革》杂志是否也作为发起单位之一时，一苇当即表示赞成，说要立即告诉杂志社。

那天，我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一书送给了他，他很高兴。

后来，一苇的病情迅速恶化。我们的那次见面竟成了诀别。

一苇离开我们快八个月了，我想我们怀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生前所热衷和献身的改革大业继续开拓下去。无论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多少艰难曲折，我们都绝不后退。

1993年9月13日

写这篇与冶方商榷

文章的由来

在社会生产成果的统计中应不应该包括劳务？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作一番比较彻底的探讨，并且得出结论，以便在我国的统计工作中得到实际的应用。这件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开展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丰富我们的经济科学和统计科学也会起促进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最近一年来，我国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时，它又一次被提了出来。1979年冬我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文章，发表在厦门大学《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1月号上。以后又有一些同志写了一些在观点上与我比较接近的文章。针对我和这些同志的文章，孙冶方同志在《经济研究》1980年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的一篇论文。文中对上面说的那几篇文章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我和孙冶方同志既是同行又是好友，在多数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仅一致，而且十分投机。但是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看法相反，争得脸红脖子粗。关于这个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究竟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呢？还是生产能够用来满足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务的劳动也应该是生产劳动？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或者换成一个统计学的问题的提法，意思也是一样：在用来表示某个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比方说在一年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社会生产成果的统计指标中究竟应不应该包括这种能够用来满足社会物质文化需要的劳务？我和孙冶方同志过去没有讨论过，我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才知道我们两人又是对立面的双方，会再争论一场。

我们之间有时发生的争论，即使相当尖锐，但是从来没有伤害过彼此间的友情。而且我们有这样共同的主张：在学术界应该有这样一种公开争论的风气，指名道姓地批评。我们认为，指名的批评比不指名的批评要好。因为指名的批评，可以使得批评者的批评必须有根有据，不好断章取义；而被批评者也可以进行说明或者进行反批评。在不指名批评的情况下，被批评者无法准确地判断人家批评的究竟是不是自己，因而不便出来进一步说清楚自己的观点。这对于开展学术讨论是不利的。因此在我们两人的文章都已经在刊物上发表后半年多，在一个讨论党的思想战线方面工作的座谈会上，孙冶方同志向我提出，在他与我之间就若干问题进行互相指名道姓的批评，并且提出先就这个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进行辩论。我当然非常高兴这样做。于是我们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

（1982年12月）

我总算履行了和冶方互相 点名批评的协议

这是作者发表在《经济研究》1983年第7期上的文章《在社会生产成果的统计中应不应该包括劳务》的一段绪言。

这是作者为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在社会生产成果的统计中应不应该包括劳务》一文所写的后记。

当同志们看过《在社会生产成果的统计中应不应该包括劳务》这篇文章之后，就会明白它产生的原因了。在这里我还想再补充几句。

去年12月，当我把这篇文章的稿子送给冶方同志过目后，发现孙冶方同志在1981年召开的一个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上写给我的那张条子仍旧完好地保存着。条子上只有这样几个字：“ $8+2=10$ 我和你二个互相争论和批评（点名批评）一番，凑满十个指标。”对于这个算式“ $8+2=10$ ”的意思，当时我并没有留意。重新看了这张条子后，我猜想：他之所以这样写，很可能是他当时算了一下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着的有分歧的观点至少有八个，而且认为一定还不止八个，于是又添上二个，提出要同我争论十个问题的指标。12月17日我在医院问他，他写这个算式时是怎样想的，他表示已经记不清了。

在我们达成这个互相争论的协议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动笔。去年12月，不记得是1日还是2日，我出差回来遇见周扬同志，他告诉我，他在医院里见到冶方同志，看到他身体已经很不行了，恐怕没有几天时间给他了。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想起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由于我没有抓紧时间来写，现在没有法子向他交卷，将成为我的一件憾事。可是没想到，1982年12月5日，当我再次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精神还挺好，见到我很高兴，问了我一点关于经济方面的情况。这次他虽然没有提起协议这件事，但我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最后下决心回家就动手，一定要用最快速度把文章写出来。我希望他能看到我指名批评他的文章。

当时正值人大会议召开期间，我白天开会，晚上加班，一口气干了五个深夜，才把文章写完，这就是同志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篇文章。我那时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和冶方同志的死神赛跑，时间不允许自己再去打草稿，也不允许边写边改，把稿子弄得很乱，不得不誊抄了。所以我一反过去写文章的惯例，尽量一笔一画地写，只要是写下来的句子就不再改动。我写过的稿子从来没有这样整齐，目的是为了好让冶方同志看清楚。当然，这就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多少修改和斟酌的余地了。我想，即使在逻辑上，文字上漏洞比较多，也不去管它了。

当文章送到冶方同志手里的时候，他非常高兴，说要马上看。我知道要他看这么长的一篇稿子是不应该的，于是我就大声念了这篇文章的前段，而全文请《经济研究》编辑部的张卓元同志看过后，再讲给他听。后来，张卓元同志写信告诉我说：“冶方同志希望光远同志《在社会生产成果的统计中应不应该包括劳务》一文公开发表，以推动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这是他听了张卓元同志向他汇报我的文章的内容后对张卓元讲的意见。

我知道自己的这篇文章很粗糙，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斟酌的地方，而且冶方同志也要我定稿之后再发表。但我想：文章既已送冶方同志，他看到了我这篇稿子，这个稿子就成了我们之间友情的纪念物，我就不能再去改动它了。于是我只对文章中一些写错写漏的字句或文字不通顺的地方作了一些改动，其他仍保持原样。

遗憾的是，今天我的文章发表了，而他已不能再与我就这个问题继续辩论了。而且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许多问题我也应该发表意见同他争论。但我相信，他虽然去世了，但还有赞成冶方同志观点的同志；他们一定会拿起笔来，同我争论的。

当我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在《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上发表之后，除了冶方同志外，还有一些同志也发表了与我商榷的文章。对这些文章，本来我是想一并答复的。这也是我没有能够比较快地履行同冶方同志互相点名批评的那个协议的一个原因。而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只是希望快，所以就不再涉及其他同志的文章，只好等以后有时间再另外写文章了。

在孙冶方同志纪念会上的讲话

在为十天前去世的冶方同志举行的这个纪念会上，我想讲讲在我知道他的遗言后自己的感受和受到的教育。

这个遗言是他在病危期间不断思考，最后忍着病痛写成的。一月七日我去医院探视，见到他病情恶化，嘴里吐出的是带血的粘液，讲话已经很困难。但是他还询问家属，自己的遗言交出去了没有。他对自己所写的遗言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

在冶方同志的《遗言》中有这样几句话：“我死后……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冶方同志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贯不唯上、不唯风，不怕坐冷板凳，也不怕受压，坚持百家争鸣。仗义执言，的确是我们的榜样。他的《遗言》又最后一次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学者对党、对社会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责任感，更使我们十分感动。在《遗言》中他要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这些本身虽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却多次向身边的同志叮嘱一定要按照他的遗言办，否则他难以瞑目。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这是为了要同志们不用眼泪和花圈来纪念他，而更加注意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能够帮助他将他的经济观点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之中。他认为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冶方同志是一位办事十分认真的人，他的遗言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

冶方同志在遗言中提出的要求，也是十分客观、十分合理的。学术观点上的是非，只有通过学术界的讨论来解决。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同事们身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经济学界冶方同志的老朋友，都知道冶方同志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风格：当他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时候，他是很坚持的。他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他的东西，但他也从不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他临终时提出的只是要求对他的观点进行评论。

但是，我们要看到，正确地评论一个人的学术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做到大家来承认某种观点的正确，更加不容易。直到现在，我们在学术讨论中做到的最好的情况是：认真地研究了所讨论的问题，畅所欲言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讨论中彼此受到了启发，提高了对所讨论的问题的认识。而对某种学术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还缺乏比较成熟的经验。但是我认为评价冶方同志的某些重要经济学观点这一件事情，是可以做到，也是必须做到的。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心和对冶方同志遗愿的尊重，我们都应该努力这样做。今年下半年举行的评论冶方同志经济学观点的会议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特别是对如何才能达到冶方同志所希望的结果的问题，应

该很好地作一番研究。一个要完成特定任务的会议，应该有特定的开法。而且这件事一定要做出结果。一次会议没有能解决问题，就再开一次。冶方同志是个讲求实效的人，我们也要扎扎实实地做好这件工作。

现在，冶方同志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之后离开我们了。他不能为宣传他自己的正确的观点再讲什么了。今后只有我们这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去代他广为宣传。2月13日，也就是春节这一天我去探望他，和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21日我再去探望他的时候，见到他当时的身体情况，我不忍再讲什么。而22日我赶到病房时，他已昏迷。我一直在他身边，直到他的心脏最后停止跳动。在13日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告诉他：我最近回顾了彼此相识二十五年的交往，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后自己的进步。我还向他表示愿意为宣传他的正确观点和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纳他的观点尽力。当他在他耳边大声讲完这些话之后，他低声说：“我听明白了。”这次谈话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1981年夏天，他向我提出，彼此就若干个问题写文章，互相指名批评。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我的文章虽然写得太迟，但最后总算实践了诺言，把“指名批评”他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观点的文章，送到他的身边。在最后的这次谈话中，我按照他的心愿，对他又作出了新的诺言。今天我想向在座的同志们再一次表示，愿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学界的同志们一起为实现冶方同志的遗愿尽一份力量。

写在冶方逝世十周年

十年前的今天，冶方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停止了，心脏还在跳动。我们守在心脏示波器前面，波幅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条直线。冶方走了，我记得清清楚楚，仿佛这事就发生在昨天。

在这天的前个把月，我走到冶方的床前，就我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最简短的概括。我说：“你和我有双重关系。我俩都是经济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你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我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我在你的上级机关工作，上面要整你，我不积极，为此受过斥责。但是我对你保护得不够。我俩又都是经济学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观点，但又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所争论。我的逻辑思维比你严密，但是你接近我国经济机关，对改革敏感。对你的改革主张我是赞成的，但这方面的觉悟比你低。”那时冶方的听力更差了，我只得在他耳边大声地说。他已经没有气力说话，轻轻地低着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再前不久，我连熬几夜写了一篇与冶方商榷的文章。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紧张地赶写，我说：“我是在和死神赛跑。”他惊讶地望着我。我看出他不懂得我的意思，就告诉他我和冶方都对那种恶意批评他人、又故意不点被批评者的名字、使人无法答辩的这种手法抱很大的反感。因此相约我俩互相点名批评，用行动表示这种不满。冶方先写了一篇对我指名批评的文章，而我应该写的点名批评他的那篇文章却迟迟没有动手。因此，在死神正在向他召唤的时候，我便只有通宵达旦地去写，怕履行不了我们的相约，我总算赶出来了，交给了病床上的冶方，他满意地对旁边的张卓元说，请《经济研究》把这篇文章发表。那时冶方已经看不动这篇大约有二万字的长文了。

冶方走了。中国少了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少了一位在经济学研究工作上的合作者。我们一起主持了长达七、八年的双周座谈会，这

一座谈会曾多次为政治运动所中断，又都在运动过后恢复活动。我们一起出国访问，我们一起在中国提倡数量经济学，我们一起……。我们也争论许多问题。在中央委托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思想问题座谈会上，我们相约互相点名批评时，在他递给我的那个条子上写着 $8+2=10$ 这几个数目字。我想那时治方是算了一下我俩有争论的问题有多少，在治方走了之后，我也曾想就这些问题写些文章，可是考虑治方已经不在，无法与我作进一步的争论，同时我国发展得那么快，讨论那些问题的意义也大不如前，它们基本上属于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范围，所以也就没有再动笔了。

治方走了，而且已经十年了，但是他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很深的。在1987年那样的处境下，我想起治方那句“我不是气象学家”的名言，写了一篇一二百字的超短文，而且请人为我刻了一方图章。现在我把这篇短文章抄在下面：

“‘我不是气象学家’，这是好友孙治方的名言。文革前的一九六三年，对他的一场批判正在酝酿，风声已经传出。有人劝他要注意风向，自己的言论要有所收敛或改变，以避灾祸。他说：‘我是经济学家，不是气象学家。’他坚持继续发表自己原有的观点，终不隐讳。我记此事，既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介绍他作为无产阶级学者的高风亮节。真正的气象学家们，请千万不要生气，他只是借用这样一个比喻。他应该有起码的自由——讲俏皮话的自由！”

我想治方地下有知，看到它是会高兴的。

1993年2月22日

我和齐燕铭在 两个时期共过事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并由他作报告。在报告的最后一个部分，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告诫我们的同志说：“问题是在于善于学习，无论是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我们不应该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而在有些地方，我们有一些同志正是因为抱着这种狂妄的态度，使党的工作遭到了损失。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

这是他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的一般的要求。

周恩来接着把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性质上分做两类：一类是各类行政性质的，一类是政治性质的。后一类问题在中央宣传部统一监督下由党中央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对前一类问题，“国务院准备设一个中国专家局来负责处理。……专家局一般地只负责解决那些不便于由一个部门单独处理的问题。专家局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各项行政性质的问题上，负有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对于各部门在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处理不当的地方，专家局有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纠正”。

不久以后这个专家局成立了，没有叫“中国专家局”而是叫“国务院专

家局”。但是任务还是这个报告中所规定的那样。以后国务院又成立了一个“外国专家局”，那时国务院专家局却又不再存在了。

由周恩来提名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的便是齐燕铭，那时他是国务院秘书长。在知识分子会议结束后，1956年春夏之交，齐燕铭就把专家局的班子搭了起来，在中南海开始工作。有一次见周总理时，他对我说：“国务院专家局可以开始工作了，齐燕铭是专家局局长，自然科学界你熟悉，自然科学专家方面的工作你多帮他些忙，你是专家局副局长，你兼任这个职务的事我已经给定一说过了。”1956年10月10日周恩来给我发了正式任命书，那时我已经同齐燕铭一起工作好几个月了。任命书发出后，齐燕铭召开了一个会，这时我才知道，费孝通、雷洁琼，同我一样，也是兼任的副局长。一开始没有专职的副局长，又过了一段时间才调来了赵守攻同志担任专职的副局长，他有事就找齐燕铭同志。齐燕铭当时是国务院秘书长，管的事很多，不过他管也有很大的好处，因为那时大的方针问题，已经提出了的，在知识分子会议上都议论过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正在制定，在制定规划过程中对有关知识分子行政性质的问题也正在作进一步具体研究，专家局没有新的工作要研究，此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处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来信来访，而这些来信都涉及一些部门，是要国务院作主的。有一位国务院秘书长兼局长，答复来信有许多便利。而我们副局长的工作只是对提出的问题发表些看法，工作量并不重。在这个时期的共事中，我感到燕铭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工作效率也很高。我想国务院秘书长就应该是像他那样的人来当。而且我发现他对文化界的专家们很熟悉，而我对这方面人是很不熟悉的。

第二个时期和齐燕铭接触是1976年我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时候。组织上告诉我三个老同志要在这个所当顾问，他们是薛暮桥、许涤新和齐燕铭。这三位中薛暮桥和我最熟，在文革前我们密切合作过。那时薛暮桥、孙冶方和我三个人组织了一个双周经济学座谈会，坚持了许多年。许涤新也是熟人。当时不知齐做什么工作好。我知道他专长历史，但是我们是经济研究所，于是搞了一个研究革命根据地经济史问题同他商量，没有想到他很高兴，真去搜集资料，而且到江西苏区去作调查，完成了写作并出了书。我对他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真是很佩服。但是这本书我至今没有见过，听说赵人伟知道这本书的出版情况，我想问一问他。

燕铭同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延安演出的京戏《林冲》和《三打祝家庄》，我听说就是齐燕铭创作的。他善于诗词歌赋、书画篆刻，也很健谈。我也知道抗战前他和黄松岭、马叙伦、吴承仕、陈伯达、杨秀峰都是中国大学教授，只是他所长的正是我所短的，在这方面不能和他交流。但听他有时说到这样的话题时我还是很有兴趣的。

我和部下之间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三、四年过去了。那时候有一次我去南宁，乔晓光同志请我吃饭，谈起我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几个部下，说到我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回头想了一下，我恐怕算不了是强将，而且我手下也有弱兵，但强兵的比例的确比较大是事实。不少人问我，在你的部下中为什么有这么多出类拔萃的人，你是怎么培养的？对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我就不能同意。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进步，主要是靠本人的努力，任何人的才能不是哪个领

导培养出来的。当然领导对于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的进步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却是事实，因此我就对这个问题认真思考了一下。今天我看到《领导与秘书》这份杂志后，想起了十多年前那次在南宁的谈话，就来讲讲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体会吧！

首先我想说，一个人的进步，不是指他的职位的提高，而是指他知识、能力、品德的实质的提高。一个人职位的提高，可以是对他才能提高的反映，但这个情况也只是才能提高的一个表现，而一个人的职位并不反映他本身才能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如果把提高一个人的职位叫做培养，那么领导者只要真正有实权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讲真实的知识能力和品德，那么领导者对他的下级的“培养”的作为，是很有限的。一个人的进步十之七八，甚至八九，要靠自己的努力，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也许还可以加上个天赋。不过我并不特别看重天赋，我认为只有上智下愚天赋才起显著的作用，一般人他们的成长主要靠自己努力，事实上，我的部下中有比较多的强兵我就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领导对于自己下级真才实学的培养，我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的培养，那就是领导同时起一个导师的作用。导师的责任是帮助学生的成长。领导如果能起导师的作用，他就可以在直接培养下级的才能上起作用。还有一个方面是间接的培养，为下级的进步创造领导者所能左右的条件。

就我的情况来说，直接的工作是做过一点的，比如我在理论处工作时曾给我的部下系统地讲过《资本论》中的地租理论等等。在科学处工作时我还提出一个“论科学”（用现在的语言就是“科学学”）的题目同部下们一起进行研究。

在间接培养方面我倒有些体会可以说一下的。我有几条“指导思想”：

一是我没有论资排辈的思想。哪个部下从他才能来说适合于做什么，我就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工作的机会多，他们得到的锻炼就多。在他们取得成绩后，得到的鼓励就多，自己就更有信心，学习就更努力，进步当然就越快。我这样做自己觉得很自然，没想到在反右派斗争中就给我戴上提倡“马家驹道路”、“龚育之方向”的帽子。不过我自己并没有认错。

二是我放手让年轻人工作。本来也许要我自己去做或者要我具体指导的工作，我常常交给年轻人，甚至交给到我那个单位不久的年轻人来做。这样做的结果一般都好，他们接受这样比较重要的任务之后，都兢兢业业花很多功夫去做。他们的工作单纯，可以对一件工作专心致志地去做，这一点我自己反而做不到。当我放手让他们工作取得比较好的成就之后，他们很高兴，我自己也就省力。我乐得偷懒。我身兼中央宣传部和国家科委两个单位的工作，还业余写了不少文章，与偷懒这一条是有关的。

三是，也许是最主要的，那就是我不干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使他们有最大的自由。那时我还不知道马克思说过“自由是创造的前提”这样的话，不过我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了这一点。我自己喜欢自由，我也就认为不要妨碍别人的自由。这一条也可以概括成为不管或者少管。我认为，不做妨碍别人进步的事，对于年轻人的培养，是最低限度要做到的。

尽管在直接培养和间接培养方面，我都做了一些自己该做的事。但是话又要说回来，还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而且还有一条，他们的底子本来就比较好。比如对有一个“部下”的挑选，是我请某大学的校党委为我召开了一个优秀的应届生的座谈会。我主持的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就职考试，

经过这个座谈会，我从中挑选我认为水平最好的。当时那些学生并不知道我的本意，后来当然完全明白了。又比如有一位在未成为我的部下之前，也就是在他还是大学生时，就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有较好水平的文章，而且已经在为出版社编辑颇有价值的资料书。当然大多数是到了我负责的那个机构后，他们的才能才逐渐被我发现的。我用“发现”这样的字眼，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已经存在在那里，我只是对它们有了认识罢了。

我一向认为，在青年人中可造之材是很多的。许许多多青年人都可能成为有很高才能的人，可是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压抑甚至打击。这种看不见的损失对于社会进步妨碍极大。大范围的事我作不了主，但是在我能够作主的小范围内，我决不妨碍他们的成长。

1994年1月2日

悼老刘

想写老刘，应该写老刘，可是我又怕写老刘。由于怕写，他去世已经一年了，我还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做这件事我有说不出的一种难受。

自己年老了，许多朋友们老了，几乎每个月都会接到一张讣告。老朋友、老熟人走了，总会引起一阵惋惜和悲痛。但是像老刘多年一直是我身边的人，还不到六十岁，去世前几天还见面，没有几天，好端端的一个人忽然没有了，怎能不十分悲痛——不只是一般的悲痛，而是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是1965年把他从哈尔滨工大调到身边的。1964年聂总为了工作的便利，决定要中央科学小组中专门从事科学工作的两个成员——张劲夫和我，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参加科委党组。聂总没有要张劲夫在科委内分工抓具体工作，科委也没有为张劲夫配备秘书。聂总除了要我像张劲夫那样在党组内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外，还要我分工管医药卫生和新闻出版两个局，因此为我配备秘书。那时我还打算抓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工作，因此特地请李昌同志为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物色一名学技术经济专业的青年党员教师。老刘来了——他的名字叫刘与任。老刘的行政关系和组织关系就在科委。他来帮助我处理科委两个局的工作和同我一起研究技术经济的问题。由于我的屁股还坐在中宣部，所以他经常去沙滩我的家。

他到北京后只有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除了被叫回科委挨了几场斗，就没有再去科委机关。老刘也不可能再做我的秘书了。他在文革中在科委没有工作，呆了四年，1971年后调往计量科学院。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时，他正在这个院力学教研室工作，很快就找到了我。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小卜来看我，充满着喜悦。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北京居民正在进行热烈庆祝的那一天，老刘家中发生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那天下午小卜才从父母家回到自己家里做饭等待老刘下班回家时，流窜犯（看来不止一个）进了家门，用刀子把她杀害了。老刘下班回家，开门进去看到这个情景，他受到的刺激和悲伤那是无法形容的。我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赶到凶手杀人现场，小卜的尸体还没有移动，把她绑在床上的绳子还没有解开。那个惨象至今似乎还在眼前。这件残暴杀人的案件发生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北京市公安局尽了最大的努力，至今没有破案。

1977年我重新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后，就找到老刘，要他继续当我的秘书。我想老朋友在一起工作定会相处得很好。我一提出，他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这次我到科委，并没有要我分管任何一个局，而是要我以科委名义联系中国科协。还有，方毅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自然辩证法方面的事让于光远负责。”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成立，还得到小平同志的亲自批准。我很喜欢这样来分配我的工作。对中国科协和它下属的各个学会的各方面工作我都有兴趣。同时这个工作对我特别热心的技术经济、管理现代化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工作，也能提供方便。这两项工作都列为国家科技长远规划的项目，都建立了国家科委的“专业组”。

这次老刘回到我身边工作，我和老刘都很高兴。从1965年第一次到我身边工作，到这次来，十二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初来北京时不到三十岁，如今四十都出头了，他正从青年向中年迈进。他当然比十二年前老练了许多，我也希望他能担负起更多的工作。在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专业组中他担任了秘书。那几年我发起成立了许多全国性的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等。在这几个研究会中我是理事长或者会长，他就担任了副秘书长或秘书长和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他为这些学会的创建及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代表这些学会，担任过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执行主席。1981年我提出在北京组织常设的战略座谈会。后来这个座谈会发展成为每两个月用一周的时间讨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双月经济活动周”。在这一周中，星期一讨论全国性的战略，星期二、三讨论各地区战略，星期四由我作一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讲座，星期五讨论部门战略，星期六举行国土经济报告会。这个活动准时举行了好几年。每次活动老刘都参加，特别是那个国土经济学报告会，则是由他主要负责去组织和安排。他还帮助我去一个一个地创办《经济效益报》。当时我设想用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的报名各办一种。红版主要报道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效益的状况，先在北京出版。接着办了蓝版，主要报道工业生产中的经济效益状况，在沈阳出版；绿版主要报道和讨论外向性经济中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在福州出版；青版报道城市经济工作中的经济效益问题，在成都出版。红版办了好几年，蓝版和绿版也办了好几期，青版没有办下去。还与安徽商量办一个黄版，报道乡镇工业中的经济效益问题。并且准备在北京再办一个紫版，把有关经济效益的理论问题从红版中抽出来专门办一张报纸。这些事都是老刘主要负责去张罗，所以我写他“一个一个地”创办《经济效益报》。他是《经济效益报》社的社长。

那时我为了研究国土经济问题，跑遍了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只有西藏和台湾两省（区）没有去，几乎老刘都陪着我。各地的人都知道老刘是我得力的助手。此外他对自己的家乡——江苏、安徽、山东三省交界的那个地区的建设特别关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老刘写了不少文章和若干本著作。在我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中国经济大辞典》中也分担了若干部分。他既作组织工作又从事写作。工作态度是切实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我的许许多多事都依靠他。但我还应该说，有些工作是老刘抓而我并没有具体地搞的，如关于土地复垦、成本研究等。

1982年党的十二大后，我从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职务上退下来之后，他已经不再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岗位在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可是以上

说的工作有不少就是在他已不担任我的秘书的时候帮助我做的，所以说他仍不是我的秘书的秘书。

后来他和小董结婚。小董对他很好，很体谅他，给了他很多帮助。他的情绪总算稳定下来。后几年老刘能做这么多的工作，是和小董的帮助分不开的。站在我的立场上我对小董是很感谢的。

老刘是个非常朴实、非常正直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太老实了，有一些人就欺骗他、欺侮他，他受了好些人的气。有些本来应该支持、帮助他的人反而拆他的台，使他有些工作办不下去。他也不善于同许多不很讲道理的人打交道。好几笔应该由他支配的经费被人占用了，本来应该由他使用的房屋、汽车也被占用了，收不回来。他不善于对付这些人，特别不善于用法律手段来对付这样的事，当然打官司这样的事也很难办。他打赢了一场官司，可是经济上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些事至今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对这样的事，当时我有些着急，看他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对他发急。有时我的态度很不好。他看我发急，怕我生气坏了身体，不及时告诉我，我知道后又生他的气。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可有时就是忍不住。我一直想对他承认自己不对，但是没有来得及做。他逝世后我特别难过也有这个原因在内。

老刘老得比较快，头发脱落、心脏血管都有病。我觉得他自从受到小卜惨遭杀害的打击后，精神上受到不小损伤。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不应对他发急。我还觉得他跟了我许多年，他所在的单位的领导并不很了解他，而我对身边人只知道使用，什么级别待遇等问题，我自己不注意也不关心别人。有一次我想到了，才约宋健同志到我家来介绍老刘的情况，希望他了解老刘。宋健同志很同情他，回去后研究了他的问题。后来他调去《科技日报》，最后当上副主编，老刘的心情又愉快了一些。他就是在《科技日报》副主编的岗位上逝世的。

我怕写这样一篇东西，现在写完了，心里多少好过了一些。

林基洲：编译马列 经典著作四十年

林基洲同志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1951年调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译处，那时他才二十二岁。从那时起到1993年六十四岁逝世，有四十二年之久。这四十多年中他一直在这个领域中工作。在《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翻译和定稿中，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我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的工作方法或工作内容之一便是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虽然勉强能读懂原著，但非常吃力，非常之慢，只能在对译文有疑问时，查字典仔细地去推敲琢磨，平时就完全通过中译本去领会原著的意思。这就是说，我完全依靠林基洲等同志的劳动成果来工作，因此，我一直由衷地感谢林基洲等同志的工作。

在阅读和研究这些著作时，我常把这几部《全集》的中译本与我们早期——抗战前在上海、北京或是抗战时期在延安翻译的那些单行本和选集相比，尽管以前的有些译本有个别见长之处，但是总的说来，不仅在意义的准确和文句的流畅方面，后来的译本都好得多，读起来舒服得多。而且编译局

的本子还有一个“全”字，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经典作家著作的全貌，可以从中发现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论述，这也要感谢林基洲等同志的劳绩。

由于中央编译局的成果是许多人在一起共同工作完成的，而且有一整套译校程序，出版时也不署个人姓名，“局外人”很难知道哪些工作是何人做的。但是我知道林基洲对几部全集的工作都积极参加了，而由于他专长俄语，在列宁、斯大林著作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多。特别是《列宁全集》新版六十卷是林基洲精心设计、组织力量翻译，下功夫定稿，经过十五年时间完成的。它的确是列宁文献出版物的精篇，而且是一部由我国的专家自己编成的文集，它不是单纯的翻译工作。由于我过去一直使用的是老版本的《全集》，要查阅或者重读列宁的著作，使用旧版本比使用新版本有某种方便，但是有时也找出新版本与旧版本对照，就常常看到新版本比旧版本有明显的改进。现在我书柜中的那凝聚了林基洲同志大量心血的《列宁全集》新版六十卷是林基洲送给我的珍贵礼物。这里所说的“礼物”有两重意思：第一，它是林基洲向社会（其中我是一分子）奉献的劳动成果的结晶，第二，是在他关怀下把这书送来我家的。他曾几次查对哪几卷我已经收到，哪几卷还没有，使我现有的一本不缺。而且还有这样一件事，在最初送来的第 57 卷中第一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准备材料”和第三页第一部分“在卡·马克思《资本论》各卷上作的有关批注”在装订时颠倒了，林基洲就打电话告诉我此事，并送来了重新装订过的这一卷。

林基洲同志的一生同《列宁全集》是分不开的。怀念他一定要讲《列宁全集》中译本的旧版，尤其是新版。他人走了，《列宁全集》中译本和其他的书仍留在人间。看到这些书我就会想到林基洲。

我和林基洲个人接触不算很多。建国前夕，中央宣传部机关迁到城内大红罗厂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同编译处的同志来往相当密切，我同他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邻近，而且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可是 1950 年机关搬进中南海时，编译处仍在外面，所以 51 年林基洲调到中宣部时我并没有与他见过面。以后他去中央编译局，我同他倒常见面，也常通电话。大都是工作上的联系和有时向他请教。但是他的情况我倒知道不少，我知道他工作特别负责，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对人也特别热情。我一直认为他年纪还轻，可以多做很多工作，没有想到他走得那么突然。最初听到这个噩耗，我和不少同志真有点不相信。后来证实果真如此后，不仅我，还有许多同志都说：“他是个好同志，走得太早，多可惜呀！”时间过得真快，他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

1995 年 1 月 17 日

记胡耀邦好学不倦二三事

耀邦好学是我亲自和他接触中所观察到的。

我和耀邦认识得很早。在延安时就见过面。但成为朋友是从 1975 年我们一起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反对“四人帮”，后来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前天为了查一下材料，在 1939 年 9 月 8 日的延安《新中华报》上看到一个关于在延安举行了国际青年节纪念大会的报道。在这个大会主席团十多人的名单中，有胡耀邦也有我。那一次台上一定见过面。可是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早已完全消失了。我只记得在延安见过他，但记不起是在怎样的场合。

中一起挨批受整开始的。

1976年9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唐山地震涉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这样的挨整的人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6号耀邦家串门，看到他在家中读书的情况，对他的好学有了深刻的印象。

不妨对他那时读书的环境作一些描绘。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檩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办公桌旁学习，桌上有摆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身边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虑。幸而也的确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提到“科学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起草那个文件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早就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一株大毒草”。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看法。这本书我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人把书中直接有关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这次写文章查对了文字）：

-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这是有关“运动”的一件事。

又有一次见面谈的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那一部书是马克思的笔记。其中有一篇马克思写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单行本。在这篇《导言》中，马克思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之间的关系。耀邦见到我兴致勃勃地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1976的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1979年耀邦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时，我想起了那次谈话，使我明白，他那样做，是他本人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是有理论思想做指导的。

地震期间的这两次谈话使我注意到耀邦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后来，我又去了几次富强胡同，我们见面从来不谈工作上的事，总是闲谈。一次他正在看一本薄薄的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递过来一看，是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就找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讲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的考虑，谁要去日本农村，在农村中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94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我又想起由于耀邦推荐而我阅读的吉田茂的这本书。

这个事例，使我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

还有一次也是在他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他还特别写了那个笔画很多的爨字，说这个字不简化，印成比较小的字笔画就很难看清楚。那时我在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发现在“泰族训”和“谗言训”中有意思相同的两段文字。如果抛开一些难认的字、难懂的文言句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大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要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于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通过耀邦引用《淮南子》这一句话的事，我又看到他重视古籍，能够古为今用。

这样的事很多，是写不完的。以后有机会再写吧！

对耀邦好学，了解的人很多，许多老同志对他这一点很赞扬。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拜望我们中央宣传部这位老部长。他对我讲：“毛主席的错误，党中央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之批评了。我的错误也大着哩，没有人批评，只好自己批评。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到大学毕业。那时大多数人年纪还比较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能避免。可是我没有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罪名是“贻误国家大事”。后来再提也没有用了。岁数大了，学不

耀邦当了总书记后搬进了中南海，但是他这座中南海的房子很特别，不是什么这个堂那个堂。不知道中南海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不大像样的房子。没有大厅、没有一进、两进的四合院，而是若干个耳房连在一起的一个院落。不知道以前这些房子是给什么人住的，他搬到中南海后我从来没有再到他家去过，因此没有问过为什么看上了这个地方。我想可能有一条，那就是这个院子在南长街会计司胡同有个大门，有人要找他，可以不必经过中南海东南西北几个警卫森严的大门，这是个与中央领导人接触和同群众接触都很方便的住所。耀邦逝世后我第一次去会计司吊唁，他的灵堂设在那里。

进去了。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只有极少数老干部觉悟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下苦功夫，刻苦学习，有很大长进。这样的人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这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关胡耀邦好学的几句话，同我亲眼所见，完全符合事实。

1994年12月5日

万里家作客归来

1995年春，有一次我去万里家作客。去前我在一张《文摘报》上看到他曾对自己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事说过的四句话。见面后谈话中想起了这件事，就问他报道是否属实。他说：“有这么一回事，前年我说了一下，他们给我登出来了。”他当即念了一遍：“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诸多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同报纸上登出的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句，变成五句，并且作了一些说明：“我现在上午看看报、看看书，朋友来了就聊聊天，吸收一些信息，思考些问题，交流些看法。下午我就去打网球和桥牌了。‘诸多好朋友’就是指我上午这种活动来说的。比如今天你来了，我们就可以东讲西讲。这不是退下来过得很好的一种生活吗？”

我觉得万里这样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很好，他只比我小几个月，但是身体比我好得多，走路动作都很灵便，使我羡慕。打网球的确是一种很好的体育锻炼，可惜我不能去作这种锻炼。我不会打桥牌，不过我知道桥牌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根据我对桥牌的一些知识，我甚至说过“桥牌是牌中之王”。我问他这个看法行不行，他点了点头。我对桥牌还很有兴趣，很想学习一下，等学会之后再那些打桥牌的地方见习见习。我向他提出要求，希望推荐一本适合的书给我。他说可以给两本书，一浅一深。用浅的那本打基础，用深的一本看看现在人们达到的水平。

从万里处回来的第三天，他派人送来了两本书，一本是《美国桥牌学校专用课本——桥牌初级教材》这本书分“入门篇”、“基础篇”、“提高篇”、“复式桥牌课程”，得到这本书之后就放在我的床头，一课一课地看下去，可是看得很慢，只看完了“入门篇”连“基础篇”都没有看完，后来干脆停了下来。但我并不死心，还想学，不过觉得一个人看书，不找别人一起打恐怕是学不会的。因为没有学成，所以以后见面时我就没有再谈桥牌方面的事情。

我去万里家都带我自己的新书给他。只有一次带给他的书不是我写的，而是司马南的《神功内幕》。我知道他是一开头就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司马南的书，可读性强，我看他会有兴趣。

我和万里以前有过一段闲聊的时间，那就是在文革即将结束、他还没有开始担任职务、住在北海公园内漪澜堂后一个院子里的时候。我找他谈谈彼此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对未来中国的展望。不过，后来大家一忙起来就没有时间闲谈了。

朋友间闲谈是一件乐事，万里把他作为退休下来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也有同感。不过我退下来之后有时还是爱发起这件事、那件事，不断出一些新点子。这就需要有人对我发起的那些事情热心，而且往往需要一定的人力物

力。就是由于有了这些“诸多好朋友”的帮助，使我在这几年做成了一些事情。

“诸多好朋友”这句话是我那天在万里家作客回来后开始使用的。

我的秘书小胡

小胡，就是我的秘书胡冀燕。

小胡的个子并不小，有 1.64 米。

小胡的年龄也不小了。到明年秋天该祝贺她五十大寿了。她来当我的秘书时只有三十岁。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她来的时候，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后来去了社会科学院，我的工作换了一个单位，秘书没有换。

小胡的名声也不很小，认识我的人，大都知道我有她这样一个麻利、能干的秘书。她还认识我所不认识的不少人。她有一个电子电话本，记了不知道多少电话号码。

小胡的工作能量也不小。我是一个“瞎热心”、“无事忙”的人，她围着我团团转。她还兼着当代市场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当着那个研究所的家。但是她似乎忙不够。她是个热心人。她常常不惜自己的时间为别人去奔波。她骑了一辆自行车，跑得很快，跑近处比我的汽车快，跑远处她也不那么怕。

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叫她小胡，当然也有叫她胡秘书、胡大姐的，但是她通行的名称还是小胡。恐怕还会一直这样叫下去。

小胡对人的诚恳是没得说的。人家说的话她都相信。信任别人，别人也信任她，她很容易同别人交上朋友。有时我觉得她似乎太容易相信别人，不过她又似乎没有因此吃过亏。

小胡的性格真好。我想得益于遗传和家庭教育的一定不少。她的父亲就是由于实行责任田和包产到户，毛泽东在 1962 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这位同志‘开明’可就是胡开明”的那个胡开明，他是个极其正直的同志。她的妈妈也有一付热心肠。

不能不讲有关小胡的工作态度。她的“任劳”，但不“任怨”。她越想把工作做得好，就越怕出差错，而我的事情那么杂，免不了有时发生一些差错。于是在我俩之间常常发生谁该负责任的问题：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为了弄清责任，常各不相让。互有胜败，多半我败北，责任在我的多，但当责任在她时，我就抓着不放，不让她过分自信。

有时我对她发火。发了火又觉得自己不对。可是有时又忍不住发火，自己管不了自己。后来我想出了个主意，亲自做了一块黄牌，告诉她，如果我在发火时，她可以祭出这张黄牌来警告我，可是那块黄牌在她手里好多年，她一次也没祭出这个法宝。

她能写。有一次，她为《游乐与休闲》第一期写了一篇关于任仲夷是哈尔滨冰灯游园的发明人的文章，她给我看了，我一个字没有改动。那篇文章写得很流畅。她同人合作写过几本书，我认为她还可以多写一点。她的古文底子差一点，最近我写散文，有时舞文弄墨引点古文，用点冷僻的字。有时我用的字是对的，她怀疑是我错了，我就把出处找出来给她看，看到她认输，我很得意。她学过外语，但是后来没有继续坚持学。看到她那么忙，我曾想过给她一点空，去学英语，可是很抱歉，我一直没有给她这个时间。

像她那样的老秘书，周围的人对她的能力、品德和工作态度都是看得到

的，可是许许多多提级都没有她，十一年了，她的级别一直没动。许多人为此鸣不平，我也感到太不公平了，可我没有人事权无可奈何。跟我当秘书也许就会有这种遭遇。她越是安心在我身边工作，我的心情也就越是不安。最近我在医院见到今天社科院当家的副院长，提了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有下文的。

小胡很喜欢逛市场，也喜欢购物。随我去少数民族地区出差，不知她买了多少个绣花的挎包。我想她家一定收藏了不少。她在逛商店时，口袋里有钱就常买点价廉物美的东西回来送人。

她喜欢玩，喜欢看小说，特别喜欢唱歌，唱得也真不错。她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在草原放过四年羊，会骑马，这四年我想对她的性格形成也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辽阔的草原上的生活，对于她的心胸和嗓音我想曾大有好处吧！

作为二十年共事的朋友，关于她还有不少好写的。在这里我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信手写了这篇，没有细想，也不打算在这里细写，就到此打住吧！

两位已故的广东经济学家

记得列宁曾经讲过这样意思的一句话：从组织上说是中央领导地方，但是从经验的角度来说，常常是地方领导中央。意思是说，许多对于全国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常常是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创造出来的，中央则是对地方创造的经验予以肯定，进一步阐发它们的意义，然后运用中央在组织系统中的地位，把地方创造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去。列宁这几句话的意思同毛泽东讲过的“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同一个思想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异曲同工。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包产到户、大包干）这件事，不就是1961年和1979年两次都是安徽的农民创造出来和与农民有联系的安徽省的领导支持的吗？只是第一次由于毛泽东反对，未能推广，而第二次最后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得到了推广，结果对中国的农村经济从而对全国经济起了推动作用吗？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又是广东省的群众首先实行，在广东省领导的支持下，然后经过曲折复杂的过程，最后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才作出在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吗？

广东的经济学家卓炯就是坚决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那时不得不用“商品经济”这样的语言）并很早写出许多论文、在我国经济学界起了首创新作用的一个学者。我不是说在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的经济学界中没有人也比较早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应该承认，卓炯对这种主张阐述得特别鲜明，说话、写文章都很勇敢，因而产生的影响大，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成了一面旗帜。我认为他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得益于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小气候。而在北京，反对商品经济（更不要说市场经济）的势力，要强得多。1982年就有人发起一个对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的批判。这一点有书为证。因此主张实行商品经济的人受到的压力要比卓炯大。可惜的是，那时卓炯的年事已高，当在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这一点取得更多的人们的共识时，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不记得卓炯逝世的年月，也不知道他逝世后出过什么文集（我想一定

有，但我未看到），我只是在另一个广东经济学家孙孺去世后，1989年初要出版孙的文集时，为这部文集写过一个序言。在这个序言中我写道：

对去世学者最好的纪念，是整理出版他的遗著。这种工作既是活着的人对死者的怀念和尊重的一种表示，又可以使死者的劳动和创造发扬光大。我曾多次讲过自己的一个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可以从许多角度下定义，也已经有众多定义，我只是想从一个角度来对文化下定义），那就是：文化是“能够传播开来和世代相传的人类的优秀的创造物”。在这个定义中，我强调两点：一是创造物——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物；二是它的可传播与传联性。学者的著作是一种创造物，而出版物是传播与传联的重要工具。

孙孺同志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从文艺创作转向经济工作，在1958年后又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工作。在他四十多年的辛勤劳动中写过大量的经济学论文。收集在这本集子的就有五十多篇。在他的文集中也有若干篇是主张在我国要发展商品经济或者为此间接提供论据的。一门学问的发展总是靠学者的共同创造，将创造物互相交流，互相启发，经过总结，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再在这个新的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创造……。不能轻视和忽视每一个创造性观点的提出和发挥。从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孙孺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到他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他的创造性的思维。作为他的同行和多年的老朋友，我祝愿这个集子的早日出版和希望它作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思想资料受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我为卓炯的文集写序，我会更高地对他的成就作出评价。

忆夏公

我是《包身工》三十年代的读者。这篇作品在1936年《光明杂志》创刊号上一发表，我就以很高的热情阅读了它。它是我读到的最早、也是直到现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篇“报告文学”。说来惭愧，“报告”也可以成为“文学”这件事，也是读了《包身工》之后才知道的。

1925年我十岁，在一位老师的指引下参加了“五卅”后小学生上街为罢工工人募捐的活动，那时我对工人就很同情。“一二·九”后在上海也曾去浦东陆家嘴工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作过几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宣传。但是对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的了解是很抽象的。夏衍的这篇作品，对“包身工”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使我深受感动，也为我提供了在工人中作宣传的资料。也就在读了这篇报告文学后，夏衍这个名字，在我心目中有了很高的位置。

1937年初，一个偶然的原因使我看到一大包W.W.的文件，并且知道W.W.就是“文”“委”两字北方话拉丁化的字头，但不知道夏就是它的领导人之一。93年一次去夏公家里，他对我说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中只字未提党中央机关被破坏后仍在上海坚持工作的文委。对此，他有意见。他说文委虽然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但仍然做了大量很有意义的工作，当时上海的电影、戏剧、音乐、诗歌、小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宣传……等等，为“一二·九”运动作了某种思想准备，以后又有力地支持了“一二·九”运动在全国的继续展开。作为“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我完全赞同夏公的这个看法。

在全国解放前，我同夏衍同志没有见过面。建国后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他常到中宣部开会，我才认识他。但是文艺工作另有其他的处分管，我本人又不是文艺界人，因而同他仍旧没有什么接触。直到 1982 年十二大后，我和他在中顾委同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时，才经常见面，因而能够在会上会下听到他不少精辟的见解。

我进中顾委时是六十七岁，算不上老人。我认识到和智慧老人接触，聆听他们的议论，会得益甚多。自从 1978 年跟随李一氓同志访问南斯拉夫以后，北牌坊他的住宅就成了我常去坐一坐的地方。夏公因为“超龄”，十三大后离开中顾委，平时开会见面的机会就没有了。过一段时间我也要去一趟大六部口他的家。我去时从不事先电话联系，敲开大门迳直到他那间小书室。好在他很少出门，每次去都不扑空，总可以见到他坐在那个老座位上。我注意到除非还有别的旁人，夏公手边总有一本正在看的书。我们谈话的时间一般都不短。他的观点总是那么鲜明，头脑总是那么敏捷，对国内外大事也总是那么关心。夏公虽已有九十高龄，行动又很不方便，而知道的“天下事”可真不少。而且很多事知道得很具体，完全没有老年人常见的闭目塞听的情形。我感到他有一种使人喜欢接近他、向他反映情况、倾诉衷情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又来源于密切联系群众和坦诚与别人交换意见的作风。

夏公的身体真使人羡慕。他一生没有动过手术，还有一副好牙齿，从来不去找牙科大夫。平时很少生病，我常去医院就没有遇见过他。他耳朵也不聋，我比他小十五岁，在同他谈话时有时因未听清楚要再问他一遍，真不好意思，许多地方他都比年纪较轻的人强。要不是造反派在文革中把他的腿打成残废，他若能够行走自如，全身的健康状况还会更好。

94 年初有一天，我在医院出乎意料之外地见他坐在轮椅上，他告诉我正在拉肚子。不久之后我去大六部口探视，又听家人说他住进了医院，真为他的健康耽心。没过多长时间，正想去医院探视，又有人告诉我他已经出院。于是 94 年 3 月 15 日我就前去他家探望。那天同去的还有郑仲兵和方小宁。这次他是在大厅见我们的。见到他病了一场还那么精神，真让人高兴。我们怕他累着，没有让他多说，但是他还是讲了一些话，并不显得疲惫。我想到从来没同他合影过，方小宁带有相机，就在那里拍摄了几张。没有想到那天在他大厅的“再见”成了永别。夏公生于 1900 年，与世纪同寿，照他的身体可以活到 2000 年，跨入新世纪，可是现在就离我们而去了。他的逝世并非生了疑难病，而是毕竟年龄太高，经不起像感冒这样并不严重的疾病的袭击。

夏公人走了，但是他创造的珍贵的精神财富会永远留在人间。他的高尚的人格，严谨的创作态度，为社会进步奉献自己的思想，直到逝世前不久的几年中对社会上各种旨在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热情支持的精神以及他的优秀作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95 年 2 月 14 日

《懒寻旧梦录》中关于 “上海文委”叙述的索引

夏衍同志生平中，提到他在三十年代是“上海文委”成员。细心的人会问：“这个文委究竟属于哪个党委，为何不说清楚。”与此有关情况，今天亲知者很多已经过世，但还有许多人健在，而且从夏衍同志本人写的《懒寻

旧梦录》中也可以看得明白。现在我把此书中的有关文字作了一个索引，也许对读者有点用处。括号中的数字即该书页码。

一、文委 1929 年成立，直属党中央宣传部，书记潘汉年（143），李一氓、吴亮平、杨贤江是成员（157），夏衍不是。但 1930 年 7 月“美联”成立时要他代表文委出席（175）。1931 年 1 月潘离开文委，书记改为冯雪峰（190，203），1931 年中央决定瞿秋白领导上海一带文化工作（202），瞿参加了 1931 年夏举行的文委扩大会议（203）。

二、1932 年夏成为文委成员（176，212）。1932 年党中央机关迁去苏区，成立上海中央局（临时中央）（206）。瞿冯去苏区后，文委可能由中央局或江苏省委宣传部代管。此时书记是阳翰笙（260）。1935 年上海中央局三次大破坏，文委书记阳翰笙，成员田汉、杜国庠被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夏衍和周扬（274—277）。

三、1935 年 2 月第三次大破坏三个月后，夏衍、周扬、钱亦石见面讨论文委失去了与中央联系后的问题，提出重建文委（288，289）。1935 年 10 月上旬，周扬、夏衍、钱亦石、章汉夫、吴敏重建文委。推周扬为书记，成员为周扬、章汉夫、夏衍、钱亦石、吴敏。由于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决定新成立的“文委”只是临时性的，待江苏省委重建或与中央取得联系后请示追认或改组。文委分工：周抓总，仍兼左联党团书记，章、钱领导社联，夏分管电影、戏剧、音乐（292）。1935 年 10 月下旬看到《八一宣言》后，文委考虑过所属各盟的组织形式问题，但还没有解散“左联”“社联”的想法（296）。1936 年 4 月冯雪峰回上海，6 月与夏、周见面，但避谈“文委”问题（313—316）。新的文委成立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 1936 年 11 月鲁迅逝世文委为保证出殡安全所作的工作（338，339）。

四、西安事变后的 1937 年上半年，文委用很多时间在救国会及其所属各团体的分组织宣传工作上（355）。1937 年 6 月潘汉年回上海见夏，夏问潘“中央对文委和所属的各盟一百几十个党员以及他们这几年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或者“说得坦率一点，就是承认不承认他们在为党工作？”潘说“谁说不承认你们？”“今天我找你也是中央几个同志的意思”。同时潘提出要考虑在新形势下文委解散的问题（363—368）。

五、抗战后再不提文委的问题，1937 年 7 月 10 日周恩来到上海见夏衍，要夏注意做统战工作（370—374）。8 月 2 日潘汉年引夏见郭沫若，要夏做郭的助手（377），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在上海办《救亡日报》（8 月 25 日创刊）（381），上海沦陷前夕，要夏去广州，在广州办《救亡日报》。

按照这个索引去看《懒寻旧梦录》，三十年代文委虽然是个比较复杂一些的事物，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1995 年 2 月 20 日

记程子华的一件轶事

程子华同志在 1991 年 3 月 30 日去世，到现在有十个月了，在同他遗体告别那一天，我正好不在北京，没有能去八宝山，而我本来是想去参加这个仪式的。他比我大十来岁，建国后他在北京工作，我同他有过不少次接触。在会上听过他多次发言。十二大后，中央召开全会，中顾委委员列席。编组

时，几次他都是我们小组的召集人。中顾委常委中他的姓氏笔画最多，非常委的委员中，我的姓氏笔画最少，因此开大会时座位相邻，开会前总要交谈一会儿。我和他没有很多交往，他是我的前辈。在我印象中他有很好的务实精神，不喜欢夸夸其谈，发言有水平，同时感到他对人诚恳厚道，总是那么和善。我没有见过他一次疾言厉色。1990年上半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好，可是年底开七中全会时，他还是照样坐在我的旁边。没有想到过不很久，他去世的噩耗传到我这儿来了。在他去世之后，我总放不下要写一篇怀念他的短文的念头。我了解一段关于他注意研究列宁《全俄电气化计划》，推动出版这部科学著作的事迹，觉得应该把它写下来，让他的亲人和一些经济学界的朋友知道。三个多月之前，也就是1991年9月份，我去了一趟辽宁——先是接受何万龄局长的邀请去锦州，访问两锦电业局，参观了它所属的某些单位，后又应赵希正局长的邀请到沈阳与东北电业局的同志座谈。这使我又想起列宁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和程子华同志，更促使我把在1991年春季就想写的那篇文章写出来。

关于程子华同志与《全俄电气化计划》有关的事迹我是怎样接触到的呢？

1980年6月，那时我正在研究我国计划工作的一些问题。1979年我开始形成一个观点，那就是应该在我国开展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于是我同一些同志商量，由北京几个单位联合召开一个每两个月一次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并且在1981年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个座谈会不间断地坚持了八年多，中间还增加了几次，一共举行了五十多次）。这时我就考虑一个计划体系的问题。我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具体的计划，总的说来都属于计划的范畴，都是对未来发展目标的预期和谋划。战略一般是根据全局性质的情况，提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要达到的发展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所采取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方向。规划是对未来发展目标所作的带有理想性质的、基础性质的预计、预测和建议、方案体系。而具体的计划是把所要做的事情的具体内容、步骤和方法确定下来，按照计划的进度付之实施。这时候我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体系所有的计划当然都应该具有科学性，但其中有一些会具有比较多的法令的性质，具有行政上的权威，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对它服从的责任，而另外一些，也许只有一部科学著作，它只有科学上的权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重读了列宁在1920年发表关于《全俄电气化计划》的许多论述，并且产生出一个念头，想了解一下《全俄电气化计划》究竟是怎样的一部著作。我从列宁的论述中知道，当时这个计划已经作为一本书出版和发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以为没有中译本，我只想找到原文的著作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基本内容是什么。正在这时候，我听说电力工业出版社出了这部书的中译本，我就想弄到一本。于是我就去电力工业出版社的门市部去买。到那里一问，这本书只印了2800册，书架上已经没有了。后来不记得谁告诉我，这本书是程子华同志建议出版的，于是我就想通过他弄到这本书。我给子华同志打电话，说我想去他家见他。因为求书心切，我很快就到了北长安街40号。

那一次我们谈话的主题就是计划体系。从1949年起，子华同志做过山西省委书记，做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和商业部长，做过国家计委副主任等等，他对计划工作是很熟悉的。我就向他请教。在我谈起列宁主持编制《全俄电气化计划》这段历史时，他就讲了自己研究这段历史后的想法。他说这个计划虽然只是一部科学著作，但是起的作用很大。这个计划中提出的各项

指标，到 1930 年提前完成。斯大林主持下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 1928 年准备，在 1929 年 2 月苏联共产党第 16 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的。这个计划所根据的指导思想主要也来自这个《全俄电气化计划》。子华同志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人冠之以斯大林的名字，这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讲，应该在前面加上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的名字。他对我提出的关于计划体系的想法表示赞成。我们议论了列宁在组织这个计划的编制工作时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他强调指出，列宁早在国内战争尚未结束的恶劣环境下就着手制定苏俄的发展计划，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我则特别欣赏当时列宁没有把这个工作当作一项行政工作交给政府部门去做，而是把它当作一项科学工作，组织二百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去编写，让科学家们来承担制定国家长期计划的任务，使国家长期计划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当时负责编制全俄电气化计划日常工作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虽然担任着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但是当时苏联的计委不像后来的计委有这么大的权力，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本人也是一个科学家，他主要是以科学家的身份从事这个计划的编制工作的。我们讲起列宁说过的计划工作的危险莫过于把国家计划问题官僚主义化这样的话，我们还议论到在这个计划编制好了之后，列宁如何赞扬它是一部“浩繁的——并且是卓越的——科学著作”，是“经济创举中的第一个步骤”，要求政府和工会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广泛宣传这个计划，要求各个省的县的图书馆都要有这部计划和这部计划的参考书，要求学校都学习这个计划等。我们两个人都认为，列宁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是值得重视的。对于这一点，在那天谈话时我回忆说，1956 年我国制定 12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就是这么做的，效果也是好的。那天在子华同志家的谈话中，我还对子华同志介绍了 1965 年在国家科委党组曾经讨论过列宁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当时在国家科委党组会议上，我讲，列宁这句话的根本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实现一要靠先进的上层建筑，二是靠先进的生产力。列宁当时所知道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便是电气化。所以提议编制的便是“电气化计划”。我认为这句话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

那一天我们议论的内容不少，我记得清楚的，主要是这些。

在谈话时，他告诉我他是怎么同翻译这部书发生关系的。他讲了这段事情的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在中央党校阅读列宁著作时，对列宁提出编制“全俄电气化计划”这件事发生了兴趣，知道当时在俄国把这个计划作为一部科学著作出版发行。在他了解到没有这部书的中译本之后，就向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去借。编译局图书馆因为它是孤本，按规定是不出借的。但是因为是子华同志要的，就破例借给他了。借到后子华同志一看，并不是《全俄电气化计划》，而是《列宁论全俄电气化计划》，后来他才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借到这本书。然后他就请电力工业出版社组织力量进行翻译。这个计划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俄电气化计划总论》，第二部分是八个经济大区的电气化计划。经他与出版社研究，因为书的篇幅太长，同时各大经济区的电气化计划所考虑的原则和方面大体相似，所以只保留了北方区和中央工业区的电气化计划部分。对这两个大区的计划，在列宁的著作中有所评论，其余六个经济大区就从略了。可是即使作了删略之后，这部书的中译本仍有 36 万字。这 36 万字中总论的篇幅占有 20 万字左右。子华同志对出书的情况的确很熟悉。经我提出要求，他答应我的请求，告我去找出版社的张彬同志，他也为我打了个招呼，于是很快我就收到出版社资料室 7 月 3 日给我寄来的

这部书。

这一段事，我想至少当时在电力工业出版社的同志一定会记得很清楚，而且可以对我所讲的作补充和修正。但是恐怕只有我会特别重视这一段事迹，在今天把当时我们谈话的情况追记下来。我写这一段事情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我希望有更多的领导同志能亲自做些科学研究和直接关心出版事业。如果那样，科学界和出版界会对他们深深感谢的。

李冰封的风格

我认识李冰封很晚。八四年起我在湖南一连出了好几本书。他是出版局长，在长沙见过几次面。后来我对他的思想、他的人格，有了理解，成了我的朋友。

1994年海南一个出版社出了《李冰封散文随笔初集》，冰封赠送了我一本，扉页上作者写的赠书日期是“甲戌暮春”，得到后放在床头，到了“暮夏”才看完。看完之后，通过这些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文格”，使我对他的思想和人格的理解又深了一层。

我对文艺一行很生疏，在阅读他关于梁宗岱、魏猛克、萧红、丁玲这些人的文字时，我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着眼，而冰封在写作时是带着浓厚感情的。我提倡建立和发展中国国土经济学，呼吁关心保护开发祖国大好河山，为此我跑了许多省、地、县。冰封所写的那些游记中描绘的那些地方，除了“凤凰”这座美丽的山城外我都到过。只是我的“形象思维”太差，未能有他那种对美的领略。他对景物写得很好，唤起我对那些地方的回忆。在游记中注入他对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的热爱，提高我国居民文化素质及对自然界与文物被破坏的忧虑。冰封大学进的是中文系，长期做文化工作，是文化人中的官员，官员中的文化人。这本书充满着文化的气息。

冰封这本书收入的文章，半数略强是他离休后写的。他丝毫没有因为有人说他这样那样而有消极情绪，而是一如既往。书中引用了陆游的《书愤》：“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来赞扬湖南籍的一些老同志创办“老战士林场”的壮举。在1991年7月冰封写这篇七千字的散文时，恐怕也以此自勉吧。

在这本书中我选读三篇关于“厕所文化”的散文。第一篇是《日本的厕所文化》。这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深圳“锦绣中华”邀请作者到该景点参观，并告诉作者他们正倡导“洗手间文化”，锐意赶上日本。李冰封访问后，又写了一篇《联想》，并把在“锦绣中华”向场务部职工所作讲演整理成文，题为《关于厕所文化》。

我没有读过专门正面提倡尤其是阐述“厕所文化”的文字。在《日本的厕所文化》一文中，李冰封写自己在日本九天，没有到过一处不像样的厕所。他不但赞扬了日航、新干线、大饭店，也赞扬他去过的的小街上总共只有四五张桌子的小餐馆的厕所，那里明亮洁净、格调高雅，“给人以难以言传的美感”。作者认为，厕所是每天必去若干次的地方，如果充塞着肮脏愚昧、萎靡不振的气氛，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会发生“负面”的影响。他文中引述了周作人《苦竹杂记》介绍日本作家谷崎润一谈到厕所的一节文字，然后写道：“在我读到的文字中，把厕所写得富有诗情、充满画意的，恐怕算是第一。”并做出判断：“一个国家要把厕所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弄好，对人们审美观

念的充实和提高，也十分重要。”李冰封在日本对这个国家的厕所文化有了深刻的体会之后，回到北京，住在东三环的一家招待所，招待所里厕所很脏，他只得去找街上还勉强蹲得下去的厕所。在从北京到长沙的软席卧铺车厢，他又不得不摸黑上厕所。

读了这三篇随笔，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向许多城市当局、单位负责人和居民们推荐这三篇散文。李冰封是个散文作家，文字写得很好，我想读者是会喜欢这三篇文章的。最好能找到作者的文章直接阅读。考虑到买书的困难，我只好作上面所写的那样简单的介绍。

李锐在为这本书作序中写了一段“评语”：“他的文章，言之有物，读后总要引起一些思索，注重文采，却又并不做作，我喜欢这种风格。”读后我有同感。

致廖冰兄

冰兄：

你是漫画大师、诗文高手。对“画”我甘心落后于小学生终身，“文”奢望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但思想上的共鸣，克服了你我之间文艺水平的悬殊。由于你为拙作配画，两人的名字得在《羊城》上并列，喜出意外。但其中有规律可寻。半小时前，与穗地友人边就餐边谈《我看冰兄》。从我们共同的朋友二牧的文字中，又得知我与你还是“哈哈大笑”和“大声公”的同性格者。成为朋友，何必一定要先晤面？你赠书时自称为弟，我赠

1993年3月2日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廖冰兄为拙作《碎思录》配的一幅画，发表在《羊城晚报·花地》上。内容是把一座宝鼎作为便池放在很脏的角落。把这样的画来配我的《识贵知珍》一文当然是非常合适的。见了此画我非常高兴。接着三、四两月的羊城晚报陆续发表了他画的四幅画《自由是创造的前提》、《有我》、《鄙蛮祛愚》和《他不是气象学家》。在1993年3月17日羊城晚报还同时发表了杜埃和林彬写的《漫画大师冰兄和他的画》。文中指出“漫画是美术创作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画种，特别配合报刊，具有特别的战斗性、时代性。它犹如文学中的杂文，以其匕首投枪般的嘻笑怒骂，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廖冰兄的漫画更是如此”。在五月份我以得到他惠赠的《我看冰兄》一书，读后对冰兄的人品、性格更十分钦佩。于是就冒昧写了这封称兄道弟的信给他。

冰兄除构诗作画外，常在画旁题有尖锐深刻的字句。6月29日他在为拙作《开》配了一幅“坛中人”。他在坛里歌唱：“坛里生活好/坛里生活好/蹲在坛里生活就是呱呱叫/耳不听/目不睹/坛外世界乌烟瘴气糟透了/世界只有这里好！”7月27日他用来配《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时的画，是一个把脑子端在盘子里跪呈给人的人，所题的字是“齐批我脑毒根深/既害自身更害群/主动缴交求免祸/无思无想做良民。”并且写了一句“数十年前有此腹稿/今录之呈光远兄求正。”写此信时冰兄诗文未能多读，仅这些为拙作所配的画所题之字，就可以看得出他不仅是漫画大师，而且是诗文老手。

必须说明这里所说之“文”，只限于散文、随笔和我称之为“超短文”那样的东西。我不会写的东西太多了，小说、诗歌、剧本等等都不会。我正在努力争取当“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期望值只是希望思想上能够保持不时出一新思想而不发生文思枯竭的状况，在文字技巧有所提高。对一名“新秀”本来就不能要求过高，就是文坛小将都是想从他们那里多学一些东西，像冰兄那样早已在二十世纪成为老将的人更是我的师辈。

指冯牧和牧惠。这里说的“文字”是他们两位在《我看冰兄》所写的文章。冯牧不幸在这几年中逝世了。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尚未与冰兄晤面，故有此语。不久1993年12月我有一次去广州同他见了面。蒙赠1984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冰兄漫画——1932-82年作品选》。以后我去广州一有机会就见面，1995年3

你《碎思录》时，称你为兄。如此称兄道弟，兄意如何？

于光远

1993年5月26日

老烈其人

哪儿有老烈，哪儿的气氛就活跃，哪儿的人们就过得很开心。

能使人们开心的人，是很可爱的。我认为单凭这一点，就应该给这样的人颁发奖章、挂在胸前。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就是要使大家过得愉快吗？

我觉得像老烈的人是不多的。

少年上过初中、二十岁左右参军、当过武工队的侦察员和文书、当过情报参谋和保卫干事、即长期在基层工作，后来成为作家的，就我所知，是有一些的。因为这样的经历，会使一个人能够深切地了解到基层人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语言情感，掌握他们的心理活动，这对于有一定写作能力的青年来说，是写小说和诗歌的一种有利条件。但是作为作家，老烈的主要成就却不是小说和诗歌上，而是在杂文上。像老烈这样的作家，我想也会有，但我认识的人中却只有老烈一个人。

他也是在长期工作中刻苦学习才成为作家的。我不了解他在什么时候、怎样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似乎也没有写过多少这方面的文章，我是从他对中国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看，他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的。这是做一个好的杂文家必须具备的。而老烈的杂文爱憎分明，加上他几十年中不断增进各种有用的知识，写了不少具有战斗性、说服力强的文章出来。老烈也知道写杂文的尖锐性，他写道“杂文是不受欢迎的，写杂文的人当然也就是不受欢迎的人。谁见杂文作家有好下场？有的还不得善终。不知怎么搞的，阴差阳错，我竟走上这条路，还一条路跑到黑，至今四十载。”这话是1993年8月写的。

我认识老烈很迟，直到1993年才在广州第一次见面。他在1958年就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但是我在文革前不关心文艺工作，因此老烈的文章一篇没有读过，人也没有见过。见面后，给我的印象是，老烈是个透明度很高的人，有东北大汉非常豪爽的性格。而且他善于做“自我形象设计”。第一次见面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自称“员外”。上面有他请到的名画家给他画的一个素描头像，他自己又写了这么四句自我介绍：“辽西老兵，岭南客子，东山闲人，粤北学士。”前八字其义甚显，对后八字作了口头解释：一、那时他家住在广州东山区，是闲人一个。二、文革中去韶关干校，此校别称粤北大学，老烈说他生平只上过这一所“大学”，想用这个“大学”的学位抬高一下自己。他很健谈，用幽默的语言介绍他的特点——当然也不无夸张的言辞。

我发现他堪称不搞“西化”的模范。他有兴趣的、身体力行的东西，同现在人们提倡的“弘扬民族传统”的精神完美地一致。我没有听他议论过西方文学、西方音乐、西洋绘画，没听他唱过一首卡拉OK，吐出一个洋字，也

月他又赠我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漫画书系——廖冰兄卷》他说那一本是此书的“错体版”。冰兄讲此版“错漏多，待再版时改正”。（写这五条注的时间是1996年9月11日）

没有看过他跳交际舞或者迪斯科。他只搞中国书法、中国画，……一切都是东方的。唯一我怀疑他那么嗜酒，在没有中国酒时洋酒他喝不喝？不过我的确没有见过他喝洋酒。

可是老烈并不赞成“反对西化”这种口号，反对不分糟粕精华、只要是东方的东西都是好的观点。比如对有人不把作为体育锻炼的真气功和用来骗人害人的伪气功——包括“发功”、“外功”等严格区分，一律都称为东方文化优秀传统，老烈就坚决反对。不少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人，宣传他们能隔墙看物，或者可以看到人的内脏。老烈的身体是很特殊的，他的内脏完全左右错位：心在右侧，脾脏在右侧，而肝脏则在左侧。老烈是个很直爽的人，但对这些江湖骗子并不是没有警惕。有一次他们到他家里向他宣传，他只是给他们打哈哈，一句他们可以利用的话不说，也不给他们提供任何信息，最后要他“看病”指出他内脏的毛病时，那些家伙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体的特点，因此把老烈胸腔、腹腔中颠倒的内脏又给颠倒了过来，完全露了馅。

老烈嗜酒。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他写有这么一句“问我生平功业：三红、三黑、三白”。三红（共产党、八路军、贫下中农），说的是他的真正的政治品质、革命经历；三黑（黑秀才，黑笔杆，黑爪牙），说的是别人对他的诬蔑；三白（白喝、白吃、白拿），最后这三句是关于酒的。老烈这个穷知识分子，那里有这么多的钱沽酒？好在他的朋友多，有喝酒的机会就把他约上，他也乐意前去。喝酒要有下酒物，白喝的同时也就必须白吃。席上的酒如未喝完，不妨也“打包”带回，又加上一条白拿。

我对酒没有嗜好，但我对酒文化有兴趣。去年写了一篇《我的酒量》，寄给他看，得到他的称赞，送去《羊城晚报》休闲版发表。接着我又寄他三篇，他也都拿去发表了。他说以后我的酒著，他都包了，为我联系发表事宜。后来我同湖南长沙《湘泉之友》这个专门的酒报建立了直接联系。不过我还是想敦请老烈做我在广州的酒著总代表。

他还有一个嗜好，而且自认为具有专家资格，那就是京戏。1993年有一次我去广州，老烈给了我一本他编著的《诗文会》，回到北京翻开一看，第一个反应便是作者“赠非其人”。我是一个从来不看京戏的人，我嫌它的节奏太慢：主角出场，唱腔里先行作一番自我介绍，接着再来一段说白，还是那几句话。特别是起霸，一个个上台，一个一个作一番动作，我这个急性子实在忍耐不住，加上全家都是我这一派，看电视选频道，从不发生矛盾。岭南美术出版社印得这么精美的这本《诗文会》书，送给我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真是可惜。

朋友们的书，与其他人的书不同，还是想看一看，以增进对朋友的了解，书放在床头，三十多出戏都看了，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看出了趣味。老烈的文有趣，那十一位作家艺术家的诗、画、书法、篆刻一配更有趣。看后使我改变了最初的看法，老烈没有白送我这本书。我的妹妹郁锺馥是专门研究京剧的，她自己也客串，是梅派，拜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霆和别的表演艺术家为师。她退休后编了一大套京剧的书，她为了这套书曾到北京来请教专家，使得我得到不少有关京剧的知识，并且从她那儿完全出我意料地得知，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现在是医科大学教授的刘曾复，竟是京剧文化的权威。这本《诗文会》中黄宗仁写的“跋”中也称刘为当今一“大家”。我的妹妹常给我宣传京戏，可始终没有引起我对京戏的兴趣，这回看了文、诗、画、书、篆联手编出的一本书后，引起了我对京剧的兴趣，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的。

我也从这件事中得到一种安慰：我这个人虽然常常坚持己见，但看来并不僵化，我对京剧的看法因为看了这本书就有所改变，就是证据之一。

最后我想应该写一句话：老烈不姓老，本名苏烈。但是人们叫惯了老烈，我也这样，我写到这篇文章最后，才想到把他的真实姓名写下来。

金石滩：和作家们在一起

7月初李辉代大连日报社邀请我到金石滩参加一个笔会，说这个活动安排得很轻松，带有避暑度假性质。我的秘书小胡知道我这个人从不度假，告诉我这个事之后我又没有马上表态，就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不是在争取当一名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吗？有这样的机会，向作家们学习，还迟疑什么？”经她一番怂恿，我就作出了应邀前去的决定。

不怕读者们笑话。我开过非常非常多的会，可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笔会”。我想象中的“笔会”是把笔杆子们——不论是画家、书法家，或者是诗人、散文家，邀请在一起，请他写些、画些东西留下来。我怕交不了卷，也怕出丑，有点顾虑，但又转念一想，对一个“候补新秀”总会宽大些。我决定去金石滩，除了小胡说的“理由”外，还有一条，就是想看看“笔会”究竟是怎么开法的。没有想到这次“笔会”似乎对所有的人都很宽大。都没有要求动笔，只要求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日程的确很轻松。我从来没有这么悠闲过。不过我想笔恐怕早晚还是要动的，既然参加了笔会还好意思一直不动笔吗？

这个笔会，究竟到哪几位作家，原先只听说很少的几位，到金石滩后才知道，从北京去的有丁聪、沈峻夫妇，刘梦溪、陈祖芬夫妇，李辉、应红夫妇，未偕夫人的有邵燕祥、白桦，从上海来的有陈村，从武汉来的有池莉，加上大连本地的马力、徐铎等共有十多个人。除丁、刘、李、邵四位外，其他人对我来说，都是初次见面。

住在一个宾馆里，一日三餐围在一张圆桌旁，参观、观光坐在一辆旅行车上，人又不多，很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尽管我不熟悉作家们之间的话题，加上耳聋，受到限制，但还是看到听到不少。在7月15日到20日短短的几天当中，一下子认识这么多作家，单从这点来说，我也就不虚此行了。

以前见到了丁聪时，沈峻都没有在场。这次丁聪非常高兴向大家显示他有沈峻这样一个“家长”或“高级保姆”管着自己的幸福，成天乐呵呵的。他只比我小半岁，随着年青人一起跑，真使我羡慕。这次在金石滩，沈峻给了我老伴一本《我画你写——文化人肖像集》，每个文化人一人一页画，一页本人的自述和他人的评语。沈峻要我写了不到二百字的自述，大概准备编入这本书的续集。我欣然命笔。不久前，《南方周末》上登出高莽作画并作文的《丁聪与沈峻》。画中沈峻挎着白菜、鱼和鸡，提了一条肉，从菜市上推着一辆儿童车走来，车上坐的是手上拿着画笔和纸张乐得合不上嘴的丁聪。高莽引了一句：“名人背后有伟大的女性。”我背后的那位伟大的女性这次与沈峻交上了朋友。

我和刘梦溪多年不见了。我在大连谈起了1989年初刘梦溪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化》上选用我若干篇超短文（那时还没有编成《碎思录》）并为我请篆刻家刻了两枚闲章的故事。出刊和发表我的文章一事虽然暂时遇到挫

折，但他为发表我那些超短文而写的《丁卯治印小记》还保存在我这里。在金石滩他又向我约稿。回到北京又送来2—13期《中国文化》。我想挤出时间写一篇旁证博引、咬文嚼字的学术文章给他，让读者们知道我还没有因常写短文忘记了写万字以上长文的本事。陈祖芬送了我一本《让我糊涂一回》。拿到后立刻翻出书中与书同名的那篇文章。看了后，我想对祖芬说：还得请青年们原谅我们这些老糊涂对青年们说的那些糊涂话吧！

应红的《我眼中的风景》，同我的《古稀手迹》都收入《金蔷薇丛书》中。看了这本书，我就知道是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我认为只有女作家写出的文字才会这么秀美。后来遇到李辉，我问到《金蔷薇丛书》中所有我不熟悉的作者的情况。在讲到应红时，他告诉我说是一位青年女作家。使我感到我那个看法没有错。可是当时他真沉得住气，没有告诉我他同应红是一对。这一点是在到了金石滩后才知道的。在金石滩有一天晚上，沈峻送来《我画你写》时同时拿了一张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应红写这本书的文章，老伴看了，对我说应红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拿了这张报纸到李辉应红的那个房间。本来我想和应红闲聊，可是她已约了别人出去——大概是去唱卡拉OK了，没有聊成。

这次在金石滩，女作家不少，有应红、陈祖芬、马力、池莉。马力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很忙，顾不上闲谈。她送给了我一本《独自叩门》。翻开一看，里面写的完全是我最不熟悉的领域中的人物。社会上尽人皆知的明星，我几乎一无所知，为此我经常受到讥笑。我也许有一些特长，可是“明星学”是我的特短。如果认真学一下马力这部著作，作一点笔记，也许有朝一日，出言不凡，使人们大吃一惊，让他们对我刮目相待。

7月18日进城，上午参观“星海会展中心”，参观后在老虎滩用餐，下午市长薄熙来准备同大家见面，中间有两个小时空隙。大家去逛书店时，我在车上睡午觉。快到开车时，大家回来了，我见邵燕祥手上提了池莉的四本书。我想去买，已经来不及了。大队人马在20日上午都离开了金石滩。我因要等21日去青岛的班机留在金石滩。20日去武汉的飞机的时间比较迟，池莉也要在金石滩多呆大半天。在金石滩我和池莉接触得很少。关于池莉，在金石滩我只知道两点，第一点是，7月16日作家们从高尔夫球场回来时我问，谁打得最好，回答说池莉。又有人告诉我，池莉写的小说一点儿也不像女作家写的。以前我对池莉写的东西看得很少。在去金石滩前，我只在《随笔》杂志和《对酒当歌》上看过她写的两篇短文。后者使我知道她很能喝酒。20日那天她留下来同我们在金石滩“锚地宾馆”一起多呆了大半天，我老伴同她倒闲聊了不少。那天我在为金石滩写了“美哉金石滩”五个字之后，房间里宣纸剩下的不少。我就大笔一挥在宣纸上画了一个棋盘，并在宣纸上写了“这是我发明的一种棋，我在这里摆擂台，以棋会友”。这种棋我定名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棋。我顺手取了六张麻将牌作为棋子，讲了一下棋规，就同池莉下了许多局。我欺负她不懂下这种棋的诀窍，使她莫名其妙地败了许多局。恩格斯和马克思同样写过一篇《自白》，在回答燕妮提的问题“你喜欢做的事是什么”时，恩格斯写的是“捉弄人和被人捉弄”。那天我就享受到“捉弄人”的乐趣。最后池莉向我要那棋盘，我就在“以棋会友”四字下面署上本人的大名，盖上本人的大印，作为纪念品赠给那位女作家了。

21日我上飞机时，我带上了徐铎的《中篇小说集》。在上飞机前，在锚地已经看了大半本，又在飞机上把全书都看完了。原来他善于写海洋，而我

正希望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作品来做提高我国人民海洋意识的事，因此不但在青岛的会议（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海岛专业委员会的年会和中国渔业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大会）上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徐铎的这本书，回北京后又同他通了电话和写了信，讨论关于拍摄以海洋为题材的电视的问题。

金石滩是一个很美的避暑休假地方，锚地比较小，对门有一个大的宾馆减轻了很多游客的压力，是一个很宁静的住所。《大连日报》邀请我参加的这个“笔会”使我能和作家们在一起，过了好几天松散愉快的日子。跋

编这本书没有少花我的时间。

我做了好几件也许是不必要的事情。

我想既然决定编一本关于朋友的书，就要对自己的朋友作一番系统的回顾。于是我就从总角之交到最近才结识的朋友一个一个地去想了一下，在进行这种回忆中，朋友们的身影、容貌、声音、举止和我与他（她）有关的往事，也就一个一个地浮现在眼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但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的朋友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愿在自己的记忆中失去任何一个朋友。有时忽然想起一个好久没有想起的朋友，我就会有一种好像新结交一个朋友似的那样高兴。有时想起一个朋友，他的模样、他做过的事、他与我的交往，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可就是名字叫不出了——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现象。为了把他（她）的名字记起来，常想一两个小时。想出来后赶快用笔记下来，生怕再次忘记。我做这样的事花的时间是很值得的。但是编书的时间拖得太长了。

这次我对朋友进行系统地回顾，采取的办法是着手写一篇《我的交友简史》。一面写一面想，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补充。夏衍对沈宁说，他的朋友有一千人。我猜他说这话的时候只是估量了一下，而我现在是在下笨功夫一个地去回忆，要求回忆到的人有名有姓，大概何时相识。这样回忆到的人，也快达到这个数目了。这篇《简史》已有一万三、四千字，从已写出的文字来看，不能不承认厚古薄今，虎头蛇尾。把近二十年的人记下来肯定超过一千这个数字。

在回顾中我弄明白自己交友结构变化的历程：（一）少年时期只在学校和亲戚之间有极少数朋友；（二）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一下子认识了如此之多的革命者，改变了自己的交友结构；（三）本人成为职业革命者那些年，我只和党内同志及我的工作对象接触，加上战争环境，几乎完全中断了其他社会关系；（四）在作为执政党的党的机关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工作，同僚成为交友的主要渠道；（五）由于本人从事学术研究和组织推动学术活动，在自己的交友结构中增加了众多的学者；（六）在1982年我发表的公开信件中阐述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应该有众多的党员不做官，仍然站在群众之中、群众前面，领导群众，争取民主和群众自身的长远和切身利益。本人就准备按照这个思想和方法行事。因而在十二大后，主要结交了众多的民间的朋友——学者们，同我一样从原工作岗位退下来的领导干部等；（七）因为患癌和年岁增长等原因，学写散文，开始与作家们交友。

写这篇《简史》时，我还概括了一下近十多年来交友的主要渠道，有这么几种：（一）参加和组织民间的学术团体和会议，在这样的团体中和人们交流认识，这种形式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应该说是比较适宜的工作方式；（二）

多种形式的合作写书，搞理论、学术、文化的基本建设，并且创办一些刊物进行通俗宣传；（三）与各种邪恶势力，如伪科学、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作斗争。结交志同道合者并肩作战者；（四）我是个“发起家”，每年总要发起几件这种或那种事情，我发起的事情是不准备自己投入力量去做的，否则我就当不成发起家了，但是我既然发起了就很想把这件事办成，这就要寻求支持我落实我所发起的事情的朋友。我认为如果有人对我发起的事情有兴趣，而且去做，把它落在实处，做出成绩，这是对我的一种最大的鼓励，我就很愿和他交友。我最近概括出能把事情办成、办好要做到四条：“思想开路、人才决定、组织保证、金钱后盾。”我也希望企业家能够成为我发起的某些事的后盾，在我的朋友中又有了企业家这一类。（五）我还好为人师，愿意和青年交友，给他们以帮助。

我的这篇《简史》着手写的时候，是想收入这本书里的。写了一半，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要把它写得生动具体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从我写出的这篇《简史》文章来看，达不到这个要求。同时我又觉得还没有写完。

我还做了一件也许对编书来说是不必做的事情，那就是“我对什么是朋友”这个概念下功夫扣了一下，并且写成了一篇两千字的文章——《什么是朋友》。文章开始我写了几行字：“我有一个习惯，在使用一个概念时，总要把它扣个清清楚楚，这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习惯，但是对于写散文，却很可能是个缺点。动笔前先咬文嚼字、罗嗦一番，才切入正题，会使人厌烦。这是近年来才有的认识。”然而我还是感到这么咬一咬、嚼一嚼挺有味道。比如现在我编这本书，我就想把“什么是朋友”这个概念扣清楚，并把扣的结果写成文字。原先我想把这篇文章作为书的第二个序言。后来怕读者生厌，改成附录。最后我决定连这个“附录”也不收入了。对“朋友”这种人伦，由于它十分重要，有关的文献很多很多，但是我还是想好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写出的那二千字，当然即便在原理方面也远没有讲透。朋友这种人伦是很复杂的，朋友的类别很多。友谊也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这篇文章就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提纲，暂时留下来吧。

于是问题变得很简单：把手边已有的关于朋友的稿子编排了一下，作了一些必要的整理。现在收入的五十九篇，写到的人虽然也有一些新朋友，但大都是老朋友，内容文字比较有份量的也大都是老朋友。我不想把要写的人局限在老朋友的范围之内。编出的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并非我本人的愿望，但是由于这是编书，它的内容只能由原来的文稿决定。那些文稿大都不是主动写的，我希望以后更多写一些向朋友们学习的文章，因此在书名上加上初集两字，希望过若干年再来编时，面目有所改变。

这个集子能够出版，首先感谢倪墨炎，没有他的多次推动我是不会编出的。

由于我从来没有编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所以倪墨炎向我约稿后，我想编另外一本书《“闲”书》给他。后来才考虑改成编这样一本。因此时间就很仓促。加上做了上面那些不必要的事情，时间就更仓促了。后来还是没有能按照交卷的日子交卷。这样的情况使得在我身边帮助我工作的几位同志特别紧张。孟苏仔细对每篇文章审阅了一遍，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胡冀燕做编辑工作，吕雁打字，这是我向出版社交卷前的惯例，向她们表示感谢也是理所当然的惯例。

1996年12月9日

书友文丛

风雨故人情		夏 衍著
瞎操心	陈四益文	丁 聪画
边缘有光		刘心武著
书生意气		陈平原著
梦书怀人录		姜德明著
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		于光远著
暮年杂笔		贾植芳著
不殇录		金性尧著
文坛艺林见知录		蒋星煜著
深酌浅饮		李 辉著

